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

Série dos Livros sobre a Rota Marítima de Seda

2024 Vol. 1 No.1



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 歷史文化研究所
INTERNATIONAL (MACAU) INSTITUTE OF ACADEMIC RESEARCH |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簡介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由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2024年6月，是中外關係史、明清史（港澳史）、海外漢學、歷史文獻、基督教傳華史、國際關係問題等研究領域的專業刊物，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2958-9657（紙質版）、2958-9665（電子版）。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在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登記，是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中國核心期刊（遴選）資料庫、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港澳期刊網、澳門中文期刊論文索引收錄期刊，也是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資料庫的來源期刊，為澳門特區第一批被收錄的灣區研究類期刊。未來，為進一步加強學術影響力，將繼續申請加入其他國際期刊資料庫。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的評審和編委專家由國際知名學者組成，本刊以“立足專業、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相關研究領域的繁榮和發展。日後，期望能進一步把本刊建設為國際上有知名度的學術期刊。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編輯委員會

【顧問】

- 金國平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學術顧問、特聘教授（內地顧問）
高勝文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特聘教授（澳門顧問）
馮瑞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香港顧問）

【主編】

- 葉 農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澳門研究院院長
高勝文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特聘教授

【編委】（排名不分先後）

- 金國平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學術顧問、特聘教授
普塔克（Roderich Ptak） 德國慕尼黑大學退休教授
柳若梅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馬建春 暨南大學教授
陳章喜 暨南大學教授
夏 泉 暨南大學教授
楊 杰 暨南大學教授
張 斌 香港亞太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靳環宇 中聯辦深圳聯絡部
陳進國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袁朝暉 中國社科院世宗所副研究員
馮瑞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目 錄

創刊詞一	葉 農 / 1
創刊詞二	高勝文 / 2

專題研究

海上絲路的契機：16世紀初葡人與福建人在馬六甲 和“漳州海面”歷史邂逅	金國平 / 1
論海上絲綢之路的復興與美國的意識形態及其擴張 政策之牴牾	(德) 普塔克 / 16
明代中葉海外與閩南往來批信研究	涂志偉 / 30
安第斯山脈之珍：花生舶來	葉 農 / 46

啼音初試

依託史料，拓展視野——以《海上絲路叢刊》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為例	宋玉宇 / 55
--------------------------------------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

2024年6月 第1卷 第1期

主辦單位：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歷史文化研究所

主 編：葉 農 高勝文
編 輯：伍世堯 侯麗慶
印 刷：廣州今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24年6月第1版

創刊詞一

海國波濤上霧霄，番船帆影路途遙。
船裝銀兩重洋越，艙載絲瓷碧色潮。
西理傳來天地改，東儒漂過異鄉昭。
遙思舊季開荒日，何懼風高浪裏飄。

——甲辰四月初三新刊創刊有感/葉農

海上絲綢之路，它是一條源自中國、跨越大洋而又將世界連成一體的海上航線；它又是一條將中國商品帶到世界各地而又將世界其他地方物產帶到東方的著名商路；它還是一條將西方文化傳到東方而又將東方遠播西方的文明交流之路！

光陰荏苒，隨著時光的流逝，在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上，演繹出多少動人心弦、如歌如泣的感人故事？發生過多少改變世界歷史、東方歷史、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湧現過多少感天動地，造就時勢的英雄人物？我們需要罄多少南山之竹，才能書寫他們的豐功偉績，記載他們的不朽功勳？

每慮及於此，就夜不成寐，自當奮筆急書，將我們敬仰先賢，承擔使命，開創未來的歷史責任，寫於此，與各位有志於此的同仁同好，共勉之！

每思及己任，就行動起來，邀約同有此念之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的澳門同仁，與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一道，共同創辦此學術刊物——《海上絲綢之路叢刊》，以推動對中外交流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港澳台及海外傳承傳播史、港澳問題、國際關係問題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日有東升西落，月有陰晴圓缺，本刊亦隨此而定為半年刊。特邀各位專家學者，不吝賜稿，以惠及學界為盼！

葉農

2024年6月1日於省城

創刊詞二

國際格局重構與中國發展策略

自文明伊始，歐亞是文明的發源地，也是世界的中心，長久以來，世界中心的轉移由亞洲和歐洲輪換。冷戰結束後，隨着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已經從西方國家主導的“一元結構”向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共同參與和主導的“二元結構”轉變，形成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共同制定國際規則，共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局面。盡管全球治理體系中的美國霸權影響依然揮之不去，但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地參與全球治理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國際體系正在向多極化的方向穩步推進。在新形勢下，發展中國家定必提出適切的發展策略。

作為新興經濟體之一的中國也不例外，為順應國際格局重構的趨勢，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避免冷戰的再度出現，促進全球發展，中國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倡議通過“雙路”，帶動海陸空三線發展，堅持“三共原則”，全力推進及實現“三大共同體”，秉持“四大理念”，加強“五通”，共同打造“六大經濟走廊”，促進全球發展。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是多中心全球秩序、多樣化經濟結構的重要支柱，也是穩定動蕩地區和國家局勢的重要力量，對國際格局重構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

誠然，要實現“一帶一路”倡議，我們必需重點加強及深化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等發展策略。未來，讓我們繼續以《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為平台，為絲路發展建言獻策、貢獻力量，以實際行動踐行愛國愛澳。

高勝文

2024年6月1日於濠鏡



海上丝路的契机：16 世纪初葡人与福建人在马六甲和“漳州海面”历史邂逅

金国平

【摘要】16 世纪初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兴起，福建人的“下南洋”活动显著加强了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商贸联系。特别是 1509 年，福建人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接触标志着双方建立了初步而友好的外交关系。1518 年，葡萄牙船长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的航海抵达“漳州海外”，成为中葡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双方在福建地区的首次直接接触。福建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贸易的推动者，更是文化交流的关键纽带。他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知识、商品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全球化的早期形态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大航海时代；福建人；葡萄牙人；马六甲；漳州海面

一、“佛郎机”东来

11 世纪，欧洲的贸易心脏地带集中于地中海东端地区。通过热那亚、佛罗伦萨及威尼斯保持着与东方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的交易。15 世纪，土耳其人扼控了贯通欧亚的陆地丝绸之路。威尼斯商人坐待贸易恢复，而葡萄牙已开始向大西洋扩张，寻找通向东方的新航线。

在欧洲对大西洋的开发中，葡萄牙一马当先。首先是对北非的征服，接着是对大西洋岛屿及非洲沿海的开发，最后开通印度海道，形成了葡萄牙东方帝国。1415 年，占领休达（Ceuta）。1419 年，首航马德拉（Madeira）群岛。1427 年，抵达亚速尔（Açores）群岛。1434 年，越过勃查多尔（Cabo de Bojador）角。1456 或 1460 年，发现佛得角（Cabo Verde）群岛。1485 年，探索非洲大西洋沿岸。1487 年，巴罗托罗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葡人涉足印度洋。1498 年，华士古·达·伽马（Vasco da Gama）抵达卡里卡特（Calicute）。东西方固定航线始通。

葡萄牙人开创的好望角航线（Rota do Cabo）或东印度航线（Carreira da Índia），直接沟通了东西方，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经济效益，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

作者简介：金国平，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学术顾问，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澳门史等研究、历史文献的翻译工作。

（一）“佛郎机”之名

经贸带来了火器的传播。“佛郎机铳” (berço)^① 为欧洲 15 - 18 世纪最为流行的火器。随着被阿拉伯人称为佛郎机 (Frangues/Ferangi)^② 的葡萄牙人的东来, 代表着西方先进火器技术的“佛郎机铳”也随之传入中国。(意) 艾儒略 (Aleni Julio) 编撰《职方外纪》云: “中古有一圣王名类思者, 恶回回占据如德亚地, 初兴兵伐之, 始制火铳, 因其国在欧罗巴内, 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佛郎机, 而铳亦沿袭此名。”^③

在东方数种语言中, 都有来源于“Frangues/Ferangi”的称谓, 如“木把佛郎机 (smeril) 大约相当于土耳其语的 prangi”^④。另外, “FIRINGHEE。……在泰米尔语中的意思是加农炮 (cannon)”^⑤。

总结而论, 佛郎机有两层意思: 一是葡萄牙人带来的“佛郎机铳”; 二是广义的欧洲火炮。

（二）火器传播的途径

葡萄牙人对火器的使用和传播有严格规定。首先是严禁私人买卖。其传播途径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逃兵携带和技术人员私自传授等, 还有通过传教士的播散。在后情一况下, 教谕规定, 只可以传播给教徒, 用于自卫。中葡关系内的扩散是《筹海图编》卷十三所说的“时因征海寇, 通事献铳一个并火药方”、战争缴获 (1521 年的屯门海战和 1522 年的西草湾之战) 和收买通晓铸炮技术的华人 (如嘉靖年间的杨三、戴明等人) 三条途径来实现的。

（三）“佛郎机铳”何时入华

关于“佛郎机铳”最早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 尚有多个诉讼不决的公案。本文主要探讨陈寿祺著《福建通志·明外纪》载, 正德五年 (1510 年), 魏升使用“佛郎机铳”百余门的个案。

2015 年, 周维强著《葡使来前“佛郎机铳”输华诸说商榷》对葡使来华前“佛郎机铳”传入的诸说作了梳理, 尤其对此事进行了新的颇为详细考订。^⑥

之前, 王兆春力主“正德初年使用佛郎机作战的说法不可靠”。为此, 他列举了 3 条理由来推翻《福建通志·明外纪》中的正德元年 (1506 年) “埋佛郎机炮数百于漳林东湖以待之”和正德五年 (1510 年) “以佛郎机百余攻之”记载, “认为福建仙游县人所用的佛郎机, 是由闽粤商人走贩南洋时, 学习其制造技术后, 回国仿制并用于作战的”。他指出: “此说似不能成立。首先, 从年代上说, 明朝的商人只能在 1510 年以后才能同葡萄牙人接触, 即使在这种接触中能够见到佛郎机, 但是要学会其制造技术, 筹建设备, 进行仿制, 也不是一蹴可成的。因此, 文中所说使用佛郎机作战之事并不可靠。其次, 从《福建通志》所描述的两次作战过程可知, 作者对佛郎机的性

① 亦称“字母铳”。关于佛郎机和佛郎机的葡萄牙文原始资料, 可见金国平著《西方澳门史料选萃 15 - 16 世纪》(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第 2 - 4 页。

② 原意为法兰克人, 泛指西方基督徒。因为葡萄牙人最早东来, 遂以此名相称, 成为了指他们的专有名词。

③ (意) 艾儒略 (Giulio Aleni) 著; 叶农点校整理《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 澳门文化艺术学会, 2012 年), 第 23 页。

④ John Francis Guilmartin, jr., *GUNPOWDER &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2003, p. 169; 另见周维强著《“佛郎机铳”在中国》(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第 6 页。

⑤ Henry Yule,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London: J. Murray, 1903, p. 352.

⑥ 《科学史通讯》2015 年第 39 期, 第 35 - 48 页。

能和作战作用并不了解。如在描写第一次作战过程时，把佛郎机当成是后来的某种地雷。因为佛郎机只能发射弹丸击杀敌人而不是埋于地下的火器。其三，从制造火器的能力和明廷的规定看，在正德五年以前的仙游县，一些‘义民’是不可能制成和拥有百门以上佛郎机的。”^① 通常认为，葡人来东方后不久，闽商在东南亚经商过程中，间接从南洋将“佛郎机铳”的制造技术和燃放方法传入了中国民间。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之一是方豪。他曾说：“其他言佛郎机传入渊源者尚有多说，盖葡人未来华前，必已有闽广商人贩自南洋者，故最初传入之年不可考也。”^② 此推断后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

（四）葡萄牙文新史料

幸好我们最近见到了几条葡萄牙文关于1502-1506年间欧洲火器在印度南部传播的史料，为我们合理解读《福建通志》中这些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说法开辟了蹊径。

1551年出版的《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记载：“跟财副（feytor）在一起的两个米兰人宝石打磨匠（lapidairos）也逃跑了。他们会铸造火炮。一个叫若昂·玛丽亚（João Maria），另一个叫佩德罗·安东尼奥（Pedro Antonio）。……（船队）有一万五千人，其中五千人为弓箭手，二百人为火枪手。还有三百八十门大炮（tiros de artilharia），其中大部分为铁铸，由两名米兰人制造，因此，他们受到了高度重视，给予了重重的奖赏。”^③

这些史料的记载有些支离破碎，不仔细审读，很难看清事情的前因后果。葡萄牙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做了如下很好的综述：“达伽马（Gama）的第二次舰队中，有两个自称是宝石打磨匠的人——若昂·玛丽亚（João Maria）和佩德罗·安东尼奥（Pedro António）。他们留在了柯枝商栈（feitoria de Cochim），专门从事宝石加工。当萨莫林（Samorim）的军队占领柯枝时，他们趁机逃跑，加入了敌方。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真正职业是铸炮师和炮手。直至1506年初，在3年内，他们铸造了400门火炮，向众多土著居民传授了铸造和燃放火炮技艺，并指导建造了一艘小帆桨战船（galiota）。”^④

① 王兆春著《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②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48页。

③ 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Lisboa: Na Typographia Rollandiana, 1833, livro 1, pp. 153-154, 200-201.

④ 即蜈蚣船/桨帆战船（galé）。蜈蚣船造船技术及所造之船，向为史家所关注，主要有（德）普塔克（Roderich Ptak）著《蜈蚣船和葡萄牙人》（载（德）普塔克著《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德）普塔克著；史敏岳译《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第342页）。刘义杰著《蜈蚣船钩沉》（载《国家航海》第20辑（2018年），第133-148页），为一专题研究，比较全面地回顾了蜈蚣船的学术研究进展，明确地提出了“葡萄牙船说”，即蜈蚣船的原型为葡萄牙的桨帆战船。他高度评价了仿制蜈蚣船给明代军事所带来的影响。谭玉华著《汪鋐〈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疏〉蜈蚣船辨》（载《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28-44页）也比较全面地回顾了蜈蚣船研究过程，力主“东南亚船说”。著者看到，谭未能参阅台湾一篇很优秀的硕士论文——彭文显著《欧洲军事武器与东亚的交流——以明代蜈蚣船及喇叭船为例》（台湾“清华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另外，著者所引用的葡萄牙文献也略显不足。葡属印度1525年条例规定了葡萄牙东方舰队的配置，其中桨帆战船（galé）是舰队中的标准装备。20桨以下的称“galiota（小桨帆战船）”。之所以产生“东南亚船说”的说法，是因为从中国史籍所载的图来看，并没有那么多的桨，仅有9对桨。这正是小桨帆战船和桨帆战船区别所在。总之，蜈蚣船的原生船为葡萄牙的小桨帆战船为不争之事实；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 Lisboa: Editora Arcádia, 1965, vol. II, p. 128.

这是葡萄牙海外发现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件。^①在这两个人的族属问题上，巴罗斯（João de Barros）和卡斯塔涅达（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的记载有所不同。前者说是埃斯拉沃尼亚（Esclavónia，中欧一古国，其范围在克罗地亚、普鲁士和匈牙利之间）人，后者则记录是米兰人。还是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做了一个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卡斯塔涅达（Castanheda）说他们是意大利人，准确地说是米兰人。根据巴罗斯（Barros）的说法，他们可能是埃斯拉沃尼亚（Esclavónia）人。至少是埃斯拉沃尼亚（esclavões）人，他们或许学成了匠人手艺，并首先在米兰操业。”^②

编年史家的史料虽然有异，但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在葡萄牙海外发现过程中，有两个人受到威尼斯大公的指派，声称是宝石打磨匠，掩盖了其火炮铸造师和炮手的真实身份，混入葡萄牙舰队，来到了印度。后叛逃，为葡萄牙的敌人铸炮并传授点放技术。他们的目的是，以火器传播来抵消葡萄牙人的武器优势，削弱其海上霸主的地位，打击其海外发现。对此，巴罗斯明确指出：“如果真是这样（简直不应该这样想象一位这样杰出的威尼斯领主），他们想诋毁领主，然后说，通过他们的手段，去了那一带，利用铸造大炮的手艺对我们搞破坏。”^③

上述几条史料说明，欧洲的火器是通过这种意外的途径，在印度南部产生了广泛的传播。如果我们目前尚不能证实当时在当地有华人的话，但不用证实的是，华人遍布东南亚。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出了马六甲海峡便是孟加拉湾，再过去一点就是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近在咫尺。另外，从东南亚国家的“印度化”和二者之间的频繁贸易来讲，火器技术一旦在印度南部传播开来，不用多少时间便会传至东南亚。

（五）闽商输入

张维华虽未知晓从印度南部广泛传播和向东南亚急速扩散的史实，但正确地指出：“正德五年，当西历一五一〇年，此时去葡人入中国之时尚早，而“佛郎机铳”已为中国所用矣。《实录》及《兵志》均称‘中国之有火器，自何儒始，’以前二说证之，未可为据。当是闽广商人贩南洋者，先已习佛郎机之术，而后赍之以归，仿拟制作，渐而行于民间，似非自葡人入中国后，始得其术也。”^④

此推理合乎情理。其实，福建民间海外贸易使用火器的历史很悠久。天顺四年（1460年），在关于福建海商船队在（上川山）小屯澳与官军冲突的报告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果见三桅大贼船一只、白船六只帮作一处，摆执军器，竖立旗号，烧放铳炮，齐声呐喊，来与官军对敌。”^⑤

海商向重火器，因为它是安身立命和保卫财产的法宝，所以民间的引用及传播的速度要远远高于有严格管理制度束缚的官方，以至于正德五年（1510年）仙游县官军要征用民间贸易的“佛

① 葡萄牙当代的主要历史著作都有涉及，如 Jaime Cortesão, *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Lisboa: Livros Horizonte, 1976, vol. 5, p. 1220, Jaime Cortesão, *História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93, p. 142, oaquim Romero Magalhaes; André Ferrand de Almeida; et al, *História de Portugal: No alvorecer da modernidade (1480 – 1620)*, Lisboa: Estampa, 1997, vol. III, p. 339; Maria Fernanda Alegria; Francisco Bethencourt; Kirti Chaudhuri, *História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Lisboa: Temas e Debates e Autores, 1998, vol. 1, A formação do império, p. 323。

②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 p. 128.

③ Hernâni Cidade; Manuel Múrias;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Ásia de João de Barros: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e terras do oriente*, Lisboa: Divisão de Publicações e Biblioteca d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5, p. 260.

④ 张维华著《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⑤ 周鑫，王潞著《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

郎机銃”来平乱。再说正德元年（1506年）“埋佛郎机炮数百于漳林东湖以待之”也有可能，因为从1502年起，火器的传播已经开始在印度南部“恶意”地急速扩散。完全有可能在4年内，完成从印度南部到东南亚，再到福建的过程。火器传播的速度要远远大于其他物品。

葡萄牙人于1511年才占领马六甲，因此，在此之前，闽商不可能接触到欧洲火器。那么，他们的制造“佛郎机銃”和燃放的技术只能通过印度南部得来。结论是：在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在马六甲的接触前，已经通过闽籍海商传入了福建。总而言之，王兆春提出的3条不可能的理由有了合理解释的可能。

首先，从年代上说，明朝闽商在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前，已经接触到了从印度南部传来东南亚的“佛郎机銃”。因为制造技术已极度扩散，接触与仿制已非难事。其次，《福建通志》所描述的“埋”不应该作埋于地下解。将銃炮的后部半埋在地下，以减轻后坐力也可说是“埋”。其三，因为来自“番舶”，因而不受制于明廷的有关规定。一条船上可配备有20-30门，甚至更多，因此，要凑足百门以上“佛郎机銃”也属可能。迄今为止，我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战争缴获和收买通晓铸炮技术的华人二事上，而未关注到在印度南部广泛传播，然后迅速传至东南亚，再从那里传入福建的过程。新见葡萄牙文资料为我们恢复了“佛郎机銃”在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前火器传播的证据链当中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为中国火器引进史中关于最早的“佛郎机銃”引进的时间和途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史料基础。

二、“China”与“Chincheo”之含义及汉译

再次研究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1518年“Chincheo”之行，似有一项基本工作要做，即首先必须先厘清“China”与“Chincheo”这两个关键词的古今含义和不同指称及其相应的汉译，以便能清楚地进行论述。

（一）“China”

这个字，英语也这样写。大概这个字中国人无人不知其含义。在早期葡萄牙文史料中“China”为何义？中国的名号在世界传播最广、最知名者当为“China”。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孜孜探索^①，使之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但对其词源及其初期的指称范围则长期以来聚讼不绝，论述颇多，迄无定论。欧洲大航海时代前，涉华地理系统有二：1、托勒密概念体

^① 主要研究有韩振华著《支那名称起源考释》（载《韩振华选集》—《中外关系历史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9年），第5-9页）、黄兴涛著《话“支那”——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之二》（载《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第54-62页）、方豪著《支那名称之起源》（载《中西交通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47页）、张星烺著《附录“支那”名号考》（载张星烺编注《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2003年），第552-562页）、汤洪、李诚著《1700年“支那”语源研究》（载《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4卷第4期，第71-81页）、陈波著《何为“中国”——从西方对China的概念建构谈起》（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第76-87页）及胡阿祥的集大成之作《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精装版）等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多如牛毛，且在中国学者的主要论文里都有涉及，故不在此一一列举。仅举数篇西文经典之作：Paul Pelliot, *L'origine du nom de "Chine"*, in *T'oung Pao*, 1912, Second Series, vol. 13, No. 5 (1912), pp. 727-742; Berthold Laufer, *The Name China*, in *T'oung Pao*, pp. 719-726; (日)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大秦国及拂菻国考》（载《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74页）；Luís Filipe F. R. Tomaz, *A carta que mandaram os padres da India, da China e da Magna China: um relato sirtaco da chegada dos portugueses ao Malabar e seu primeiro encontro com a hierarquia cristã local*, Coimbra: Oficinas da Imprensa de Coimbra, 1991, pp. 119-181; Separata da *Revist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XXXVI (1991), pp. 119-181.

系的“Sinae/Seres”等；2、马可·波罗概念体系的“Catay”。^①从葡萄牙人东来后，出现了“China”。学术界虽对葡萄牙文中所出现的早期中国国名有一定的涉及与论述，但未能在更多葡萄牙文献的基础上，从词源学和词汇学的角度，探索“China”一词的历史发展脉络，因而在整体研究层面依然留下很大的完善空间。^②

早期“China”含义今昔殊异。其历史含义是指广州。从现有资料来判断，在16世纪到达中国之前，葡萄牙人从阿拉伯语或梵文接受了“China”一名。实际上，早在唐朝，印度人便称呼广州为“支那”，如唐僧义净写道：“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弥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鉢娜寺。唐云鹿园寺也。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河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咀罗，唐云天子也。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③梁嘉彬指出：“广州在唐时贸易之繁盛，民物之殷阜，致外人之往来其间者群以广州即为中国。”^④可以看出，葡萄牙人沿用了印度人的习惯，所以在16世纪前40年的葡萄牙文献中，“China”多指“广州/粤地”，其名词形式“chii/chin/china”含义是“广州/粤人”。来华之前，葡萄牙人只知有广州，而不晓得有中国。

总之，海道大通以来，经过葡萄牙文的媒介，“China”指广州的早期用法和指明清中国的含义进入了欧洲其他主要语言，因此，可以说，是葡萄牙人将“China”一名传播至了西方世界。为了行文清楚，在涉及和引用1513年前事件和史实时，在引语中一般将“China”译作粤/粤地，其形容词作广州/粤人。1513年之后，则译作中国/中华及中国/华人。在叙述文字中，一律用中国/华人。

（二）“Chincheo”

在早期葡语文献和地图中，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Chincheo”，而且词形和词义多变。不难看出，它是一个源自汉语的拼音词汇。其对音究竟是“漳州”，还是“泉州”，国际学术界曾有过一番争论。^⑤经过长时间的考察与研究，“Chincheo”有多种含义，可作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及形容词使用。其用法计算结论如下：

1. 专有名词——普通名词：“Chincheo”及各种变体为“漳州”拼音；作省解时，泛指福建；指岛屿时，早期为浯屿，后可指厦门湾内诸多岛屿；指港口时，早期为浯屿澳，后为月港至安平港，包括厦门湾内外的港区。指江时，为九龙江及其入海。指人时，泛指福建人，尤指闽南人。

形容词：“Chincheo”可译作漳州（人）的、闽南（人）的、作福建（人）的。

2. 闽人“下南洋”与“佛郎机统”传闽南。千百年来，闽人漂洋过海谋生，史称“下南

①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② 计翔翔著《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1-281页。

③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3页。

④ 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对此问题，学者多有涉及，如梁启超著《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4-145页；李庆新著《海上丝绸之路》（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83-84页；林梅村著《古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载上海博物馆编《文明对比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页；武斌著《丝绸之路全史》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808页等。

⑤ 谟区查（Charles Ralph Boxer，亦译博克舍）曾有一总结性评述，但未能得出定论。参见C. R. 博克舍著《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23-234页。

洋”。南洋一般指今东南亚地区。“下南洋”亦称“过番”或“落番”。^① 满刺加为南洋重要埠头，闽人最早聚居地之一。在此，闽人与东来的“佛郎机番”相遇。此名为对葡人的俗称。

1488年，迪亚斯（Bartolomeu Dias）成功绕过好望角。1498年，华士古·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通东印度航线，率船队驶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开启亚洲历史新纪元。1500年后，葡萄牙商船定期航行于东印度航线。1505年，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 Manuel I）派遣唐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D. Francisco de Almeida）出任葡印舰队司令时，便嘱咐他说“对满刺加及尚未十分了解的地区”进行开发。但出于政治及战略原因，他未完全执行国王的嘱托。翌年，唐曼努埃尔一世再令其开发南洋群岛，设法在满刺加或其附近设立一城堡。他又未采取大规模行动，只是派遣了一些间谍打探情况。因被沿海居民察觉，他们退回原地，致使唐曼努埃尔一世于1508年派遣一支舰队再航满刺加。舰队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从国王处获得的指令是：“你必须探明有关广州/粤人（os chins）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满刺加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满刺加或其他任何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他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的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还有，倘若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崇拜的是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②

国王给塞格拉的任务很明确：寻找“广州/粤人”。由此可见葡萄牙国王想了解心情是多么迫切！葡人首次远征满刺加便是奉命尽可能发现“广州/粤人”及其贸易。此处的“广州/粤人”有广义的华人的含义，自然闽人也在内。^③

塞格拉船队于年2月，在印度西海岸第乌（Diu）大败埃及马穆鲁克苏（Mameluco）丹国和古吉拉特（Gujarat）的联合舰队，奠定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其船队于1509年驶抵满刺加后，马上展开与在当地经商的琉球闽人华裔^④及广州/粤人的交往。这些人运销满刺加的主要货物为麝香、丝绸、樟脑、大黄等，以换取胡椒和丁香。^⑤ 一般趁3、4月的季风前来满刺加，于5、6月又趁风返回。葡萄牙人千方百计打探情况，企图介入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中。这支舰队在满刺加逗留了数月，后因无法补充给养而撤退。1510年2月6日，葡萄牙人路易·德·阿拉乌热（Rui de Araújo）从满刺加向科技（Cochim）报告说：“且每年从那里来此的中式帆船属于该地同一国王。除了他的船，不允许其他人的船从那里来。广州/粤人（chims）

^① 关于闽人在唐、宋、元与明时期移居东南亚史略，可见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27页。

^② 此两处引文，见 Affonso de Albuquerque; Ray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 *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seguidas de documentos que as elucidam*, Lisboa: Academia das Ciências, 1898, T. 2, pp. 323, 416.

^③ 颜清煌著《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载林忠强等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Ching-hwang Yen, *Ethnicities,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thnic Chinese worlds*, Singapo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17, p. 132.

^④ 金国平著《“Cheilata”之生平与事迹——兼考“Os Gores”》，载金国平著《澳门学：探曠与汇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澳门：文化公所，2018年），第25-56页。

^⑤ Ramos Coelho, *Alguns documentos da Torre do Tombo acerca das navegações e conquistas portuguesas*,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Ciências, 1898, pp. 219-225.

在 4 月趁季风而来，于 5 月返回。（无法辨认），来回途中行驶 × 天至 × 天。来时，他们载来了瓷器……每年来的船多达 8 或 10 艘，装载大量胡椒及（无法辨认）丁香运回其地。”^① 阿丰索·德·阿尔布里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葡萄牙船队在 1510 年攻占了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从此，葡萄牙完全控制了印度西部沿海地区。1511 年，葡萄牙人挥师占领了东西洋交通和贸易要津满刺加。当时，满刺加王国是明朝的藩属国，与大明已维持了 108 年的朝贡关系。满刺加被攻占后，成为葡萄牙与其原宗主国接触的媒介。在满刺加站稳脚跟后，葡萄牙人开始向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挺进。1513 年欧维治（Jorge Álvares）从满刺加乘坐中式帆船来粤。1514 年在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满刺加，佛罗伦萨人安波里（Giovanni da Empoli）^② 于同年 6 月 27 日发出一封信说：“北边是粤地（la terra de Cini），称为广州/粤人（Cini）、琉球人（Lechi）和高丽人（Ghori），^③ 如同称法兰德斯（Fiandra）、拉马尼（Lamagne）和布拉班特（Brabante）。”^④ 1515 - 1516 年拉斐尔·佩雷斯特洛（Rafael Perestrelo）乘船抵达广东沿海。1516 年 4 月，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D. Manuel I）一世派遣的首位来华大使皮莱资（Tomé Pires）入穗城，企图与明朝建立官方关系。1518 年，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船长在前往琉球的途中，到过“Chincheo”。

（三）“chamcheo”与“chancheo”

在 16 世纪初的葡语文献中，“Chincheo”有诸多拼写形式，但现通常作“Chincheu”。最早的书写形式是“chamcheo”和“chancheo”。出使前，皮莱资广搜各种资料，在 1512 - 1515 年期间，撰成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东方简志》。^⑤ 该书载曰：“从交趾尽头至中国沿岸近海南岛处有要塞密布。海南岛出产珠子，运往中国。有南头水寨，广州寨，chamcheo 等等。其中以广州寨为首，为那带贸易中心。……从投放的货物来看，素丝的产地在 chancheo，染色丝绸来自交趾。锦缎、缎子、金银缎、纱、罗则产于南京及安庆（边注：南京盛产各种棉布，富商巨贾比比皆是。从北京沿河行船 1 月可至南京），海南岛珍珠，chamcheo 樟脑，供不应求。因为上述货物情况人人皆知，恕我不在此赘述。”^⑥

从该书所记述的内容来看，皮莱资收集到的材料之翔实、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葡萄牙人已知，中国沿海有四个大地方，分别是海南、南头、广州和“chamcheo/chancheo”。

“chamcheo/chancheo”虽有一个字母不同，但“m”与“n”都是鼻音，音值相同，语义也相同，为一地名。

^① *Alguns documentos do Arch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 Lisboa: Academia das Ciências de Lisboa e 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 1892, vol. 1, p. 223.

^② 关于此人，可见 Giuliano Bertuccioli, *Giovanni da Empoli e la Cina*, *Miscellanea di storia delle esplorazioni*, 12 (1987), pp. 20 - 27; Matteo Salonia, *The first voyage of Giovanni da Empoli to India: Mercantile cultur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early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Portuguese Asi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2019, vol. 31, No. 1, pp. 3 - 18. 著作有：Laurence A. Noonan,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a: 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 1989.

^③ 译者注：在大多葡萄牙文献中，作琉球人解。此处与琉球人同时出现，根据对音，权译作高丽人。

^④ *Lettera mandata da Giovanni Da Empoli a Lionardo suo padre, del viaggio di Malacca,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a Toscan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periodico trimestriale; ossia raccolta di opere e documenti finora inediti o divenuti rarissimi risguardanti la storia d'Italia, Firenze: Olschki, 1846, Tomo III, Appendice, p. 81.

^⑤ 金国平著《东方简志新释》，载金国平著《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 年），第 137 - 150 页。关于此书编写的年代问题，可见同书，第 109, 120 页，注释 68。

^⑥ Tomé Pires; Francisco Rodrigues; Armando Cortesão, *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Coimbra: Por ordem da Universidade, 1978, pp. 359 - 360, 368.

至于“chamcheo/chancheo”汉语对音，从1937年阿尔曼多·科尔特藏（Armando Cortesão）在巴黎国会图书馆中发现其珍贵手稿抄本，将其译为英语，交予世界著名的哈克卢特（Hakluyt Society）出版社于1944年以英、葡双语付梓以来，这一学术之争早已有了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结论。解决“chamcheo/chancheo”对音是“漳州”还是“泉州”最有力的书证是现藏于罗马耶稣会秘密档案馆中的罗明坚所著的《葡中字典》。在内，与“Chinçeo”相对应的汉字是“漳州”。在菲律宾编写的西班牙语——闽南语字典中，明确地标为“Chincheo——漳州”。

还有一种有一定影响力的考证，即认为“Chincheo”是泉州。^① 如果考虑到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是要去琉球，而浯屿或南太武山是传统的前往琉球、日本航线起点的话，他所到达的地点应该是在漳州九龙江口的海面。

“chamcheo/chancheo”肯定是漳州的拼音，但其内涵并不仅仅限于漳州。在葡语文献中，情况十分复杂，其史地范围因时而异。因此，必须按时期、按事件逐一分析，不可笼统将其考为一地而论之。例如此处所言“chamcheo”是指浯屿水寨。该寨为明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所设，后内迁至中左所。

16世纪初年，葡萄牙人便已确知“素丝的产地在chancheo”。显然，此处的“chancheo”可以毫不犹豫地还原为“漳州”。众所周知，漳州的纺织业素称发达，所产漳纱、漳缎更是畅销海内外。“闽南漳州气候湿润，雨水丰沛，利于植桑养蚕。漳州‘古称善蚕之乡，岁五蚕，吴越皆不能及’，甚至在诏安还建‘有蚕王庙，则斥卤不宜蚕之说……惟漳丝褐色，不及杭、嘉、湖’”。^②

至于“chamcheo 樟脑”，百分之百地回译为“漳州樟脑”。可见，葡萄牙人对漳州最主要的物产了如指掌，而它们又是葡萄牙人最早从中国贩去经销的商品。

（四）地图上的“Chincheo”与“Chinqueo”

《中国新图》（*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的作者巴尔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为葡萄牙人，后叛逃至西班牙为西班牙国王制图。亚伯拉罕·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在《万国全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84年版中发表了第一幅中国全境详图。

在福建漳州沿海标有“La Mao”（南澳）和“Chabaqueo”（诏安），稍外标有“Chichi”（月港）。在漳州湾的西部出现“Chincheo（漳州）”。在漳州湾入海口标记着“Chinqueo”（浯屿）。一般来说，当“Chincheo”单独出现时，可指漳州或浯屿。

三、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的1518年“Chincheo”之行

闽人与葡人最早接触于满刺加，时为该城陷落前之1509年。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涉及稀少，研究阙如。在夺取满刺加前，葡人就探触到了马来世界的现实，更是与到那里的闽人和粤人有了接触。^③ 葡人认识中国始于此。从粤闽二省人处得到的信息成为葡萄牙对华策略的基础。尤其是初期，葡萄牙人与闽人的关系很友善。据1552年的葡文史料，“舰队司令于1509年9月11日

^① 廖大珂和辉明力主此说，可见廖大珂，辉明力著《16-18世纪初欧洲地图中的Chincheo港》，第159-176页。

^② 苏文菁总主编《闽商发展史·漳州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

^③ 关于满刺加的华人社团，可见Victor Purcell, *Chinese Settlement in Malacca*,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7, XX, pte. 1, pp. 115-125; Paulo Jorge de Sousa Pinto, *Traços da Presença Chinesa em Malacca (século XVI - primeira metade do século XVII)*, in J. M. S. Alves ed., *Portugal e a China: Conferências nos Encontros de História Luso-Chinesa*,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2, pp. 133-145.

率舰队到达此城。在港口，他遇见许多中式帆船（jūcos），其中有4艘来自粤地（quatro da China）。葡萄牙人已经声名远播，广州/粤人（chis）喜欢我们，得知了我们之来。中式帆船的船长派人来拜访舰队司令，向他示好。然后，亲自登船上访。舰队司令说明来意，并向他们展示了随身货物。双方交好，翌日一同进餐。饭后，告诉了广州/粤人说舰队司令来是为满刺加国王与其宰相叔叔（马来语中称 Bendara（般陀诃罗），即宰相）而来。他们表示对舰队司令的到来感到高兴，更可喜的是有生意做。”^①

葡萄牙占领满刺加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控制海上霸权，垄断东方贸易；其二，打击异教徒，弘扬天主教。与华商保持友好关系符合其基本策略和利益。即便是占领了满刺加，将其变为了军事要塞，若使其失去商业重要性，便成了无用之地，因此，与华人交好便是维护满刺加的商业价值，使其继续作为中国货物的集散地。

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尔克占领满刺加后，继续和进一步加强了与粤人和闽人的关系。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巴罗斯（João de Barros）出版于1553年的《亚洲旬年史之二》记载：“阿方索·德·阿尔布尔克与这些广州/粤人（Chijs）为邻，每天都去看望，于是他们便看出了他要进城的决心。他们受够了（满刺加）国王的欺压，于是主动提出要陪他一起上岸。对此，阿方索·德·阿尔布尔克一表谢意，但未接受。他说道，葡萄牙人从来不需要帮助来对付摩尔人，因为天主会通过其使徒施以援手。冲锋陷阵时，只要呼唤主名。这天就是二号那天。为了敬主，要攻城。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他的小艇不够，无法送那么多的人上岸，请广州/粤人借给他一些小船。若广州/粤人和他一起坐小船，从那里去观看葡萄牙人是如何作战，并告诉（广州/粤人的）国王，请他乐与葡萄牙人为友，他将不胜欢喜。广州/粤人满口答应，满足了阿尔布尔克的要求。”^②

这段很早的葡语文献告诉我们，阿尔布尔克在征服满刺加之际，曾向华人借用关键的登陆艇来运送攻城人员，并欲通过华人，试图与中国皇帝联络。对此二要求，华人爽快答应。

佛罗伦萨人安波里（Giovanni da Empoli）^③于1514年6月27日从满刺加发出的一封信透露一个以前未知的有关华人参与攻打满刺加的重大隐情：“我们约有1500人。得到了约400广州/粤人（Cini）的帮助。”^④

可见，“广州/粤人（Cini）”，当然也包括闽人，为满刺加攻城战提供了登陆艇和人员。人力的投入几乎占到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一。满刺加沦陷后，双方关系仍然友好，甚至还有进一步的发

① 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oria do livro segundo do descobrimento &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Coymbra: por Ioao da Barreyra & Ioao Aluarez empresores del rey na mesma vniuersidade, 1552, p. 216. 有关英语译文，可见 Manuel Joaquim Pintado, *Portuguese documents on Malacca*, Kuala Lumpu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1993, p. 87.

② João de Barros, *Como Afôfo Dalboquerque fayo em terra e a força darmas tomou a ponte com victória que ouue delrey de Maláca e depois fe tornou recolher as náos e as caufas porque*, Asia de Joam de Barros, dos fac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 conquista dos mares & terras do Oriente. Segunda decada da Asia, Lixboa: Imprensa per Germão Galharde, 1553, p. 27. 有关英语译文，可见 Manuel Joaquim Pintado; M. J. Pintado, collec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Portuguese documents on Malacca*, Kuala Lumpu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1993, p. 163.

③ 关于此人，可见 Giuliano Bertuccioli, *Giovanni da Empoli e la Cina*, pp. 20 - 27; Matteo Salonia, *The first voyage of Giovanni da Empoli to India: Mercantile cultur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early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Portuguese Asia*, pp. 3 - 18. 著作有：Laurence A. Noonan,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a: 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 1989.

④ *Lettera mandata da Giovanni Da Empoli a Lionardo suo padre, del viaggio di Malacca,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a Toscana*, p. 63.

展。“此时，他身边的广州/粤人(chijs)请求离去。因为打仗的原因，他们得不到补给，阿丰索·德·阿尔布尔克送给他们多包大米和几匹来自欧洲的纺织品。他们视如珍宝。据他们说是前往暹罗(Syam)王国，阿丰索·德·阿尔布尔克问他们是否方便带一个他的人给暹罗国王送信，粤人欣然接受”。^①

从实际情况来看，此处的“广州/粤人”似应为“闽人”。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到，葡萄牙人在向满刺加以东地区扩张时，利用了华人的航行。葡萄牙人与暹罗的最早接触便是通过华人和华船而为。拿下满刺加后，葡萄牙人最希望到达的地方当然便是中国。最便捷之法莫过于搭乘中国人的顺风船。于是受阿尔布尔克之委派，欧维治于1513年5月搭乘华船来到广东珠江口大屿山的东涌，进行了交易。他是第一个抵达中国的葡萄牙人。此事意义深远，为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通过海洋发生而发生的第一次直接接触。1516年，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护送葡萄牙大使抵达东涌。在此接触了琉球人，于是在1518年派遣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去探查琉球。为此，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来到了“Chincheo”。

明朝官私文献对1518年的“Chincheo”之行未有留下任何涉及。这是一段汉籍中失落的中葡接触历史情节，因此只能依靠葡语文献来加以恢复和考证，以重构史实。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首次到达的“Chincheo”为何地？中外学者努力探索，成绩斐然。^②大多认为，“Chincheo”指漳州府治，亦不乏意见相左者。要弄清楚这个谜团，须从葡语文献入手。史料繁多，我们仅引用三条比较详细和权威的资料。

其一，御用编年史家巴罗斯在初版于1563年的《亚洲旬年史之三》中记载了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抵达东涌后派遣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前往“Chincheo”航行。此书的权威性堪比中国的《实录》，可被视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实录。

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述：“费尔南·佩雷斯(Fernam Perez)有唐曼努埃尔(dom Manuel)国王

^① João de Barros, *Como Afonso Dalboquerque fayo em terra e a força darmas tomou a ponte com victória que ouue delrey de Maláca; e depois fe tornou recolher as náos e as caufas porque, Asia de Joam de Barros, dos fac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 conquista dos mares & terras do Oriente. Segunda decada da Asia*, p. 276. 有关英语译文，可见 Manuel Joaquim Pintado, *Portuguese documents on Malacca*, p. 171.

^② 主要论文有：张增信著《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载“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1986年），第75-104页）；程绍刚著《“Chincheo岛”地理位置新考——“Chincheo”即漳州》（载《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68-77页）；金国平著《早期葡语文献中的Chincheo》（载金国平著《西力东渐——早期中葡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52-73页）；杨国桢著《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页）；《葡萄牙人在Chincheo：16世纪海洋史的一件公案 一、Chincheo的“海岸城市”指哪里？》（载《闽在海中》（福州：福建闽教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第265-279页）；廖大珂，辉明力著《16-18世纪初欧洲地图中的“Chincheo”港》（载《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59-176页）；廖大珂著《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在漳州的活动》（载万明等主编《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13-232页）；徐晓望著《海沧和月港——葡萄牙人地图上的“Chincheo”》（载姚金明，郝雨凡主编《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文化局，2014年），第135-147页）、《葡萄牙人地图上的“Chincheo”》（载徐晓望著《明代前期福建史1368-1521》（北京：线装书局，2017年），第296-300页）；（德）普塔克著《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载赵殿红，蔡洁华等译《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6-182页）；陈硕炫著《闽在海中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第83-99页；陈宗仁著《〈全海图注〉的绘制与福建海商：兼论16世纪葡语文献中的“Chincheo”》（载金国平主编《〈全海图注〉研究》《论文卷》（澳门：澳门基金会，2020年），第306-337页）、涂志伟著《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载《闽商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第9-26页）；《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载《闽商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第35-48页）等。

之命，要尽可能在中国这些地方多停留，以了解情况。当他在贸易岛 (ilha da Beniága)^① 时，那里来了一些琉球人 (Lequios) 的中式帆船 (Juncos)。在满刺加有消息说，他们住在毗邻中国海岸的一些岛屿上。他看到，他们的大宗商品是海量黄金，以及其他非常昂贵的货物。他认为，他们比广州/粤人 (Chijs) 的兴致要好，也更好相处，萌生了用葡萄牙人的眼睛亲自去看看他们家园的念头，于是命令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 (Iórgo Malfcarenhas) 驾驶他的大船 (nauio) 去执行。为此，得到了广东官员 (governadores de Cantam) 的许可。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随同几条中式帆船 (juncos) 一起离开了那里。中式帆船是去福建 (Foquiem) 省。该省沿海岸东行，过了广东省即是。因该省有一沿海城市名 Chincheo (hũa cidade que aly eftú maritima chamáda Chincheo)，我们的人后来去那里做贸易，一般以城称之 (geralmente lhe chamam o nome da cidade)。因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到达那里已晚了一些，无法从那里前往位于东方 100 多里格 (leguoas) 处的琉球诸岛 (ilhas dos Lequeos)。该岛群的第一个岛位于北纬 25 度半处。然后有一系列的岛屿呈一墙状，向东—东北和北延伸。与带去的广州/粤人引水员 (Pilotos Chijs) 商议后，决定不去琉球，留在当地贸易，其利润为广东的两倍，因为商人不光顾此地，本地货物价廉，外来货居奇。”值得注意的是，在 1563 年的官方编年史中，已经出现了“Foquiem”字样。从漳州海面返粤的情况是，“当费尔南·佩雷斯 (Fernam Perez) 从这艘中式帆船的船长欧维治 (Iórgo Alvarez) 处得知了满刺加的状况时，因为情况十分重要，他从陆地给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 (Iórgo Masfrenhas) 送去命令，召他从有消息说当时他所在的 Chincheo (cidade Chincheo) 城返回”。^②

这是两条关于 1518 年行最详细、最重要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1、1518 年行的缘起是遇到了琉球人，产生了派人去亲自勘察琉球的念头。2、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与中式帆船同行，并由华人领水员导航。此处所言华人应是闽人。欧维治首航广东所乘坐的是一艘中式帆船。可以推测，应该也是由闽人导航和驾驶。甚至在澳门开埠之后留下的航海日志中，屡屡提到“Pilotos Chincheos (漳州人/闽人领水员)”。3、依照中国制度，广州当局绝无可能允许葡萄牙人船驶向漳州。即便确有其事，也是一种违法的默许，所以中文史料中不可能留下任何记载。4、明确地说“Chincheo”是一个沿海城市。此处实际上是指月港。

杨国桢判断说：“‘海岸城市’的位置在河口之内，最大的可能就是月港了。……这一种解释，是用地理和航海常识推论的，虽然也没有文献的直接证据，不能作为定论，但显然比指为漳州府城合理得多了。”^③“海岸城市”即月港。

葡萄牙曼努埃尔 (D. Manuel I) 一世国王的御用编年史家达米昂·德·戈易斯 (Damião de Góis) 也记载了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抵达东涌后派遣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前往漳州海面的情形如下：“于是他于 1517 年 6 月，再次远航中国 (China)。他共率领 9 艘帆船 (velas)。他乘坐一艘。其余的船长为佩罗·苏亚雷斯 (Pero Foarez)、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 (Jorge mafcarenhas)、西蒙·达·阿尔卡索瓦 (Symão daalçaoua)、庞巴尔人氏 (põmbal) 若尔热·博特略 (Jorge botelho)，曼努埃尔·德·阿拉乌若 (Emanuel daraujo)、安东尼奥·洛博·法

① 在葡语文献中，“ilha da Beniaga” (贸易岛) 和 “ilha de Tamam” (屯门岛) 可互为同义词。“Tamam” 译为“屯门”。从对音上来说无问题，可中国地理中无“屯门岛”一名。“屯门岛”实为香港赤鱸角岛。

② 两处引文见：João de Barros, *Do que Fernam perez passou em quanto efleue na China, LIVRO SEGUNDO, Terceira decada da Asia de Ioam de Barros: dos fey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 conquista dos mares & terras do Oriente*, Lisboa: Por Ioam de Barreira, 1563, Fol. 52.

③ 杨国桢著《葡萄牙人在 Chincheo: 16 世纪海洋史的一件公案 一、Chincheo 的“海岸城市”指哪里?》，第 267 页。

尔康 (Antonio lobo falcam)、马尔廷·格德斯 (Martim guedez), 以及杜瓦尔特·科埃略 (Duarte coelho)。在这些人的陪同下, 他于8月15日来到了屯门澳 (ilha de tamanlabuú) 岛。该岛距陆地3里格。按照国王的命令, 所有抵达广东省 (prouinçia de Cantam) 的外国大帆船 (naos estrangeiras) 必须停泊在那里。广东系中华王国的一个省份。在到达该港之前, 他遇到了一支广东国王保护前来各港口的大帆船的舰队。广东省盗寇麇集。巡海见到我们的大帆船非常吃惊, 看我们这样子, 以为是什么新的海盗来犯, 于是率领众船向我们冲来, 几乎动起干戈。但费尔南·佩雷斯 (Fernam perez) 既无防卫的样子又无攻击的架势, 径直往泊屯门 (ilha de Tamam, 译者注: 赤鱸角岛) 岛。广东国王舰队司令亦来同港 [译者注: 东涌] 泊驻。他派人来问说, 我们系何国人, 为何而来。费尔南·佩雷斯一一做了答复并请他提供领航员带他去广州城护送他的主人——葡萄牙唐曼努埃尔国王派遣的一个觐见广东国王的大使。华人舰队司令派人告诉他说, 他马上通知位于前往珠江 (Cātam) 入口处的南头 (Nantó) 镇守备 [译者注: 南头备倭], 然后由他将其到来禀告广州大吏。

南头镇守备叫费尔南·佩雷斯改天去见他并派人告诉说已向广州派信差。但广州的答复迟迟未到, 费尔南·佩雷斯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率几条大船及小艇从他停泊的港口前往南头。南头距广州约15里格。他再未得到人称都堂 (Tutam) 的广州城大吏的口信。他在广州城主要大门处抛了锚, 停靠在一座如同我们家乡的那种有阶梯的石码头。码头对面有一小岛, 上面有一钟楼状的宝塔。广州城大吏习惯邀请他们视为贵宾的外国人前往那里。大宪欲邀请费尔南·佩雷斯, 但他以身体不适, 加以婉拒。他在此码头停泊了数天。

在此期间, 他与大吏及城中其他官员谈妥了他的事情, 将出使中国国王的使臣及几个随从留在城中。他则返回了屯门 (Tamam, 译者注: 东涌或赤鱸角岛), 在那里逗留了14个月。因为有唐曼努埃尔国王 (dō Emanuel) 的规定, 他要在中国 (China) 一带尽量多待, 清楚了解一切情况, 诸如当地贸易、国王的权力及领土。此时来了许多琉球人 (lequeos)、高丽人 (Guoros) 及日本人 (japangos) 的中式帆船 (jūgos)。他们带来的大宗货物是黄金, 且数量巨大, 所以他决定派遣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带领当地领航员及翻译 (pilotos, & lingua da terra) 前往这些省份。他跑遍了漳州 (Chincheo) 海岸。这一海岸无礁石, 村镇星罗棋布。在此航行中, 他遇到了许多远航他地的当地船只。在他停泊的一港口, 人们向他提供了福建一大城市 (grande cidade de Fuquiem) 的情况, 他扬帆准备前往那里。当他驶入一该城所在的一江口时, 收到了费尔南·佩雷斯 (Fernam perez) 从陆路致其数函, 要他返回, 因为回航印度的时间已到。他照做了并将此行所见所闻做了汇报。这些省份富庶、物产丰富。还谈到了它的贸易、家畜以及给养的供应情况。胡椒在那里比在广东 (China) 还畅销。这里的交易货物优于粤地, 市场亦优于粤地。”^①

这是关于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派遣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前往琉球, 逗留“Chincheo”最详细的记载。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因为它载于当时国王曼努埃尔的官方编年史中。时间也颇早, 出版于1567年, 距1518年之行只有半个多世纪。有关句子需要做一解读。“他跑遍了漳州 (Chincheo) 海岸”显然这是指从粤闽交界处至厦门湾内沿岸。从上下文来看, “他停泊的一港口”应为浯屿澳。“福建一大城市”当为月港。“河口”应为九龙江口。

^① Damian de Goes, *Chro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om Emanuel, Quarta Parte*, Lisboa: Casa de Francisco Correa, Impressor do Serenissimo Cardeal Infante, 1567, Fol. 30.

这条重要史料，我们在2000年的《早期葡语文献中的Chincheo》一文中，^①加以了翻译和介绍。此次对译文做了重新审定和若干修改，并新增两条葡萄牙文同时代的有关资讯，以期为1518年之行提供一个更全面地认识。

这条史料透露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是9名船长之一。他们达到的“屯门澳（ilha de tamanlabuá）”应该是现被香港机场所覆盖的赤蠟角岛。因为在东涌了解到了琉球的情况，所以才决定派遣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带领当地领航员及翻译”在去琉球的路上，“跑遍了福建海岸”。他停泊的一港口”应该是浯屿澳，“福建一大城市”当指月港。情况是“当他驶入一该城所在的一江口时，收到了费尔南·佩雷斯从陆路发给他的数函”。很明显，在“该城所在的一江口”一语中，“该城”是指月港，“所在的一江口”正是月港所在的九龙江口。福建给他的印象是“富庶、物产丰富”。在福建，胡椒比在广东还畅销。总之，闽地的商业前景要大大优于粤地。

其三，著名的葡属印度史家科雷亚（Gaspar Correia）在其《东印度传奇》（*Lendas da Índia*）中也用了较长的篇幅来叙述此次航行。

“当费尔南·佩雷斯（Fernão Peres）将他的好买卖安排妥当后，得知在广东以外，还有一个地方叫琉球（Lequia）。那里多金、银、丝绸和其他极其贵重的商品。他急于发现这块土地，于是就派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去那里。可他却来到了一个叫Chinchea的地方。那里的人比广东的人还要富有得多。在我们的船来到满刺加之前，此城（cidade）每年有四艘船去满刺加，满载金、银和丝绸。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与他们约定去满刺加，但他们未成行。他们善待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从他带去的货物中赚了不少钱。他们皮肤白皙，穿着整洁，文质彬彬，好像非常高贵。当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在那里时，费尔南·佩雷斯通过欧维治（Jorge Aluarez）的一条中式帆船（junco）从满刺加带来的消息说，在他启航时，唐阿莱克索（dom Aleixo）正好抵达满刺加。宾坦（Bintão）王正在攻打满刺加。满刺加遭到包围，需要救援。费尔南·佩雷斯于是准备急忙启航，以便能赶上季风离开。时值9月，传来了中国国王给大使的消息，于是他从陆路给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送去了一个口信，告知了一切，要他去贸易岛（ilha de Veniaga）。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照办无误。”^②

这份资料也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例如看出福建人的富裕程度要高于广东人。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邀请当地人去满刺加贸。他受到了热情接待，赚得钵满盆满等情况。

上述三份史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福建一大城市”“Chincheo城（cidade Chincheo）”和“此城（cidade）”。此处“城市”指何城？分析现有研究，计有漳州和月港二说。要到漳州，葡萄牙人的船要深入九龙江。出于安全的考虑，想必不会进入府治。那么我们就集中来分析月港说。

月港是漳州最大、最著名的市镇。它位于九龙江下游入海口，“海澄县在漳东南五十里，本龙溪八九都地也，旧名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至明生齿益繁”。明初当地已开始出现了私人贸易。宣德年间，已号称“小苏杭”。“正德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夷市”。遂成为“漳南一大市镇”。从1518年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初次来访后，九龙江口成为中葡贸易的中心。嘉靖年间，明谢彬之《邓公抚澄德政碑》有生动描写：“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

^① 金国平著《早期葡语文献中的Chincheo》，载金国平著《西力东渐——早期中葡接触追昔》，第52-73页。

^② Gaspar Corrêa; Rodrigo José de Lima Felner, *Lendas da Índia/Livro segundo, Em que se raccontão os famosos feitos d'Afonso d'Albuquerque, Lopo Soares, Doiogo Lopes de Sequeira, D. Duarte de Menezes, D. Vasco da Gama Visorey, D. Anrique de Menezes; lenda de 17 annos acabados no anno de 1526*,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1860, p. 529.

是名月港，迺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樯辐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夷之美，珠玑象犀家闾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①

徐晓望指出：“位于海澄县的月港，在明代前期就已成为漳州地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明中期的嘉靖年间，随着漳州一带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月港的繁荣日甚，‘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中一大都会也’。明代后期，月港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②

总之，葡萄牙语文献中的“福建一大城市”便是汉语史籍定性的“闽中一大都会”——月港。

经过对葡萄牙文史料的仔细研读，对于1518年之行的“Chincho”究竟为何地？著者认为：1、指泊地是浯屿澳。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因错过季风、未能前往琉球勘察而滞留“漳州府海面地方”贸易，^③到过浯屿，在驶入九龙江口逗留月港时，收到了召回令。2、指城市是月港，而非漳州。因被召回粤海，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虽已入九龙江口，但未能深入到漳州府治。^④

余 言

东方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是与明代中国直接交往的首个欧洲国家。葡人与闽人初识于沦陷前的满刺加。相交之初，双方便建立了堪称良好的人际与贸易关系。葡人所看重的也正是闽人的贸易实力及在东南亚和东亚贸易网络中的作用并企图加以利用。经闽人引领，葡人来航中国沿海。在粤海活动的同时，他们已经接触到琉球人，因而派人探查琉球，顺便来至闽海，开始交往闽地。

本文试图解答长期困扰中国火器史的一个问题。根据中外史料，闽商在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之前，已经接触到了源自印度南部传入东南亚的“佛郎机铳”。由于制造技术已大规模扩散，接触与仿制已变得非常普遍。因此，可以推断，陈寿祺的《福建通志·明外记》所载正德五年（1510年）魏升使用“佛郎机铳”百余门的情况是可信的。

本文所披露的大航海时代的葡语文献，对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的1518年“Chincho”之行有详述，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此行的始末及其在浯屿澳逗留和经商，而未能到达月港的往事。无论闽人以何种身份参与了海外贸易，都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欧洲大航海时代所掀起的全球化第一波的弄潮儿。他们的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贸易，更是在推动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了跨大陆交流的重要桥梁，为世界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本段引文，见（明）张燮等纂（崇祯）《海澄县志》卷一《建置》，载《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81，503页。

② 徐晓望著《闽商发展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

③ （明）严从简撰《殊域周知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23页。

④ 关于此点，可见金国平著《琉球闽南华裔“Cheilata”之生平与事迹——兼考“Os Gores”》，载金国平著《澳门学：探赜与汇知》，第49-51页。



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与美国的意识形态 及其扩张政策之抵牾

(德) 普塔克著；张丽华译

【摘 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系统，沿着这个复杂系统的许多分支进行的丝路交往大多是和平的，没有主导性意识形态，也没有推动领土扩张和对经济资源的无情劫掠。但是，大约从 1500 年开始情况则发生了改变，欧洲人通过开发环绕好望角和横跨太平洋的路线进一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系统。本文着眼于太平洋上的丝路交往和美国的作用，尤其是美国跨太平洋的扩张过程，认为这种扩张是由一种与传统丝路交往的本质特征所不相容的意识形态的驱动。亦即，与新教和加尔文主义思想相关的宗教元素以及对自己优越性的信念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一直是 20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且在今天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将有助于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复兴实践与美方相关意识形态及其政策间存在抵牾，在海上丝绸之路复兴实践中，无法回避美国政治的障碍性因素的存在。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美国政治；复兴；障碍因素；根源

一、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域空间、和平往来及殖民主义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实际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解读。如果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则需要对多条海上航线进行梳理，其中一部分是沿着亚、非海岸线延伸的航线，而另一部分则是穿越开阔的海域，将位于海洋“对岸”、相距十分遥远的区域连接起来的。另外，各条单一的航线是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开辟的，几个世纪下来，这些航线日渐融合，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换言之，在海上航线打通的最初阶段，海上及沿海各个区域的线路都是独立的，并且有着各自的交通路径。例如，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其他地区都是如此。这些区域系统的历史我们可以分别看待，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后者是基于上述各区域通过海峡连接的海上航线而形成的，而其相互之间的往来交流便是通过这些渠道而被逐渐“激活”的。

这里所说的往来交流并不仅仅指货物贸易，也包括文化产品，如语言、法律规范、科技知识、宗教及各种思想，这一切都是通过上述航线从一个港口传输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沿海区域传播到另一个沿海区域，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的。参与到这些区域内活动当中的，不仅有商人、

朝圣者、文人学者, 也有工匠、普通海员和其他各色人等。甚至一些在一定时期形成的沿海或海上联络网, 将一个区域内的几个地方或同时将几个区域之间长期地联系到了一起。政治意义上的边界通常只起从属的作用。事实上, 在发生区域危机时个别海上航线网往往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从而能够更为持久地幸存下去。相应地, 学术界将那些在海上活动、且不断变换的不同类型的团体、港口以及国家加以分类, 并以同样的方式对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交换活动进行分类。例如, 胡椒、丝绸和瓷器等某些商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持续不断地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海洋史的研究更多地将这一切作为一个长期现象 (*longue durée phenomenon*) 来探讨。^①

尽管沿海各地及海上航线不时有强盗和海盗出现, 但许多学者认为, 彼时整个沿海和海上系统的交流以及各个区域内部的交流主要是以和平的形式而进行的。我们也可以说, 由各种路径和航线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整体, 灵活地应对了彼时当地的危机, 从而确保其能够长久持续地存在。当然, 个别沿海国家被归类为海洋国家 (*thalassocracies*), 但如果它们征服了遥远的港口和广阔的领土,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物质掠夺乃至实行军事控制, 从而造成了长期的不平衡情况, 那就错了。事实上, 这一进程始于 16 世纪下半叶, 始作俑者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们之所以把葡萄牙人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 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各区域腹地占据大片领土, 而只是维持了较小规模的沿海基地的存在,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甚至只在已经拥有的领地上设立商业代表机构并进行经营。因此, 与其他欧洲人不同, 葡萄牙人无论在哪里, 几乎都能与彼时当地已存体制相适应。

那些彼时已存机构包括多个向来自不同国家商人开放的港口, 中国境内的港口也不例外, 例如, 在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中国的泉州和广州就列于其中。那时, 外国人住在所谓的“番坊”里, 中国方面给予了他们各种自由, 并保证其安全。^② 在东南亚和沿海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面向国际开放的外国人居住区。

当然, 和平往来的形象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被削弱了。例如, 蒙古人曾装备大型舰队以试图征服日本, 但没有成功。尤其是当蒙古人为击败宋朝最后的抵抗时, 曾把舰队部署到中国沿海地区。另外, 他们还曾经对爪哇岛采取过军事行动。另一个海上强国是印度南部的朱罗王朝 (*Chola dynasty*), 尽管人们对其知之甚少, 但通常认为, 它在 11 世纪曾对东南亚的一些地区进行施压和攻击。^③ 奥斯曼人也曾拥有强大的舰队, 以用于战争, 也用以攻击葡萄牙人。而来自日本的倭寇团伙则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沿海的村庄和城镇进行过多次袭击。然而, 上述列强都从未建成

①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往往与印度洋的历史混为一谈。关于印度洋历史的最全面、完整的著述应为 2012 年法国学者菲利普·博雅尔 (Philippe Beaujard) 著《印度洋世界》(*Les mondes de l'Océan Indien*, Paris: Armand Colin, 2012)。该书共有两册: 即《从国家形成到第一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 (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De la formation de l'État au premier système - monde afro - eurasiens "4e millénaire av. J. - C. - 6e siècle ap. J. - C"*) 与《印度洋——处于旧世界全球化的中心 (7 - 15 世纪)》(*L'Océan Indien, au cœur des globalisations de l'Ancien Monde "7e - 15e siècles"*)。这类研究通常只对南海的历史略加关注。其他持不同观点的著述, 可参见著者著《海上丝绸之路沿海空间、航海和前殖民时代的贸易》(*Die maritime Seidenstraße, Küstenräume, Seefahrt und Handel in vorkolonialer Zeit*, München: C. H. Beck, 2007)。

② 关于番坊的文献很多, 尤其是关于伊斯兰团体在中国港口中的活动。近期关于中国穆斯林的作品有 (美国) 贾志扬 (John W. Chaffee) 著《前现代中国的穆斯林商人: 亚洲海上贸易侨民的历史, 750 - 1400 年》(*The Muslim Merchants of Premodern China: The History of a Maritime Asian Trade Diaspora, 750 - 14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但是这部著作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③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集有赫尔曼·库尔克 (Hermann Kulke)、K·凯萨瓦帕尼 (K. Kesavapany) 和维杰·萨库贾 (Vijay Sakhuja) 合编《纳加帕蒂南到素万那维帕——对朱罗海军远征东南亚的反思》(*Nagapattinam to Suvarnadwipa. Reflections on the Chola Naval Expeditions to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后来欧洲人理念上的殖民地；他们对系统地开发当地的经济资源毫无兴趣，而且对他们来说，持续控制个别航线或大的海上区域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数量众多、当时可谓现代化装备船只的中国，也未曾有过将广阔的海外领土强行置于其统治之下的企图。

二、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等级制度和外交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是说海上航路及亚洲沿海地区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根本不存在等级制度。事实上，个别地方和国家统治者之间进行使臣交换是彼时体制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往往认为小国要从属于它们，但这绝不意味着人身制服和残酷的剥夺，而通常只是一种松散的、适当的、在某种规定范围内的礼仪关系。例如，当某些小国为了维护双边关系而派遣官方代表团前往中国时，会向朝廷进献贡品，他们同时也在广州或其他地方进行贸易活动。那么，赠送礼物则是一种向对方表示尊重的正式行为，而且很多时候，它与一个弱小国家寻求中国保护的愿望有关。此外，中国的朝廷也向外域客人回赠适当的礼品，有时回赠品甚至远远超过了所接收礼品的价值。例如在明代初期朝廷对外交往以及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使节交流活动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史书上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在“西方”文献中，这些“礼尚往来”的习俗往往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关系，欧洲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即德语中所谓的“Tribut”。然而“Tribut”的意思与中文的“朝贡”或“贡品”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在欧洲，国与国之间往往是一种强制的从属关系，假如弱者对强者不够驯服顺从，强者便很快会以惩罚和军事行动的后果来进行威胁。^①此外，回赠品也很罕见。强大的统治者们都期望得到昂贵的礼物，其中包括具有经济意义的商品。由此之后，“贡品”给奉赠方带来了持久的压力和负担。而在那些我们将其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沿海国家和地区，这种关系则比较少见，可能有例外，但并不非常规。即使是强大的三佛齐（*Srivijaya*）王国，据说也主要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而不是通过军事胁迫或经济压力来确保其对其他区域的影响。^②如果历史留给后人的这些印象是正确的，那么便可以推断出下列的情形是真实的：亚洲沿海和海洋国家间的接触，无论是各国宫廷之间，还是统治者之间，他们互相尊重，相互奖赏、授予头衔以及交换昂贵的礼物，在性质上更多地是具有象征意义。换言之，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文化和语言不同，但在外交“事务”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尽管很难找到具体的资料加以佐证，但是可以想象，中国在这方面起到了一种榜样的作用，这一点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认可。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和宫廷之间的相互包容对前殖民时代的商人和在海上航线网络上活动的人们的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竞争是允许的，但不得恶化为暴力行为。当然，个别倭寇集团相互之间争斗也是有的，而这些集团本身就是

^① 关于贡品和朝贡的问题，参见廉亚明（*Ralph Kauz*），罗茂锐（*Morris Rossabi*）编《中国帝国晚期的贡品制度和统治》（*Bonn: V & R unipress,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② 对于三佛齐的历史作用是有争议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参见赫尔曼·库尔克（*Hermann Kulke*）著《重访三佛齐：对东南亚海洋国家形成的思考》（*Srivijaya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State Formation of a Southeast Asian Thalassocracy*），载《法国远东学院学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102卷（2016），第45-95页。另见库尔克著《三佛齐——一个伟大的帝国抑或东方的汉萨同盟？》（*Srivijaya-Ein Großreich oder die Hanse des Ostens?*），载史蒂芬·康纳曼（*Stephan Conermann*）编《历史视角下的印度洋》（*Der Indische Ozean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Hamburg: E. B. - Verlag, 1998*），第57-88页。

犯罪团伙, 因此不能归于海上正常的商贸或外交活动之列。此外, 我们很难将其团伙首领的地位与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这样的人物相提并论。后者为了英国王室的利益而大肆掠夺外国船只, 而在今天的英国人们仍将他视为英雄。简而言之, 当英国的船只只为伦敦服务而扰乱国际贸易路线时, 亚洲君主的行为一般都比较宽厚包容, 用现代的话说, 君主们所感兴趣的是双赢局面。这种开放性会使人联想到联合国赋予其各成员国现代自决权的原则,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遵守这些协议规则。这个问题我们将另行讨论。

三、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

在历史上, 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宗教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传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 宗教总是以服务于世俗为目的, 然而很多次并非完全如此。在东亚和东南亚, 佛教和伊斯兰教, 以及中国个别有关保护神的民间信仰, 如妈祖, 这些宗教或信仰往往是在没有统治者参与、没有国家行为推动的情况下, 从一个海岸跨海传播到另一个海岸。即使是天主教的传教士, 特别是耶稣会士,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并非主要为了欧洲的王室, 相反, 他们是为了罗马的利益, 也就是为了教会本身的利益。而据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 16、17 世纪在亚洲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们有时非常欣赏亚洲东道主的文化, 经常将亚洲的正面形象介绍到欧洲。^① 此外, 天主教会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在某些方面也接纳了当地的观念, 而并非始终坚持其严格僵化的宗教原则。与其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在佛教徒、东南亚的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仰的群体中窥见一斑。

然而新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却并非如此。他们缺乏像天主教会那样灵活的跨国组织, 因此, 受新教和加尔文主义影响的传教活动, 反而有意或无意地为各自原籍国的国家利益和商业目的而服务。此外, 某些思想观念助长了以新教为主的大国的扩张冲动。例如, 按照加尔文主义的说法, 那些受到“上帝恩典”的人将获得财富和声望, 成为成功人士。因此, 这注定使通过条约和战争征服外国人的行为合法化。

当然, 亚洲沿海地区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宗教纷争。例如, 由于 17 世纪欧洲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随之双方在亚洲的海区也发生过冲突, 因而对这一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在此之前, 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在西亚和中亚的某些地区也发动过战争。但受到这些事件影响的更多的是大的陆地区域, 而对港口和个别沿海地带的的影响并不大。即使是在大约 1500 年时以及此后不久葡萄牙小舰队和伊斯兰政权之间的冲突也不应被过分渲染。因为这些冲突仅仅局限于阿拉伯海的某些区域, 而从数字来看, 这些冲突也都无甚意义。此外, 葡萄牙人与伊斯兰国家之间很快就达成了和解协议。后来的欧洲殖民国家的情况则不同, 特别是信奉新教的国家在

^① 除耶稣会士外, 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评价尤其正面。参见鲁伊·曼努埃尔·卢雷罗 (Rui Manuel Loureiro) 著《贵族、传教士和官吏——16 世纪的葡萄牙和中国》(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Lisbon: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中的有关章节。亦见弗朗西斯科·罗克·德·奥利韦拉 (Francisco Roque de Oliveira) 博士学位论文《1500 - 1630 前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建构: 向有教养的欧洲展示中国的印刷品和手稿》(A construção do conhecimento europeu sobre a China, c. 1500 - c. 1630. Impressos e manuscritos que revelaram o mundo chinês à Europa culta, Barcelona, Departament de Geografia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2003); 路易斯·菲利普·巴雷托 (Luís Filipe Barreto) 著《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澳门——权力与知识》(Macau: poder e saber. Séculos XVI e XVII, Lisbon: Editorial Presença, 2006)。

亚洲不断卷入战争，其原因在于他们坚信自己有权支配其他国家，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①

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所介绍的，只是对当时情况的高度概括。这可能不会令每个人都心悦诚服，也许有人会因持有不同见解而拒绝接受这一观点，或许还有人视之为夸大其词。然而，即使有人持不同观点，也依然可能失之偏颇，未必不带有片面性。时至今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被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甚至有时被工具化。本文之所以刻意将一些基本特征陈述出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论述。

四、亚洲海洋空间的开放和早期跨太平洋的航运

直至 1500 年前后，海上丝绸之路系统几乎是一个自成一体的航线和港口网络。然而，学者们却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定义其确切的范围，例如，对于朝鲜海峡以北的地区是否应该包括在内，存在着分歧。不过，由于日本海（古称鲸海）和鄂霍次克海内部的交流关系本来就不是很重要，因而这个问题在这里可以忽略。也许考虑如何研究爪哇岛和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以东的许多海域和海路、苏禄海的局势以及苏门答腊、巽他海峡、马尔代夫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之间偶尔的联系，更有意思。但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个次要的话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对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各种问题做一些宏观方面的探讨。

更为重要的是，15 世纪末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之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网络系统在其西南端被打破了，这一点我们不可忽视。之后，亚洲生产的一小部分货物跨越大西洋流向欧洲。欧洲不再仅仅通过与黎凡特（Levant）或埃及和北非的贸易来获得其供应的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和其他热带产品。文化交流也是如此。此后的几十年里，里斯本 - 果阿 - 马六甲 - 澳门航线便构成了新的欧亚轴线的核心。

第二个重要变化始于 15 世纪 20 年代葡萄牙人费尔南多·德·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穿越太平洋的探险航行。他在西班牙军队服役期间曾到达过菲律宾。诚然，在那时西班牙想要在吕宋岛站稳脚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太平洋航线的探索为海上丝绸之路与美国的连接铺平了道路。^②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亚洲人的早期移民活动，他们从台湾和东南亚进入太平洋世界，最终到达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这一切与我们的主题无关，因为在此期间，南太平洋地区的

① 与之相关的观点是“人们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如果其他国家禁止自由贸易，那么与其抗争便是正确的。例如，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彼得·博施伯格（Peter Borschberg）发表过数篇关于格劳秀斯的研究报告。这里只提及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格劳秀斯、葡萄牙人和东印度群岛的自由贸易》（*Grotius, the Portuguese and Free Trade in the East Indi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11）。

② 目前正在举办一系列纪念麦哲伦穿越太平洋探险航行的活动。有关麦哲伦的生活和工作的最新一部主要作品是何塞·曼努埃尔·加西亚（José Manuel Garcia）著《费迪南·德·麦哲伦：英雄、叛徒或神话——第一个拥抱世界的人的故事》（*Fernão de Magalhães: herói, traidor ou mito. A história do primeiro homem a abraçar o mundo*, Queluz de Baixo, Manuscrito, edit. Presença, 2019）。另一本新文集是维托·路易斯·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Vitor Luís Gaspar Rodrigues），安娜·保拉·阿维拉尔（Ana Paula Avelar）合编《费迪南·德·麦哲伦和海洋知识——第十六届海洋历史研讨会文集》（*Fernão de Magalhães e o conhecimento dos oceanos. XVI Simpósio de História Marítima*, Lisbon: Academia de Marinha, 2020）。马鲁古群岛（又名摩鹿加群岛；印尼语 Kepulauan Maluku）在跨太平洋交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这些岛屿历史的新论文集可见哈维尔·塞拉诺·阿维列斯（Javier Serrano Avilés）、豪尔赫·莫哈罗（Jorge Mojarro）主编《香料群岛——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西班牙和摩鹿加群岛》（*En el archipiélago de la Especiería: España y Molucas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Madrid: Agencia Española d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el Desarrollo (AECID) and Desperta Ferro Ediciones, 2020）。

有关岛屿与东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定期的海上交流。^①

随着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现身, 新的情况出现了。马尼拉的行政当局被正式划归西属美洲, 这样一来菲律宾便成为一个殖民地下的殖民地。那时西班牙的船只定期从墨西哥航行到吕宋岛。西班牙人还控制了通往菲律宾的海上航线上的一些太平洋小岛。对于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回程, 西班牙人通常选择的航线是沿着台湾东部海域驶往日本、再从那里返回美洲。因此, 西班牙船只在马尼拉或日本装载的亚洲产品一般先到达美洲, 再从那里运往西班牙。这些货物包括中国的丝绸和东南亚的香料。那时西班牙本土的塞维利亚市被认为是亚洲产品的重要市场。这样, 通过第三条线路便将欧洲与最初的海上丝绸之路系统联系起来。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 全球化的进程始于跨太平洋的海上交通。但在太平洋西侧航线开通的过程中就给海丝路系统投下了阴影, 而且这一影响是迅速的。当荷兰人在 1600 年前后出现在海上, 并在此后不久从巴达维亚出发, 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海域进行袭击时, 不仅马尼拉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地方受到威胁, 而且台湾岛也受到威胁。在贪欲之心的驱使下, 荷兰人掠夺了中国的、伊比利亚的以及一些属于其他地区的船只, 并最终占领了台湾沿海的几个小地方。这促使西班牙人同样也在岛上建立了定居点, 而这些定居点的供给又是由马尼拉提供的, 这意味着美洲也间接地参与到了其中。因此, 在一段时间内, 台湾成了全球竞争对手的玩物, 这严重地伤害了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利益, 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尤其是荷兰人, 使台湾人经历了一个异常糟糕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 葡萄牙人并没有参与到这些角逐活动中。随着郑成功对荷属东印度公司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VOC) 的胜利以及不久之后清王朝对台湾岛的收复, 情况出现了好转, 台湾的局势得以稳定, 海上丝绸之路系统东亚部分的往来关系也同样得到了加强^②。似乎可以说, 尽管欧洲人在这些地区扩大了他们的跨太平洋联系, 但该航线系统又暂时回归到了类似于其早期的状态。

当然, 这些考量涉及了很多因素。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在此期间, 日本已将自己孤立了起来, 它只允许来自巴达维亚和中国的商人进入该国。总体而言, 日本市场也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许多港口蓬勃发展, 尤其是福建华人的贸易网络向各个方向扩展, 四通八达。这一切都与日本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假设当时有系统性的统计数据的话, 那么可以显示出, 中国船只在数量上已经主导了东海和南海的长途交通运输网以及东南亚个别地方的许多区域间的联系。简而言之, 在上述地区的海上贸易总额中中国人肯定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估计在投资和资本流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这一时期的情况大致如此。在这种背景下, 清政府以及彼时仍为独立国家的东南亚各国依然坚持海上丝绸之路体系的传统理念, 即他们关注的是和平交流, 这一点不可忽视。这意味着朝贡关系的传统仍然得以延续, 个别港口仍以多元文化为导向, 北京政府很少或从不干预、也不影响外国领土的政治进程。

在印度洋盆地, 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这里, 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迅速地凸

^① 关于台湾史前史、特别是进入考古发现时期的最新研究有柯兰 (Paola Calanca), 刘益昌, 梅豪方 (Frank Muyard) 合编《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早期台湾海洋景观的研究》(Taiwan Maritime Landscapes from Neolithic to Early Modern Tim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22)。

^② 许多英文和荷兰文的作品从殖民的角度报道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活动。著者有不同的看法。见其《论台湾从荷兰枷锁下的解放——350年前郑成功驱逐荷兰人》(Zur Befreiung Taiwans vom holländischen Joch: Die Vertreibung der Niederländer durch Zheng Chenggong vor 350 Jahren) 一文, 载《世纪》(Saeculum) 第 62 期第 1 册 (2012 年), 第 113 - 134 页。

显了出来。亚洲的其他贸易商运营的海上航线网络似乎非常零散，缺乏可与东南亚华人相提并论的强大商业实力。尽管印度的各个集团成功地驾驭并利用了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欲望和扩张计划，但印度和西亚的沿海国家无法对抗欧洲人的军事野心。

我们再回望一下马六甲和新加坡以东的海域。随着英国航运业的兴起以及英国在海外强行掠夺土地的力度加大，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及港口面临了新的挑战。很多细节是众所周知的，例如，鸦片生意以及从中国到东南亚的和到美国的人口贩卖等悲惨事实，这里就不特别提及了。与此相反，研究丝路的学者们对北美在与东亚和东南亚有关的海洋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关注较少。下面我们将对始于西班牙人跨太平洋海上联系的主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五、美国的特点：“昭昭天命”、贪婪性及扩张性

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特别是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期望、习俗和行为，显然有悖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特征。在西班牙开辟了墨西哥和马尼拉之间的航线之后不久，太平洋上出现了其他欧洲人的身影。因此，原本自成一体的海上丝绸之路体系受到来自其东侧的压力越来越大。最初，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地区，但在19世纪，华南沿海和东海周边地区也日益受到殖民列强的关注。那时的清政府低估了外来殖民者的危险性，致使自18世纪起快速扩张的福建私营航运业，也受到了外国竞争的影响。欧洲人在长途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货物流动的结构在一些地区发生了变化，在很多地方，外来者将其自己的贸易惯例和法规强加给本土的亚洲人，并取代了当地的习俗。尽管中国本身和许多其他地区的人口增加保证了需求的增长，但这些因素并非完全有利于亚洲商人，而是相反，削弱了他们在贸易中的地位。

另一个发展变化是19世纪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即来自美国的船只也很快驶过了太平洋，随之东亚便出现了另一个强权。这个新强权受到基督教新教传统的启发和强烈影响，对太平洋地区产生了威胁，它深谙如何将部分贸易从亚洲转移到北美。北美的商人、外交官和军事人员的身影出现在远离他们真正的家园的大太平洋东亚地区，这可以视作美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也可以说，这个阶段与北美人口由东向西迁移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众所周知，那时来自北美东岸的定居者和移民已经占据了现在美国的中部地区，并最终到达了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海岸。这种扩张经常伴随着暴力和战争，而主要的受害者则是那些地区的原住民，以及那些暂时取得了佛罗里达和现今墨西哥以北地区统治权的西班牙人。在向西迁移的定居者及其政治领导人的眼里，不仅印第安人是“二等公民”，而且所有拉丁美洲人，即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天主教为主的人口也是“二等公民”。由此可见，尽管在19世纪初美英之间也发生过冲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实际上延续了后者的邪恶传统。^①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美国早期的欧洲移民的宗教背景绝对不可忽略，否则就很难理解美国的领土扩张行为。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对事实做更深入的解读。由于受宗教思想的驱使，第一批欧洲人跨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这批移民中的许多人所信奉的是，他们可以

^① 与此相关联的所谓“黑色传奇”颇有意味，它所指的是英国人对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历史及天主教活动的系统性诋毁。今天，中国的形象在英文描述中经常被抹黑。见著者撰《“黑色传奇”作为海洋历史的工具：从反伊比利亚到反中国的猎杀》（“*Leyenda negra*” als Instrument der maritimen Geschichte; von der anti-iberischen zur anti-chinesischen Hatz），载《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第32期（2020年），第147-180页。

在上帝的指引下到美洲大陆的“新世界”开始更美好的生活，上帝所赐予他们的恩惠之一，就是有权在北美开疆拓土并进行耕种。出于鼓励更多的移民向西推进之考量，一种发展成熟的“理想信念”——追求成功——便迅速地植根于商人、军事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而且根深蒂固，几近于一种执念。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美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体系使其对于追求极致化的极端立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成功往往成为唯一重要的追求，尤其是在物质方面。如果将这一点放大，我们不妨说，在倡导开放的同时，这个新兴国家的许多公民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缺乏宽容精神。甚至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使用黑人“仆人”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属于这一类。^①

虽然美国在发展过程中某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奇特”的情况，但那里很多的人们坚信自己的命运与上帝有关。这就产生了“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译为“天命昭彰”）的主导信念，它是以宗教观念为指导的一个惯用措辞，甚至发展成为美国人的“口头禅”。^②以至于许多人把这种信念与后来所谓的关于美国对美洲大陆控制权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联系在一起，而不少美国领导人认为他们不仅被上帝赋予了向西扩张甚至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天命，而且有责任将美国的文化和道德规范超越自己的国界，传播到世界各地。因为美国正是借助于这些理念和规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使之不断日益强大。更糟糕的是，有时这种信条主张的代表者表现得非常执着而毫无妥协之意。他们对待优秀的外国文化的态度几近扭曲，他们的使命感与激进的追求齐头并进。其他“理想信条”，如“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也称“美国卓异主义”）也都与此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由过度的民族主义、自信、种族主义和夸张的宗教因素组成的混合体，对美国以外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也是十分危险的，这一事实无需解释。

美国在其领土之外的扩张努力，最初是针对以天主教为主的西班牙裔世界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1824年，美国人对波多黎各进行了干预，在19世纪40年代，墨西哥成为受害者，随后是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国。美国攻击的另一个目标是古巴。在与该岛的冲突中，建立了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西班牙语：Base Naval de la Bahía de Guantánamo）。过去，那里的监狱因其持续侵犯人权而臭名昭著。即便是在最近这个时代，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实施干预措施的清单也可以列出一长串。格林纳达（Grenada）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83年，华盛顿当局出兵占领了该岛，美国政府所忌惮的显然是格林纳达会因过度依赖古巴和尼加拉瓜，而最终倒向这两个国家。

^① 插入一个简单的对比：宋朝时，来自蒲端（大概应为现在的棉兰老岛的布端）的使节送给中国宫廷的礼物中包括昆仑奴。但大宋皇帝“悯其异俗，离去乡土，命还之”。由此可见，当政者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因为他知道，外乡人有不同于中国的习俗，他们远离故土，痛苦不堪，在异国他乡缺少家的感觉，于是命令将其归还。见《宋会要辑稿》第197册及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辑《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页。

^② 对于“昭昭天命”这个信条存在各种观点，比较重要的研究如下：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著《种族与昭昭天命：美国种族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起源》（*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弗雷德里克·梅尔克（Frederick Merk）著《重新解释美国历史上的昭昭天命和使命》（*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interpret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安德斯·斯特凡森（Anders Stephanson）著《昭昭天命：美国扩张主义和实践权利的帝国》（*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马克·S·乔伊（Mark S. Joy）著《1783-1860美国的扩张主义，昭昭的命运？》（*American Expansionism, 1783-1860: A Manifest Destiny?* London: Routledge, 2014）。

类似于对格林纳达的干预行为，对于美国来说并不罕见。那些公开反对华盛顿当局的外国政府，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左派甚至是革命政府，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与此相反，在其他情况下，华盛顿政府却支持不少那些在自己国家蔑视宽容精神、无视人类尊严的独裁者，并采用了赠款、特别条约、军事援助等形式对其进行资助。这些基本上都与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相关，比如，关系到重要的原材料供应问题。

上述例子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令人恐惧的矛盾现象。即使在今天，与“昭昭天命”口号相关的“崇高”追求也往往要服从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虽然他们宣扬的是民主和开放，但在政治上他们并没有始终遵守自己的准则。因为“昭昭天命”的信条与另一要素相关联，即意识形态必须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符、更确切地说是要与那些富有的企业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这一要求相一致。有趣的是，他们要让现代经济学的学生都必须明白，要最大限度地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就要将所有成本降至最低；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类似于一种不可否认的宗教教义；企业家应通过一切合法手段谋取利益；而谁如果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谁就不可避免地要倒下并最终灭亡。将其推演到华盛顿政府的政治行为，便是超级大国绝对不能表现出任何弱点，它必须是世界第一，谁都不能取代它。换句话说，由于制度上的原因，美国必须始终只关心自己；其他人的命运是次要的。“一个无私帮助他人的美国”这种梦想是无稽之谈。

六、美国的进步是以牺牲东亚海洋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

牺牲他国利益，赢得自身发展和进步，这一观念也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核心，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是其奉行的信条。让我们再看看19世纪的情况。中途岛（Midway Islands）应该是在1800年之前不长的时间里被一位西班牙船长发现的。而在19世纪50年代却被美国首先宣称拥有该岛的所有权，并在稍后正式占有。出于军事原因，当时他们将其与夏威夷群岛分离开来。

当然，夏威夷群岛本岛更为重要。16世纪的老地图显示，西班牙人很早就到过这些岛屿。但英语系国家的历史经常将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作为其实际的“发现者”。尔后，在19世纪初，另一个大国进入了国际舞台，即俄罗斯，它在远东地区进行扩张，甚至计划将夏威夷划归为沙皇帝国所属，并将其作为俄罗斯加强在阿拉斯加地区地位的侧翼措施。但这些计划一无所获。美国的定居者们显然是受新教传教士的激励而到了夏威夷并在那里建立了甘蔗种植园。当地的原住民深受其苦，他们不得不为新的定居者出卖劳力，人口数量也随之减少。此外，当地原住民君主的权力被削减，同时来自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也不得不离开这些岛屿，这些对于说英语的新移民来说当然是非常有利的。

夏威夷群岛的历史也与其他事件的发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将一部宪法强加给当地的君主，并很快改变了当地延续了多年的君主制，这对当地的原住民本身是不利的，同时对从中国和日本移民到岛上的定居者也非常不利。1893年美国军方甚至还对该地进行了军事干预，最终，人为地创立的夏威夷共和国（Republic of Hawai'i），并使其“加入”了美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事实上，这是一次无情的吞并。与之相关的、并不应忘却的是，1897年日本曾派遣船只前往夏威夷，以保护当地的本国定居者，这让华盛顿当局非常不悦。另外，1898年的美西战争也不应被遗忘。那时美国人已经认定珍珠港（Pearl Harbor）是一个适合于其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的军事

基地, 其重要性可与古巴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相媲美。^①

19世纪下半叶, 美国侵占了太平洋上其他的岛屿和珊瑚礁。这些岛屿包括豪兰岛(Howland)、贾维斯岛(Jarvis)、威克岛(Wake)等地, 据称都是“无人居住”之处。还应该提及的是约翰斯顿环礁(Johnston Atoll), 它后来被美国用于军事目的, 并作为有毒化学武器的储存地。然而, 更重要的是美国接管了关岛(Guam)和菲律宾。^② 后者曾一度试图摆脱西班牙的统治, 但随着美西战争中美国对西班牙的胜利, 美国遂成为菲律宾群岛的新殖民国。伴随着这一变化而发生的战事使菲律宾大量的人民成为受害者。20世纪初发生的新战事, 对菲律宾南部的伊斯兰地区影响尤为严重。为了更好地控制棉兰老岛(Mindanao)和其他岛屿, 美国人推动了北方人迁往南方定居的计划, 这导致了至今尚未平息的紧张局势。此外, 美国对该群岛经济的大规模干预, 对其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关于美国所谓对日本“开放”的文章有很多。“开放”实际上始终伴随着粗暴的威胁。鲜为人知的是, 美国曾考虑过将琉球群岛据为己有。另外, 华盛顿上台后很快就试图煽动日本对抗俄罗斯, 这当然也符合英国的利益。而从英、美的角度来看, 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舰队可谓适逢其时, 正中下怀。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也受到了华盛顿的青睐, 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阻止俄罗斯的扩张, 同时也是对清朝政府施压。

事实上, 美国的行为已经以多种形式让中国感受到了其“昭昭天命”信条的阴暗面。一方面, 19世纪中期美国商人参与了鸦片贸易, 另一方面, 在19世纪下半叶, 美国用邪恶的方法将中国移民引诱到北美。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两者都是犯罪。世界上第一个“毒品卡特”是英国人组织的, 英国商人和美国企业家从中大发横财。在讲英语的人眼中, 中国是无足轻重的, 他们对清政府进行无情的盘剥, 这也与伦敦及华盛顿的商人和政客的使命感不谋而合。同时, 人们就像奴隶一样被从中国的港口贩运到了美国, 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和船长都曾参与其中, 而面对许多人在跨越太平洋的漫长旅途中死于疾病的事实, 他们商人和他们的政府却熟视无睹, 绝大部分人也都感到心安理得。那些被贩运的人到达美国之后, 其生活根本没有变得更好, 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盘剥。在他们所谓的合同到期后, 许多人试图开始新的自由生活, 却遭到美国社会的反对。中国人被歧视, 墨西哥人和当地的土著人也同样被歧视。

让我们再回到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这个话题。如上所述, 西班牙已经开放了其领土的太平洋一侧, 致使那个曾经封闭的、自我平衡的海上航线系统被打破。这一开放的早期阶段留下了一些历史印记。但是随着英国和美国随后的出现, 西班牙被挤出了太平洋, 该系统的航线网络因此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知道, 鸦片在其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之前, 早是一种昂贵的医疗品, 并不用于大众消费。另外, 在此之前奴隶贩运在印度洋的某些地区很常见的, 例如, 非洲人作为奴隶被带到西亚的一些港口。但这项生意的规模很难与19世纪发生的情况相提并论。顺便说一句, 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参与了中世纪人口贩运的活动。关于许多非洲奴隶在广州劳动的说法完全是无

^① 很多关于夏威夷历史的著作中的观点往往是非常片面的。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 努诺伊·K·席尔瓦(Noenoe K. Silva)著《被背叛的阿罗哈——夏威夷原住民对美国殖民主义的抵抗》(*Aloha Betrayed: Native Hawaiian Resistance to American Colonialism*,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最新的研究有诺埃拉尼·阿里斯塔(Noelani Arista)著《王国与共和国——夏威夷主权和早期美国》(*The Kingdom and the Republic: Sovereign Hawai'i and the Early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

^② 有关关岛历史综述的著作不多。其中一部为罗伯特·F·罗杰斯(Robert F. Rogers)著《命运的落脚点——关岛的历史》(*Destiny's Landfall: A History of Gu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稽之谈。在唐代文献里出现的昆仑奴，据推测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到中国的，相比黑人奴隶在美国田间劳作的生活条件，当时昆仑奴的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至少没有那么苦。然而，一个有影响力的海上超级大国，通过激进意识形态使其活动合法化，嘴上宣扬的是宽容忍让，而行动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加上嗜财如命，将金钱和利润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这在前殖民时代毕竟都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金钱和利润总是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但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最大化意识形态而同时对道德和法律的蔑视并不符合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总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出现，就像荷兰和英国的出现一样，他们所秉持的信条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传统特点和价值观格格不入。

七、我们的时代：美国的例外主义、被操纵的观念以及媒体暴力

19世纪美国将其向西扩张行动推进到了东亚海岸，20世纪时，即使日本和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实际上应该独立的琉球群岛，也暂时处于华盛顿当局的控制之下。时至今日，琉球群岛对美国军队来说尤其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活跃于东亚大陆，朝鲜战争和在越南的战争便是最好的实例。站在今天的立场放眼长远，这两种情况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特别是在越南，美国人遭受了巨大的挫折。现在他们正试图通过“外交”平衡，将东南亚国家拉到他们一边，以对抗中国的利益。

尽管美国军队不得不放弃在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军事基地，但其在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并无太大的变化。我们都不会忘记“美国优先”的口号，我们也清楚“美国例外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些基本上都是“昭昭天命”信条的延续。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大肆宣传美国的特殊作用，从而使其外交政策合法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犹太裔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就认为，美国的天职是确保全世界的和平与自由。^①

将这种观念及类似的思想与所谓的美国“开国元勋”（Founding Fathers）联系起来，显示出了美国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它往往以一种威慑的方式出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作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职期间的副总统，两人一起推动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来，切尼在与女儿合著出版的一本书中强调，美国是一个真正特殊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②事实上，华盛顿政府的军事干预并不鲜见，它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天然领袖的角色，从而使其军事干预合法化。时至今日，美国认为它不必遵守国际规则，这一理念依然普遍存在。这个世界领先的国家，可以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华盛顿政府并未在联合国所有的机构中都设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各种指导方针和决定，只有符合美国利益、对美国有利，才会被他们接受。

有关美国的独特命运和特殊作用的信念自然也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许多关于美国历史的作品，就像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一样，主要是根据他们本国的标准来书写的。另外，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发出了据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非常客观的模型。而问题是，如果这

^①（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著《美国政治的目的》（*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②（美）迪克·切尼（Dick Cheney），（美）丽兹·切尼（Liz Cheney）著《卓异：世界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Exceptional: Why the World Needs a Powerful America*,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5）。

些模型来自美国, 它们通常带有北美自己的印记。他们声称是客观的, 而事实上, 相关作者的写作只局限于其主观范畴, 或者只局限于其所处环境的一般普通范畴。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因此, 对英语系国家的人所持的观点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们也可以说: 美国学者对历史没有解释的主权, 他们只是对某些情形进行假设, 有时是有目的的, 有时是无意识的, 因为他们对其他观点视而不见, 或者不想容忍。

众所周知, 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也会利用谎言并歪曲事实。对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正当性, 便一清二楚了。实际上, 这与美国所宣扬的主旨信念和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欺骗手段是无情的企业家和军队常常采用的商业伎俩。而一般来说, 一个认为自己必须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大国总是会试图操控各种立场和观点, 甚至操控其盟友, 以维护自己的立场并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理想追求最大化相契合的, 这也意味着, 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不必再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审视, 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迅速地被重新解读。然而, 为“美国例外论”服务的科学当然也蕴含着危险, 正如我们随时所看到的那样。

事实上, 并非所有美国的学者都愿意支持本国商界和政界精英的傲慢态度和立场,^① 他们也批评美国制度所采用的双重标准, 并指出, “美国优先”与“美国例外论”等口号所承载的是帝国主义的意图, 曾经遭到其他国家的拒绝。从制度的角度说, 美国想成为一个榜样, 但是同样由于制度的原因, 它产生了许多矛盾, 制度也遭到了拒绝和不信任。这种情况本身是悖理的, 是自相矛盾的。因此, 所谓的天然领袖的特殊角色也引发了反对的声音。值得警惕的是, 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早就花言巧语地声称, 有的国家和文化也产生出相当于“美国例外论”的传统, 他们列举中世纪时蒙古人的对外扩张, 甚至有人考虑是否也可以给中国冠以“中国例外主义”(Chinese Exceptionalism) 之名。按照这些人的怪论, 中国的“傲慢”态度有着古老的根源。^② 因此, 美国以其自己的“崇高”目标为旗号, 认为必须遏制北京所谓的“扩张政策”。

由此不难看出, 美国这样来描绘他国的目的只有一个: 通过对他国的负面报道来分散读者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注意力。更糟糕的是, 如果真相被媒体或者学术界长期歪曲, 那么虚假的形象就会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人们就会以讹传讹。不幸的是, 这种洗脑就像一种遗传疾病, 可以代代相传。直言之, 英语系国家的媒体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全球的舆论, 许多国家的人们在北美的学术机构和同事面前卑躬屈膝, 表演磕头秀。这使得我们从事物的本身正确地看待其本质而变得愈来愈困难。

八、美国吉哈德圣战、查戈斯群岛及南海诸岛

上述情况表明, 美国在亚洲的出现, 进而在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内的出现, 与亚洲人的观念难以融合, 这种解释既适用于过去的历史、也适用于政治现实以及我们当前的时代。中国希望通过

^①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是一位著名的批评家, 在中国也很有名。乔姆斯基指出了美国媒体所扮演的危险角色。

^② 关于该主题的早期研究有: 本杰明·子恩·何 (Benjamin Tze Ern Ho) 著《了解中国的例外主义——中国的崛起, 它的善良和伟大》(*Understanding Chinese Exceptionalism: China's Rise, Its Goodness, and Greatness*), 载《选择性——全球、本地、政治》(*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第39卷第3册 (2014年), 第164-176页。该著者将其扩充为《国际秩序和全球领导力——中国的政治观和中国例外主义》(*China's Political Worldview and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Leadership*,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

全新的磋商来复兴传统的价值观、恢复原有的与各国各地区的友好关系，这恰恰是自古以来沿着海上轴线发展的特点，即创造新的双赢局面，从而确保和平大局。由于制度的原因，这不可能符合华盛顿方面的利益，“超级大国”很难将其视为积极的行动。因此对于这样的局面，美国既不能、也不会适应，却又无力退出。尽管美国内部也有批评的声音，但它仍被其荒谬的“理想”所束缚。这对亚洲海上联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很难预测。然而，很明显不会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如上所述，对于联合国坚持自决的原则，中国和其他亚洲沿海国家都予以尊重。而华盛顿方面却坚持自己的标准。几年前，基思·阿布洛（Keith Ablow）甚至认为应该有一场“美国圣战”，在他看来，如果所有人都像美国一样行事，许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福克斯新闻（Fox News）等机构对该提案进行过讨论。^① 阿布洛所用的措辞听起来十分荒谬，这一点无需解释。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激进运动，它表现出了那些宣扬“美国优先”理想的人的极端化倾向。

现回到海上航线和重振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一主题。如果后者被理解为一个与沿海地区相关的线路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构，连接着从日本海到至少是阿拉伯半岛的整个海洋链，那么，南海和马来半岛大致处于整个结构的中间地带。著名的《郑和航海图》记录了15世纪初郑和航海的历程，是世界上第一张以这一系统的制图方式绘制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主要海路从南京延伸到胡鲁姆斯（忽鲁谟斯）和东非，图中所画出的海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都是中国的南部边缘地区。从那里又向南、向西两个方向延伸到更远的地方，达到了西洋。这种架构可以理解为，它证明了南海群岛属于中国，这跟很多古代典籍里记述的是一样的。^② 换言之，在中国北方，长城形成了一道屏障，而在中国南方，这道屏障则是海中的礁石和环礁。我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很简单：今天英语系大国反华论战的一个地理焦点就是南海的岛屿世界。无疑，“英语派”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南海许多岛屿都在中国的家门口。试想，假如有一天北京方面突然争辩说洛杉矶附近的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不应该属于加利福尼亚，那么华盛顿方面会做何感想？

美国针对古代丝绸之路理念核心部分的政策和论战令人瞩目。把时间拉长一点看，这并不是全新的，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外交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刺激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华盛顿政府的盟友来对抗中国，其背后的口号是：分而治之。从其他海上的情况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这与美国所要求的海洋自由无关。即使是台湾的中国人也并不总是认同华盛顿当局的论点，因为在更早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也认为南海群岛属于中国。此外，太平洋世界的历史和美国的处理方式是值得警惕的。如果北京不管好它的南海诸岛，美国会怎样做？所以答案很明确：华盛顿方面很有可能会在“美国例外论”甚至“昭昭天命”信条的推动下占领其中一部分岛屿。

在此，可以举出另一个警示性的例子，即印度洋中部的查戈斯群岛（Chagos Archipelago），曾经有人在上面居住过，那里的居民讲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文化。在形式上，这些岛屿属于英国。冷战期间，华盛顿政府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使其能够监控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和领空。

^① 参见2022年8月1日的两个链接：<https://video.foxnews.com/v/3864859551001#sp=show-clips>；https://www.salon.com/2014/10/29/fox_news_doctors_creepy_jingoism_keith_ablow_calls_for_american_jihad/。

^② 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大连海军学院航海史研究室编《新编郑和航海图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40页。另见著者著《未解之谜——关于“郑和航海图”的若干问题》（*Selected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Zheng He Map”*；*Questions without Answers*）第三节，载《亚洲史学》（*Journal of Asian History*）第52期第2册（2019年），第179-219页。

伦敦政府允许美国人在查戈斯群岛之一的迪戈加西亚岛 (Diego Garcia) 建立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 配有港口和机场。当地居民们因而被残暴地驱赶出该地, 他们向国际机构寻求帮助, 希望能被允许重返家园, 但无果而终。美国在岛上的驻军一直保留至今, 美国的轰炸机曾从迪戈加西亚岛出发对亚洲大陆的目标进行飞行攻击。^① 事实胜于雄辩, 美国的所作所为与中国对南海的岛屿的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边是驱逐原住民、侵犯人权、发动战争; 而中国这一边则是确保自己岛屿的安全。

总而言之, 大航海时代前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 整个沿海与海上系统的交流及区域内部的交流互动的主要形式是和平的。朝贡体系下国家间的等级关系呈现松散的、适当的、“礼尚往来”的礼仪秩序。通过海丝的兴盛, 宗教和意识形态得以传播, 航运的往来使物质交流更加频繁, 商品和市场的兴起, 带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然而, 进入现代以来, 随着美国霸权的兴起与鼎盛, 美国治下的进步是以牺牲东亚海洋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 甚至形成了“美国中心主义”的美国例外论的认知体系。没有人能够预测, 南海的紧张局势是否会转变, 也就是说, 何时能完全重现海上丝绸之路往日的和平特征和景象。目前, 华盛顿方面依然像从前一样, 受到帝国主义欲望的驱使, 试图阻止恢复丝路之梦的实现。借助于虚假信息、控制重要的舆论媒体, 美国方面正在努力使其伙伴相信美国利益及其期望所在的所谓正确性。在此, 人们只能希望理性在某个时候能够占上风, 最终结束这种《圣经》中的瘟疫。

^① 有关查戈斯群岛的研究著作有: 桑德拉·埃弗斯 (Sandra Evers) 和玛丽·库伊 (Marry Kooy) 著《被驱逐出查戈斯群岛——面对两个世界大国, 流离失所和争取身份的抗争》 (*Eviction from the Chagos Islands: Displacement and Struggle for Identity against two World Powers*, Leiden: Brill, 2011); 彼得·H·桑德 (Peter H. Sand) 著《迭戈加西亚环礁——处于人权与强权政治之间的自然保护》 (*Atoll Diego Garcia: Naturschutz zwischen Menschenrecht und Machtpolitik*, München: Herbert Utz Verlag, 2011); 大卫·范恩 (David Vine) 著《耻辱之岛——美国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秘史》 (*Island of Sham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 S. 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史蒂芬·艾伦 (Stephen Allen) 著《查戈斯岛民众与国际法》 (*The Chagos Islande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14)。一个新的令人感动的报告, 参见 2022 年 8 月 1 日万维网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7/reclaiming-chagos-islands-british-colonization/638444/>) (所载卡伦·墨菲 (Cullen Murphy) 著《他们屈膝亲吻沙子》 (*They Bent to Their Knees and Kissed the Sand*), 载《大西洋》 (*The Atlantic Magazine*) 2022 年 6 月。



明代中叶海外与闽南往来批信研究

涂志伟

【摘要】 明清间，闽南与海外之间产生了许多文书信函。通过对《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刊载的明代中叶菲律宾（吕宋）华商批信资料进行解读，其中既有菲律宾华商寄回闽南祖地的批信，也有吕宋诸岛闽南华商之间往来的批信，以及华商集团经营的账簿资料。这些批信、账簿资料真实地记载吕宋及诸岛社会、政治情况，西、荷争斗等历史大事件，真实地记载大航海时代吕宋华商海上贸易的艰辛历程，并发现明代中叶，菲律宾已出现华商金融中介机构，出现了银信合一的“批信”，这是研究大航海时期闽南、海外经济史、军事史、移民史、家族史、民俗民风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关键词】 明代中叶，海外，批信

16-17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印度洋地区和东亚地区。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设置海澄县后，开放月港往东西洋出海贸易。澎湖、台湾大员，广东澳门、东南海岸沿线的暹罗、柬埔寨，安南的庸宪和会安，东南亚诸岛中西班牙人占据的菲律宾马尼拉、荷兰人占据的印尼巴达维亚、葡萄牙人占据的马来西亚马六甲，以及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都是闽南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闽南月港包括厦门、安海等周边港口出海贸易海商日众。闽南海商沿着主要的国际贸易航线，在巴达维亚、马尼拉、马六甲、阿瑜陀耶、会安、澳门、月港、大员、琉球、长崎等地从事国际贸易，是东亚国际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成为东亚国际贸易的主要经营者，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随着闽南海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闽南人移居海外，定居在东南亚诸岛马尼拉、巴达维亚、马六甲等地，或为海商从事航运、代理、贸易；或成为生理人、店铺伙计、小贩、手工业制作工人；或从事开垦、农耕等。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闽南祖地亲友往来，保持联系，书信往来就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联系方式。

这些文书信函均为手稿原件，有的是派遣专人递送，或通过海船、海商贸易委托中介机构递送，或托人捎带；有的是正式实寄封；有的是银信合一的批信。历史时常可以从非利益相关者的记事中考察出来，这是研究明清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重要史料。这种文献史料的真实性高。是家人亲友之间的内心表达，包含了个人经历、家庭状况、社会风云等丰富信息，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有益补充。

作者简介：涂志伟，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一、明代闽南人移民马尼拉情况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西班牙人进入菲律宾。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西班牙人最终踏上宿务，不久之后在吕宋建立起永久定居点，西班牙人就经常遇到中国商人的船只。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明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6月3日，在马尼拉建城，马尼拉港开埠。西班牙当局大力招徕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直接到马尼拉进行贸易，吸引大量闽南商船进入，大批闽南商人蜂拥而至。一年后，隆庆六年（1572年）8月11日，西班牙菲律宾首任都督黎牙实比向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通报：“今年他们来了10艘船，3艘到了这条河里，3艘去了宾多罗（Vindoro），2艘去了八拉延（Balayan），另外两艘各去了其它两个小岛。他们非常高兴。他们里面有些人回过自己的家乡，而有些人因为货没有卖完，一直留在这里。”1572年5月6日，胡安·德·马尔多纳向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报告的信件写道：“每年从中国大陆都有12至15艘船到……马尼拉城来，船上装载的货物有加工国的各种等级的丝绸、小麦、面粉、糖，很多种类的水果、铁、钢、锡、黄铜、铜和铅，还有另外一些类别的金属……船只来自福建沿海地区，主要是漳州和厦门（Chincheo y Emuy），尽管也不乏几艘来自广州的船，航程持续在15到20天。”^①马尼拉与中国的贸易一直呈上升趋势。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6月18日，多明我会士多明戈·德·萨拉萨尔估计，在马尼来居住的中国居民人数超过1500人。^②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7月1日，马尼拉最高法院给西班牙国王的信函中报告，“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有30多条桑格利的船只停泊在那里，船上载来了3500多人，而保卫城市的仅有200多士兵，况且还缺乏城堡、弹药和子弹，倘若那些人试图不轨的话，用棍棒就可以把他们干掉。”^③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菲律宾首次人口调查时，马尼拉市内的华人已达到3000-4000人，市外还2000-3000人，共计6000-7000人。到1588年增至10000人，1596年增至24000人。1602年增至30000人。^④“1570-1600年，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从不到40人增加到15000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到马尼拉入港的中国沿海商船达到51艘规模。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估计，“定居在菲律宾首府的华人有20000名，而西班牙居民仅有千人”。^⑤“其地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今华人之贩吕宋者，乃贩佛朗机者也”^⑥“民初贩吕宋，得利数倍，其后四方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⑦张燮称：“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许中丞疏略曰：我民往贩吕宋，中多无赖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万人。”^⑧

①（西）胡安·希尔（Juan Gil）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澳门：文化公所；广州：暨南大学研究院，2022年），第5，7，17页。

② 转引自（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106页。

③ 1584年7月1日最高法院给国王函（FILIP. 18A, 28），转引自（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66页。

④ Eufonio M. Alip,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Manila: Aip, Brion publications, 1954, p. 284.

⑤（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x页。

⑥（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卷五，第89页。

⑦（明）何乔远编撰；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卷三九《版藉志》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77页。

⑧（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第89页。

明崇禎九年（1636年）在馬尼拉的郊区居住着30000多中國人和日本人。馬尼拉的華人形成多個閩南人聚落，成為閩南人的天下。他們大多數是從事貿易的，因此菲律賓西班牙語中“華人”被稱為 *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貿易”的發音。^① 這是指閩南話的發音“生理”，即把到菲律賓謀生的所有“華人”稱之“生理人”。

二、明代中葉馬尼拉華人与閩南親友的批信

德國沃爾芬比特（Wolfenbüttel）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Herzog - August - Bibliothek Library）收藏有一批菲律賓及摩鹿加群島經商定居的華人書信手稿，年代在17世紀中葉以前，甚至是17世紀初期，即明萬历年間初、中葉。這批華人書信手稿原件有4種，既有馬尼拉經商的華人寄回漳州的家書，還有經商定居的呂宋諸島華人之間，以及與摩鹿加群島華人往來的批信。並還有一批各類賬冊簿8種，主要是菲律賓華商與在地西班牙人、原住民以及日本人交易、進出貨物的詳細記錄。^② 書信中華商名字有的也出現在賬冊中。這些書信函，有的稱“字”“書”，或稱為“息”；有的稱為“批”“批信”。這些都是真實記錄閩南人在菲律賓西班牙殖民社會經商貿易、語言交流與日常生活等筚路藍縷歷程的第一手原始資料，也是當時社會狀況的真實寫照，可以看出閩南文化在異國他鄉落地扎根。

需要指出的是，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不清楚華人如何與家鄉保持密切的聯繫。“這些定居在馬尼拉的人們，跟他們在中國居住的家人保持着什麼樣的聯繫，幾乎是沒有相關信息”。^③ 現將這4封批信手稿原文及部分相關的賬冊資料抄錄如下〔難以辨別字詞與不確定處，以□表示，留待校正，錄用原文，不再轉為簡體〕。

第一封

自別老母大人膝下，身枉呂宋，生理不就。幸有海滄黃立粲發米落國舡，男駕艙來返米落國。十二月初五日開駕，到今年二月初十日到巷（港）。且喜身體平安，並各貨賣盡。止有白糖、大尺盤發不盡，且喜得有小利。心欲回，至功碍得報。吾契父相流生理，不得便回，苦而無賴，担且再坐貨，待來年早舡而回是得。不肖男身為才利所牽，不得早晚奉侍。又未知家後安否如何？我前年在呂宋時，生理不就，止寄來錢六爻。今年又寄白石滄前陳賓田來外大小包共六包。^④ 包內有零艮，是布包，共捌兩正，付母家中使用。又有小包一包，付六仔小弟，為棘禮，^⑤ 共紙筆錢。其六仔千萬促他讀書，不可放閑，字是誰身之本也。

字來妹夫、四娘共知：尔兄前年所為無銀錢，回家受氣無言，難為妹夫吳成，無恩所報，終有一日啥環而報。尔兄為人男子志予四方，走盡江海。目今且喜得有小利，此

① 李伯重著《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78頁。

② 詳見李毓中，陳宗仁等主編《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二：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書信類，第2－10頁。

③ （西）胡安·希爾著；安大力譯《馬尼拉的華人（16－17世紀）》上卷，第310頁。

④ 外，即錢，參見下文解釋。下文統一使用“錢”。

⑤ 當為“束”，即束脩禮，奉師的酬禮。

是天不恨我為人一生之志也。前日所寄來白事，賤兄不是負心之理，担晚舡無以定，當人不敢所有。賓田小定，當不盡心而寄。只寄來錢六包。內一包錢十三雙，共重九兩捌錢正，付妹夫用。又內有一包錢四文，重一兩伍錢正，付妹夫使用。又內錢一包，錢四文，手指一个，金紬一粒，付妹四娘收。妹夫，我前在厝之時，日夜鬧動，帶念薄面，不必之以。內又零錢二文付四娘，还四嫂，是我前所借之錢。

自別賢弟，未知家後共三孀貴体納福如何？弟前日欲以費動為人，今後再也不可也。目今米落國是親國，慶弟欲生理，如有人發舡可來。利息甚，如白布，每疋賣錢三文。今寄來錢二包，內錢二文，重七錢半，弟申仔收。又寄來錢六反，重五錢半，四孀收。如是字到日，艮不到，可去白石陳賓田家取。

李仔字拜

母、弟、妹共收目。^①

这是居住在吕宋（菲律宾）经商多年的李仔写批信托同乡陈宾田船寄回漳州龙溪县白石、海沧一带亲人的批信，时间可能是在17世纪中叶以前，即明万历年间初、中叶间。当为写信人李仔亲笔所写。毛笔手写，全信用闽南话口头语书写，较为潦草，有的是俗字、简体字，有的是错别字，有的涂改。一纸分段写给母亲，妹夫吴成、妹妹四娘，堂弟等，合为一信。内容是问候母亲及家人，告知在吕宋经商获利情况，关心家里人，并寄钱、寄物回去。

李仔寄给母亲的钱物大小包共六包。其中，给母亲一包钱，付六仔小弟小包一包钱，小计2包。其中，寄给妹夫两包钱，付妹四娘一包，内又零钱二文付四娘，还四嫂。小计4包。另外，李仔还另寄给贤弟两包钱。其中，一包重七錢半给弟申仔，一包重五錢半给四孀收，小计2包。并交代如果信到，银钱无到，可到陈宾田家取银钱，似乎是另外加寄、另托的。所以，李仔此次所寄回家的钱大小包共计8包。

可见李仔家是个大家族。批信中出现的人名较多，如李仔、老母、契父、家后、小弟六仔、妹夫吴成、妹妹四娘、四嫂、三孀、堂弟（庆弟）、四孀。此外还有弟申仔，黄立粲、陈宾田等人。其中“李”字含义同“学”字。若用闽南话读之，李仔即“粪池”之意，并同音，应是闽南人为小孩取名时常见采用贱字方式。地名有白石、海沧，吕宋、米落国。据嘉靖《龙溪县志》载，漳州龙溪县一、二、三都有“海沧社”，二十九都、三十都有白石社等15社。^②

海沧社在今厦门市海沧区。白石社在今漳州台商区角美镇。今蔡店村、杨厝村、埔尾村、沙坂村都曾为白石社、白石保所辖。其中，杨厝村下辖杨厝、丁厝、过井、苍前4个社。苍前为陈氏聚居地。海商陈宾田家为白石沧前，即今杨厝村苍前社。李仔家应在苍前社周边。这是一封亲情感人的批信。

第二封

別間容易而相逢乃難耳。前者兄造敝寓，弟失贖礼，乞諒是幸。茲聞貴鎮有唐舡到港，未審虛實。倘有實事，煩為開紗、長布一疋。若無，煩為開烏白線一、二斤無妨。

^①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书信类第四种（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② （明）刘天授修纂；李阿山点校（嘉靖）《龙溪县志》卷之一《地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5页。

且是歲或欲回家，或住宿霧得利，是何？乞賜一息示知，免弟懸仰，至切。

江奇老□兄覽之。

通家弟李文說拜^①

这是居住在菲律宾宿务的李文說写信给江奇，时间可能是在17世纪中叶以前，即明万历年间初、中叶间。手写，书写较端正，文字较优雅通顺，批信格式规范。主要内容是叙旧问候，请江奇代向到港的唐山船买货。这里的港可能指吕宋大港，即今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港，“大港，是东洋最先到处，彼中一大部落也。砌石为城。佛朗机以酋来镇。米穀繁盛，他产不过皮角之属。未至港，有笔架山”。^②李文說自称通家，两人应是姻亲，或世交。以兄弟称，关系密切，互有往来。同为生理人，同在吕宋从事海上贸易事业。

第三封

憶昔與兄聚首之時，兄之待弟也，禮意殷勤，情義款曲，故可以對天知。而弟之待兄也，情義兼盡，恩意綢繆，亦可以對人言。斯時兄無悖弟，弟無悖兄，而人端擬以信義自許，百年不朽矣。奈何諒啟行是的，不期後會，遂與我質，密敎我前日所謀諸事。于今致質阻，當不果來堂。以此而論，虎兇出柙，是誰之愆。又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縱然來堂，豈可遂起胡越之釁。斯時也，是兄淺衷狹量，木朽而虫生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謂也。我質有批來，欲石兄復回霧。三家者以《雍》徹，未知尊旨何如？乞賜決裁是允，不可輕舉。弟之欲來福，候六月天。^③草艚^④來霧，得以啟行。茲因人便，特修數字奉昌，余日決有會，再敎不宣。

汝契父臘我質不理，未知有何開處，乞賜一息，來知至鑒□。

舊知若薦巔江老大人奉

末交胡軒頓首拜^⑤

这是居住在菲律宾宿务的胡轩写批信给石兄，并奉江老大人，时间可能是在17世纪中叶以前，即明万历年间初、中叶间。毛笔手写，书写端正，文化修养高，文字典雅、连篇用典，用语委婉，但用意明确。如“虎兇出柙”，出自《论语·季氏》：“且尔言过矣，虎兇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比喻管理的人不能不负责任。“君子之交，不出恶声”。引用《战国策》乐毅的典故。意即君子如果与人绝交了，不说对方的坏话。“胡越之釁”即“胡越之祸”，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指古代中原的胡国和越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事，比喻战祸。“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荡》，意思是没有不能善始的，很少有能善终的。“三家者以

①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书信类第四种，第5页。

② (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第95页。

③ 因批信原文书法难辨，从字形看，疑为“六月天”，“天”古代生僻字，是“天”异写字，或解为育，吾，待考。

④ 当为“草艚”，见李毓中等编《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二部分，第220页。

⑤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书信类第四种，第7页。

《雍》彻”，典出《论语》：“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家，指鲁国当政的三家大夫孟孙、叔孙、季孙。《雍》指为周天子举行祭礼后撤去祭品、祭器时所唱的诗。彻，同“撤”，古代祭礼完毕后撤祭馔，乐人唱诗以娱神。孔子意思说，《雍》诗说的“诸侯都来助祭，天子恭敬地主祭”怎么能用在三家大夫的庙堂上呢？胡轩引用此典委婉表示，不知你这样做是不是一种不合身份的越礼之事，指出要守信用，不能失礼。主要内容是重叙朋友间昔日恩怨，道说两人纠纷的起端，约期重新相会。奉江老大人，当是希望他能出面调解。批信格式规范。这封信出现以“批”指代书信，乃是今闽南话常用词，在明代信函文献中则是目前所仅见，十分珍贵重要。

第四封

拜別幾時，不覺有載，馳想之思，諒彼此如一也。及立渠船到日，詢問貴体亨嘉、家声振耀，喜甚，喜甚。弟不才，流泊夷邦，甚警。其米鹿国土番未降者多，今又報紅毛赤鬚番欲來此征戰，王事甚多，王工日作。其立渠來此，因無揮首，帶來馬色耳靴，欲罰錢千文，其丁香，三分有其一抽，經紀大敗。敬便數字，以代問安，伏惟不宣。

劣弟陳奇生拜^①

大都 [堃] 省吾陳老先生老大人執事。

信封：

四月廿一日封匣

此書煩送去惡党省吾兄收拆

在米鹿國陳奇生寄

这是陈奇生一封从米鹿国寄给吕宋恶党陈老先生的批信，当是托熟悉的人捎带的。有信封，有信笺内文，批信格式按照古代规范，毛笔行书手写，写信人陈奇生，收信人是闽南同乡的陈老先生，收信地点是吕宋恶党。“恶党”提法见诸多种文献。^② 地点有多说，据陈胜彝考证，“息力大山在今加里曼丹岛，班爱、宿务即今菲律宾群岛之班乃岛、宿务岛，恶岛即内格罗斯岛。”^③ 恶党即屋党，为闽南话谐音讹写。张燮《东西洋考》载：“屋党，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粮食处所也。”^④ 红毛赤须番指荷兰人。书信以半文半白汉语书写，简洁明了。陈奇生离开闽南家乡到吕宋经商已经多年，立渠是居住在吕宋的闽南海商。因商船“立渠船”到米鹿国港口，陈奇生向他询问打听到同乡陈老先生的情况。即写信给陈省吾问好，并告知立渠商船被罚之事。信中出现陈老先生与立渠、陈奇生人名，他们之间应是亲友关系或华商集团伙伴。

^①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书信类第四种，第9页。

^② 如（明）杨复吉撰《海国闻见录跋》载：“沿息力大山及班爱、恶党诸国。”见《明代丛书续编》戊集卷二十七，第6页。（明）陈伦炯撰《海国闻见录》上卷《东南洋记》载：“吕宋至班爱十更，至恶党二十三更，至宿务二十四更。”见《明代丛书续编》戊集卷二十七，第15—16页。（清）徐继畲撰《瀛环志略》卷二《南洋各岛》等。

^③ 陈胜彝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74页；（清）杜宗预撰《瀛寰译音异名记》卷一《南洋·塞布》条：塞布“即闻见录宿务。……西南岛……谓之尼各罗，地颇大。”（清）林若谷撰《国地异名》云：“班爱、恶党、宿务。”陈自强称：“屋党（今尼格罗岛）。”见陈自强著《漳州古代海外交通与海洋文化》上编《海外交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④ （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第9页。

三、明代中叶马尼拉华人与闽南亲友批信史料价值分析

上述这些批信，具备相当的史料价值，具体分析来看，首先，真实记载吕宋及诸岛社会、政治情况，西、荷争斗等历史大事件。历史时常可以从非利益相关者的记事中考察出来。陈奇生给江老大人的批信中报告马尼拉情况时说，“流泊夷邦，甚警。”这里的警，指的是在西班牙人统治下，属危险不安定之地，生活并不好过，尤其是传言荷兰人准备攻打。“其米鹿国土番未降者多。今又报红毛赤须番欲来此征战，王事甚多，王工日作。”说明此时正值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为争夺摩鹿加群岛而进行交战之际。张燮撰《东西洋考》载：“万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澈里系勝征美洛居，役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战。”^①可以得知这封书信写于17世纪中叶以前，甚至有可能是十七世纪初叶或更早，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间。这也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海外华人批信原件。

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是死对头，双方在摩鹿加群岛建立据点对峙。1523年，葡萄牙人在马鲁古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特尔纳特岛上建立要塞，后因土著居民抗击而撤离。1606年，西班牙人占领要塞。1607年3月，特尔纳特岛酋长请荷兰人出兵赶走西班牙人。荷兰人在岛上建造新的要塞。“先是，佛郎机来攻，国人狼藉请降。赦其酋，令守旧为政于国，岁输丁香若干，不设兵戍，令彼国自为守。和兰既辇张海外，无安顿处，忽舟师直捣城下，虏其酋，语曰：‘若善事吾，吾为若主，殊胜白颈。’[佛郎机人皆白颈故云]酋唯唯，又裨理国事如故。佛郎机闻之，怒曰：‘悔不杀奴，污吾刃，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居，驱洞内华人，命当一队刑法酷急。……自是每岁征斗，递为胜负。……华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辨，游说两国间，分万老高山山半为界，北山属和兰，而山南属佛朗机，各罢兵，并雄兹土。”^②“万老高”即特尔纳特岛。正因为华人在游说两国争斗中发挥作用，得到信任，所以李仔的批信中说“目今米落国是亲国”。米落国为闽南话谐音，有的写成米鹿国。张燮《东西洋考》则写成“美洛居”，即摩鹿加群岛，被称为香料群岛，即今印尼的鲁古群岛。谁控制了香料群岛，就控制了大航海时期利益所在地。

荷兰人多次攻击马尼拉。1610、1616、1617、1618、1621、1625年，都有荷兰人袭扰中国商船的记录。^③“红毛番自称和兰国，与佛郎机邻壤，……佛郎机据吕宋而市香山，和兰心慕之，因驾巨舰横行爪哇、大泥之间，筑土库，为屯聚处所”。^④据台的荷兰人经常派出舰队，定期在澎湖岛至马尼拉湾口一带巡查，劫掠中国商船，闽南海商，包括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在从月港到马尼拉的贸易航途中，经常性地遭到荷兰人的拦截、攻击、抢劫，荷兰人的目的就是要断绝闽南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往来。

其次，真实记载大航海时代吕宋华商海上贸易的历程。

其一、华商区域贸易，货品流转过程，经营的货物品种。如龙溪县海商李仔初到吕宋，生理不就，而后到米鹿国贸易，即摩鹿加群岛，被称为香料群岛。“美洛居，俗譌（讹）为米六合，东海中稍蕃富之国也。……丁香，东洋仅产于美洛居，夷人用以辟邪，曰多置此，则国有王气，

①（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第89，127页。

②（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第101页。

③（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72-76页。

④（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第89，127页。

故二夷（西、葡、荷）之所必争。”^①当时从摩鹿加群岛购买丁香到马六甲出售，利润可翻10倍之多。所以孝仔这条商船十二月初五开驾到米鹿国，至次年二月初十日回到马尼拉港。孝仔很高兴地在信中告诉母亲，“并各货卖尽。止有白糖、大尺盘发不尽，且喜得有小利”。

这说明孝仔在摩鹿加群岛、吕宋岛、月港之间进行区域贸易。经营的货物品种有多种，包括丁香、白糖、大尺盘以及丝绸、布料，都是明代月港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大宗货物。丁香主要是从海外进口，白糖、大尺盘是输出海外。大尺盘即大的瓷盘，是贵重的瓷器。白糖是当时珍贵的货物，一般只有王室贵族才能用得起。白糖和黄金都是重要的物资，在历史上都被视为“战略物资”，白糖在欧洲比作白金。闽南海商立渠之船是到摩鹿加群岛米鹿国购买丁香运到吕宋宿雾再转买。他还经营销售“马色耳袍”即漳缎袍（详见下文），也是当时马尼拉“最好的匹料”。

明崇祯八年（1635年）2月2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商馆长官普特曼斯说：“不过漳州的花缎（Chanchieusche damasten）更漂亮，所用的丝也更好。将来若需要更多这类的布匹，必须以每匹12里尔收购。”^②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明工部给事中傅元初称：“是两夷者（西、葡、荷人），皆好中国绫缎、杂缁。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③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8月23日，荷兰人派翻译何斌到达厦门，与郑成功谈判开放贸易事宜，并赠送礼品。郑成功“并且回送薄礼如下：4卷黑贡缎、又4卷蓝贡缎、20斤茶叶和10罐上等白糖”。^④证实当时贡缎、白糖、茶是十分贵重的礼品。菲律宾宿务的李文詭托江奇购买从月港唐舡载到吕宋大港来的中国丝绸、布料“纱、长布、乌白线”，并托其代买货并发到吕宋宿务。这说明海上贸易的物品从月港到达马尼拉大港之后，再转卖到宿雾。孝仔告诉祖家亲人海上贸易信息，“庆弟欲生理，如有人发舡可来。”“利息甚，如白布，每疋费钱三文。”其中的白布，金国平认为是“松江布（Canga）”。^⑤从中可知华商在吕宋诸岛之间，吕宋与月港之间的海上贸易、流通繁忙，说明大航海时期区域贸易流转方式。

其二、华商遭受西班牙人敲诈勒索、重税盘剥。西班牙殖民者加强对吕宋华人社会民间经济的压榨，敲诈勒索，横征暴敛、赋税越来越重，华人被迫充当苦工，受到百般压迫。“桑格利无处不在，所有的事情都有他们参加，甚至是那些最罕见和超乎常规的事情，他们是主角，或是胁从。”“所有跟手工技艺有关的职业，西班牙人全都止步，因为现在所有人穿的衣服和脚下的鞋子都是桑格利做的，因为干西班牙人要的那些活儿，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专业人员并且还更加便宜。”“他们造出来的砖瓦，量很大，又便宜又好。”“1000块砖也就8雷阿尔。”^⑥所以，陈奇生给陈老先生的批信抱怨说，“王事甚多，王工日作”。这里的“王”指马尼拉西班牙都督。陈奇生在吕宋、米鹿国两地从事海上贸易，对西班牙人的税收情况甚详。“立渠来此，因无挥首，带来马色耳

①（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第101，102页。

② 江树生，翁佳音译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V（1629-1636）》（南投：台湾文献馆，台湾历史博物馆，2015年），第635页。

③（明）傅元初撰《论开洋禁疏》，载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一辑第一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4年），第404页。

④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四册（台南：台南市政府发行，2003年），第239页。

⑤ 金国平指出：“实际上，ende sommige witle Cangs van Algodon（一些白色的棉织松江布）是指本色布。”见金国平著《“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广州：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2022年），第24页。

⑥（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336，338，365页。

匏，欲罚钱千文；其丁香，三分有其一抽，经纪大败”，此句有的词语难以识读。其中，挥首疑为闽南语对比索（peso）的谐音讹写。因无挥首，疑指没有向西班牙人缴纳贿赂。马色耳匏即漳缎。金国平认为，“damasco”指（大马士革出产的）缎子、花缎，丝缎；花布。也转译为缎子、锦缎。故马色即漳州的缎子。匏即袍，匏对音西班牙语中的 *ropa* 中的 *pa*，是从西班牙文硬翻译过来的，指漳州缎袍。陈奇生信证明西班牙人勒索华人入港商船，征赋溢格，随意定价收费、收税，税费繁重的史实。

据西班牙资料记载，华人商船入港之后，都要经过审查和登记两道手续，即安全审查和海关检查，要收取必不可少的上岸费，才准许放行。华商船长还要付抵押费。对所有中国人，无论是否带着货物来的，西班牙人一律收取4雷阿尔赋税和一雷阿尔的城防税。西班牙官员在办理入港手续中滥用职权。从1642年10月13日到1643年6月30日，仅仅是为了进入马尼拉河，西班牙书记员就收每个船长33比索（总共是1287比索）；通常的费用是10比索和另外的“礼品”（一块绸料、一个素烧瓷瓶、肥皂，等等）后者名义上说“按照惯例”是自愿送的。对每份保证书，书记员收一比索（39比索），每个乘船过来的桑格利都要付半雷阿尔。“西班牙官员们把船上最好的东西拿走，检查的人自己随意定价”。1596年7月5日，闽南商人曾向大主教投诉一封控告信：“当中国船抵达的时候，船上有能带来财政收入的中国货物，官员们和其他人就来到船上，看见最好的匹料就从我们手里拿走，要是我们不愿给的话，他们就武力强抢。”^① 这里的最好的匹料（*ropa*），即漳州缎。

张燮《东西洋考》载：“夷人故奴视华人，征赋溢格，稍不得当，呵辱无已，时犯者即严置以法。”交易时，“舟至，遣人驰诣酋以币。征税颇多，网亦太密。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衅隙而后，彼亦戒心于我。恐族类既繁，后复为乱，辄下令每舶至，人只二百为率，勿溢额。舶归，所载回，必倍以四百，勿缩额。”^② 菲律宾唐人手稿中有明代华商留下的多种数簿类资料，记载了许多华商被番仔（西班牙人）盘剥以及重罚、收税，以及华商与番仔交易时被拖欠钱的具体事例。

如数簿类第二种资料出现，“抽王费钱二文”。第三种资料，“又番仔去酒式反”。又如数簿类第五种就有“立渠去船税钱八十三文”。数簿类六种，“秀数 共报王饷三百式十四文，船仔税二反，纳王税玖文三反，费钱九文，画号钱二反，班税钱四文，止剩伍十三文，寄我华去还秀才去。”“报王饷壹百陆十玖文，纳王钱五文二反三角一分，费钱五文二反，画号钱一反，船仔税二反，地税一文二反。”数簿类第七种有“前回立渠共仰台收去船税定钱六文。”^③ 报王饷三百式十四文，船税钱八十三文是相当重的。证实了陈奇生信中记载的立渠被西班牙人收税以及重罚之事是确实的。如何收费和罚多少钱都取决于当地最高长官都督的一时兴致。在这种情形之下，立渠被“罚钱千文”“丁香三分有其一抽”，导致“经纪大败”。即立渠在马尼拉所做的贸易生理大为失败。陈奇生的信真实地反映闽南海商在马尼拉受到西班牙人盘剥勒索的悲惨遭遇。

唐人手稿文献出现许多条华商与番仔交易的资料，但有记载的账目几乎都是番仔欠钱的记载。

^① 西班牙西印度总档案馆（塞维利亚）菲律宾卷，Filip，转引自（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24-26页。

^② （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五，第91，95页。

^③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数簿类第二、三、五、七种，第247，264，324，343-347页。

如第五种（数簿大吉利市）“番仔去白布一疋，青布一疋，乌被仔五片，未有。”“番仔入钱二文，白布一疋，未还布，完。”“近卖绒化人番，欠钱五文。”“公卖乌被仔，番仔欠钱二疋，入完。”“又番仔去乌被仔，欠钱三疋，入钱三疋。”“番人去白布一疋，欠钱三文。”“番人去白布三疋，入钱八文，欠钱一文。番人又去白布四疋，欠钱十二文。”“美洛国……又去抽丁香十疋，班达估去钱乙百九十文，又番人共滨吾去钱肆拾、四十三文，又番人落艇重秤六十，使班达钱三十半文，又番人落艇开驾，使费钱六文。”“番人收去近白布肆十疋，贷一百二十文正。廿四日近买香，番人秤共四百式拾肆斤。”“近秤有八十五斤，近又送番仔脚钱三疋。”“番人内欠香未完。番人秤欠香十一斤。”“番人收去钱陆拾五文。又番仔却仔五疋。”第八种账册资料记录：“番仔去众丝六斤，付心性发卖。”^①这说明华商与西班牙人的这种交易，都是拿不到钱的。番人、化人番即西班牙人。

这些资料中的美洛国，即美洛居，摩鹿加群岛。班达，是印尼马鲁古省班达海东北部的岛群。班达来自波斯语 Bandari，是港口之意。也是一类族群的称呼，这里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交汇处，是亚洲和非洲的一个接驳点。忽鲁谟斯王国在8世纪兴起之后，成为全球贸易集散地。可见，立渠与其他的华商海商贸易面很广。

从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中明代华商留下的数簿类多种资料来看，详细地记载有关华商“立渠”等人收支情况账簿资料。如数簿类第七种（利数簿）账簿资料中记载，“又立渠收去大钱乙文。又去缎一疋，价钱七文。又立渠共仰台收去钱四文。渠又收心大疋一文。又立渠又十一人杀鱼工钱，并次钱近出乙文。榕浦支去钱一文买桶。立渠又大钱壹文。代客又支去中钱一文。近共代渠出还总钱三文。近代渠还四并肝肺钱乙文。又代买虾出一疋。渠代近出一文，又半文。”“渠去绒一斤钱六文。……立渠支去小疋壹个。……计实收过舱钱九十三文。……立渠、仰台一钱。共收去船称钱八十三文”。^②有关“立渠”以及其他合伙华商收支情况账簿资料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数簿类资料来看，是立渠与多人合伙在吕宋经营海上贸易收支账单详目。被西班牙人收税以及重罚账单，交易被欠钱，以及贸易中一笔笔进出、公用、私支、代客支出记得清清楚楚。可见立渠是吕宋华商集团合伙者，也是船商。海上贸易生理做得很大，进出货多，经营品种多，相当活跃。这也是十分珍贵难得的马尼拉华商贸易经营第一手原始资料。

其三、马尼拉华人社会形成的多层次同乡亲友、商业伙伴网络。明清时期闽南沿海居民外出过番打拼，具有明显的闽南乡族性特征。在海外贸易过程中，仍然较多地保留和传承祖家闽南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具有一种内在的乡族凝聚力。由于海上贸易的繁荣，货物的流动性，也造成闽南移民迁徙的流动性。在马尼拉，华人主要居留地有八连、岷伦洛，早期居留地是拜拜镇、岷伦洛、汤都，包括圣克鲁斯、奎阿坡。闽南人将八联称作“涧内”。有的居住在宿务、大港、屋同、米鹿国。他们从事各种职业，或为海商从事航运、代理、贸易；或成为生理人、店铺伙计、小贩、手工业制作工人；或从事开垦、农耕等。徐学聚指出：“且谓吕宋本一荒岛，魑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

^①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数簿类第五、八种，第307，310，314，318—320，324，330—331，343—347，380页。

^②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数簿类第二种、第五种、第七种，第242，264，280，282，324，371—373页。

其耕艺，治其城舍，遂为隩区，甲诸海国。”^①

从这4张批信来看，孝仔应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华商，全信用闽南话口头语书写。在《西班牙-华语辞典》中收有“代笔”“代书”词汇，^②说明明代马尼拉华人社会中，代笔成为一种职业。笔者在菲律宾马尼拉菲华历史博物馆也曾看到置有“书读员”塑像，旁为下层华人塑像。书读员为清代官员装束，旁边有说明牌：“书读员，为不识字华人读书写信。”李文詭写给江奇的信，书写较端正，文字较优雅通顺，批信格式规范，有一定文化修养。陈奇生写给陈老先生的批信，以半文半白汉语书写，行书清秀，简洁明了。胡轩写批信给石兄并奉江老大人，书写端正，几乎全文用典，用语委婉，言外之意处甚多，显示他及对方都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这真实地反映明代海外华人社会各层次华人状况，也是中华文化、闽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写照。

马尼拉华人虽然居住分散，层次不同，从事职业不同，但将闽南传统社会形成的乡族、宗族的各种纽带和网络进行移植、重建。通过内在的闽南乡族凝聚力，形成社会、商业网络，以各种方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一是依靠亲友之间互相提携帮助，形成同乡、亲缘网络。扶持同乡是闽南人的典型特征，在吕宋海外打拼闽南人格外注重相互帮扶，孝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龙溪人孝仔原先到吕宋时，生理不成功。后在同属漳州的海澄县海沧黄立黎的帮助下，乘其船到米鹿国贸易，获得成功。他托同乡的白石沧前陈宾田之船，寄钱寄物带回家乡。孝仔与其“契父”在吕宋做生理。石兄在吕宋也有“契父”。明清时期，收养义子或认契子是闽南社会相当普遍习俗。尤其是闽南富豪大户，常让契子操舟出洋通夷贸易，以此积累财富。明代漳州“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居者附资，或将廛子弃儿，养如所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无所患苦”^③“至生女有不举者，间或假他人子为子，不以甯宗为嫌。其在商贾之家，则使之挟资四方，往来冒霜露，或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而已子安享其利焉”。^④

孝仔、石兄在马尼拉拜契父、做契子的做法，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马尼拉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他们结成有亲缘关系的贸易伙伴，以相互依赖、相互帮扶，共同打拼开展生意。在明末编写的《西班牙-华语辞典》中，收入“契子”词汇。^⑤所以孝仔的批信中说：“吾契父相流（留）生理，不得便回，苦而无赖，担且再坐货”。说明孝仔在马尼拉是帮助其契父经营生理。契父相留，孝仔想回家但走不开身。华商认契子帮助经营这种现象引起了西班牙当局的警惕，正是在这时期的1599年5月17日，西班牙当局特别颁发命令，严禁“生理”（闽南商人）收养义子替自己做生意。若有违背禁令者，将被罚送至西班牙大帆船上充当水手，无偿服劳役四年。^⑥金国平运用各种资料证明了明末葡萄牙语所记载的词汇“Queve”，可能是闽南语“契子”或“佻仔”（经纪）的对音。在葡萄牙语中，“Queve”具有行商的意义，尤其是做经纪的“包揽”。其意不是拥

①（明）徐学聚撰《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载（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6月），第4728页。

②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一：西班牙-华语辞典》，第421页。

③（明）何乔远撰《闽书》卷三十八《风俗》，第946-947页。

④（清）吴宜燮修（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30册（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100页。

⑤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一：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第38页。

⑥ *Blair and Robertson 1903-1907, vol. 11, pp. 75-77.*

有独立资本的商人，而是中间商。这个词汇首先从中文进入葡萄牙语，然后再从它进入荷兰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几乎包括了所有东来的欧洲贸易先驱的语言。^①

兄弟结义也是吕宋华人闽南商人圈子彼此之间建立并维系亲缘关系的一种常见形式。《西班牙-华语辞典》中，收入“结义兄弟”“结拜”“会兄弟”“会馆”等词汇。^②也说明当时马尼拉已建立如中国国内的“会馆”组织，这种会馆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大多数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在宿务的李文詭与在大港的江奇有通家之好，两人应是姻亲，以兄弟称，同为生理人，共同在吕宋从事海上贸易事业。胡轩与石兄也是以兄弟相称相待，情义款曲，礼意殷勤，恩意绸缪。可以对天对地对人，“斯时兄无悖弟，弟无悖兄，而人端拟以信义自许。”两人相互之间以信义自许，品行端正。当时在米鹿国的陈奇生与在吕宋屋同的陈老先生，与吕宋华商立渠等结成亲密的商业伙伴。陈老先生显然是马尼拉有地位名望的人，陈奇生称他为陈老先生、老大人执事，十分尊重。

在海外打拼的闽南人发达了，也会把自己族人、同乡带出去闯荡，不仅教他们经商之道，还出钱资助他们。孝仔告诉在祖家堂弟到南洋做贸易的方法，“庆弟欲生理，如有人发航可来。利息甚。”并告知有关吕宋岛、米鹿国的市场贸易信息、丝绸价格。据明嘉靖年间首修的晋江《石狮大仑蔡氏族谱》载：嘉靖年间，泉州石狮大仑人蔡景秩与蔡景恩、蔡周夫前往吕宋谋生。蔡周夫为兄，“弱冠求，求吕宋，初归娶妇，再归为二弟择姻娶妇，赎祖坟地及宅盖屋，皆自己资，与兄弟公分。仍同二弟往吕宋，出本银令之经纪，日后各有四十金，归又拨租十石，付其管业。”^③这说明蔡周夫带二个兄弟到吕宋经商，还出“出本银令之经纪”。需要指出的是，蔡周夫、蔡景秩、蔡景恩并非同胞兄弟，而是结义兄弟。

通过家族、乡人介绍提携招引，闽南人到海外贸易经营风气越来越兴盛，聚集的族人、乡人越多，就越能巩固并扩大各自的经营范围和规模。

二是华人商业伙伴之间组成贸易集团，形成贸易网络。随着海外华人贸易经营规模的扩大，不同的同乡、亲缘网络间必然相互间结成商业群体，组成贸易集团。从唐人手稿来看，立渠所属的“毓初记”“上口鸟抽惠记”，^④就是多人合伙形成的华人商业贸易集团商号。从海上贸易收支账单详目看，出现许多华人商业伙伴，如“仰台”“心”“勋岳”“榕浦”“七仔”等等，贸易商品多种多样，相当广泛。^⑤又如出现的明代华商金融中介机构，涉及华商众多，有“景台”“郑五哥”“大粒四叔”等，联结华商“每船”“环船”等等。^⑥他们之间，既是亲友又是同乡，同为闽南商业伙伴，生理互帮互忙，互惠互利。海外贸易中，商业伙伴也会出现承诺没有落实，遇到商

① 金国平著《澳门学：探赜与汇知》第六篇《明末葡萄牙语文献所记载的“Queue”之汉名考——兼探李叶荣外文姓氏的来源》，第92-94页。

②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一：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第63页。

③ 转引自赖宝林著《晋江县菲律宾侨汇史初探》，载晋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晋江文史资料》第三辑（晋江：晋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1983年3月），第5页。

④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数簿类第二、三、五、六、七种，第354、360-363、368、372、382、389、398、403页。

⑤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数簿类第二种、第三种、第五种、第六种、第七种，第63、523、1012页。

⑥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数簿类第六种，第351页。

业纠纷或个人恩怨，产生利益冲突。如胡轩与石兄后来交恶，石兄的契父不理原先形成的协议，胡轩只好请江老大人这个有威望的人出面协调斡旋劝说，这也是靠乡族的情分。同时靠闽南文化的传统道德规范准则，讲友情讲信义，以化解纠纷。

其四、勇于拼搏，爱拼会赢，眷念祖地的闽南文化特征。勇于拼搏，爱拼会赢是闽南文化最为突出的精神特质。闽南人离乡背井、开拓异邦的进取精神和漂泊坚韧，敢于冒险。虽分布世界各地，但仍保持念祖爱乡、敬宗爱土的传统，闽南文化传播海外，延续不断。龙溪人孝仔因“在厝之时，日夜闹动”，具有闽南文化的草根性，虽被迫外出过番，但有志气打拼。如孝仔信中所言，“为人男子志予四方，走尽江海”“天不恨我为人一生之意也”，刻画了孝仔这个闽南人重义也重利，爱拼会赢的性格特征，这正是千千万万在海外冒险从事海上贸易闽南“孝仔”们的缩影。

闽南人眷念故土，虽下南洋，前往马尼拉、巴达维亚、马六甲等地进行海外贸易，仍念祖爱乡、敬宗爱土、扶持同乡、回馈桑梓。不管是到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亚，还是到东西洋诸岛，闽南移民常常想尽办法，仍与家乡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稍有成就立刻想到回馈家人。闽南人出洋吕宋岛的华人“肯定无疑的是，很多移民包括那些后来皈依基督教的人，跟他们的家人都继续保持联系：有了这个渠道，我们的火药工得以知道自己家人的不幸。不管怎么讲，包括那些把根扎在马尼拉的人们，要抵御住对故土的思念，应该也是很困难的。发生这种感情断裂毫不为奇，焦虑和忧伤之中，最终不少人更加思念祖国，或是更用心地教育子女学习传统习俗”，^①他们在海外稍有成就，立刻想到回馈家乡，回馈家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泉州石狮大仑人蔡景秩与蔡景恩、蔡周夫前往吕宋谋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蔡景秩回石狮，买地盖屋，托付田产与宗亲。明嘉靖年间首修的晋江《石狮大仑蔡氏族谱》所载，蔡思叔为弟，“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资，叠寄润于兄弟，二兄景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未后归来，仍分惠银两，各拨十五石与兄及侄掌管为业”。^②“迭寄润于兄弟”的“润”字即指从吕宋汇银款回乡。

17世纪末叶，西班牙克里斯托瓦尔·佩德罗切修士吃惊地发现，“华人们刚一抵达吕宋，就典当抵押，‘付了船票并汇些钱给父母和老婆’”。^③龙溪人孝仔也是如此，多次寄信寄钱回家，在海外稍微赚到小利，即写批信向母亲问安，报告吕宋经商情况，寄钱回家。孝仔重情重义，注重礼数。一纸分别问候家属、小弟六仔、妹夫吴成、妹妹四娘、四嫂、三婶、四婶、申仔等，一一交代，分别寄给礼物。到吕宋前向四嫂所借之钱，不忘寄去请妹妹代还。李文詭与通家江奇久不见面，相逢不易。李文詭对江奇前来家里造访，未遇到自己，表示失礼致歉。胡轩与石兄重叙兄弟朋友间昔日恩谊。陈奇生与陈老先生相别已经多年，互相想念。立渠商船一到米鹿国港口，陈奇生就急切地向他询问打听到同乡陈老先生情况。

明代中叶，菲律宾已出现华商金融中介机构，出现了银信合一的“批”信。从这些批信来看，吕宋闽南华商进行海上贸易，资金的调度，流通，货款转出转入，汇银款回闽南，经济活动十分频繁，这都需要有金融机构作为中介办理流转。留存的华商记账的八种商业往来各类账册簿记录了菲律宾华商与在地西班牙人、原住民以及日本人交易、进出货物的详细记录。这也是番银流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其一、“批信”的格式完整，有信笺，有信封（批皮）。书信往来是马尼拉华商与闽南家乡保

^①（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310页。

^② 转引自赖宝林著《晋江县菲律宾侨汇史初探》，第5页。

^③（西）胡安·希尔著；安大力译《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卷，第310页。

持联系的重要工具。这批十七世纪初菲律宾及摩鹿加群岛经商定居的华人批信手稿，总体看，书信完整，格式规范。信笺内文开头有问候、敬颂语。结束时有敬颂语。其中陈奇生寄给陈老先生的批信最为规范，有信封（批皮），有信笺内文，批信格式规范，毛笔行书手写。属于折合信，即一张信笺内文写好之后，折起来密封，信封外面写寄信时间“四月廿一日封匭”，封匭，原为收受奏章的小匣子，这里意指封好信封。收信地点（恶党，即屋党、屋同）、收信人（陈老先生），寄信地点（米鹿国）、寄信人（陈奇生）。说明这封批信属托人送寄（传批）。

其二、出现“批”字指代书信。这些书信函有的称“字”“书”，或称为“息”。也有的称“批”。如胡轩写给石兄的批信中，“我质有批来，欲石兄复回雾（宿雾）”。^①这里的“批”字，笔者认为，是书信之义，在明代书函文献中则是目前所仅见的首次发现书证，十分珍贵重要。在《西班牙—华语辞典》中也收入多个带“批”字词汇。如“批信”“批照”“回批”“送批去”，并收有“批皮”“批府”“批截”“传批”等与批信有关的词汇。还收有“书劄”“文书”“文契”“文约”“启书”“传书”等词汇。^②此辞典于1626年至1642年间编写，即明天启六年至崇祯十五年，由西班牙道明会神父与马尼拉闽南人合作编写，是采用漳州音的辞书。是明代马尼拉西班牙人与闽南人语言交流的工具辞典。在中文词汇之两旁，加注西班牙文对应字与拼写闽南读音。这说明“批”“批信”“批皮”“传批”这些闽南话词汇，是当时马尼拉华人社会通行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不但说明当时的批信往来有一套通用流程，同时也是当时闽南话方言为主，生活化、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现象，故被收入辞典。洪惟仁认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传教士在菲律宾留下的闽南语文献，“证明 Sangley 话音韵最接近的是代表的‘漳东腔’方言，不是海澄方言。”^③而第一封书信中的李仔正是今“漳东”，即漳州台商区角美镇人。

作为书信意义的“批”字，至少在南宋江南一带，作为书信意义的“批”字已经出现，并与“信”字通用。宋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作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前往浙东赈灾。七月，朱熹向宋孝宗连上了6道奏章，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朱熹在《按唐仲友第四状》中，多次出现作为书信之义的“批”字。如“今据王静供，写批与十八宣教告仲友”“王静写批嘱托十八宣教，后蒙杖罪赎铜”“人户潘牧状，缴到仲友长男十八宣教亲书写批子与弟子王静，打嘱周士衡理分公事，与钱五十贯，收下质库，批当分明”，“上件批子系仲友长男令金通引送与王静”。^④这里的“批”即是指“书信”。写批即写信。“批子”即信件，也可能是支取银钱的字条。在朱熹奏状中，“批”字与“信”字同时通用。如“严蕊缘与仲友密熟，有兄周召充黄岩县栏头，因被监官何承节窘拾行打，知得妹严蕊出入宅堂，凡事喜美信据，遂托严蕊写信，令人力计会传达仲友，乞辞退拦头等事”。^⑤可见，在南宋江南，从民间社会到官府公文，“批”与“信”字同义。朱熹正式奏疏中出现作为表书信之义的“批”字，可能是最先直接用“批”为书信义之人。

如今在闽南话或广东潮汕地区的潮州话中，梅县客家话、福州话，包括东南亚地区福建话等

①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书信类第四种，第7页。

②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一：西班牙—华语辞典》，第201，202，292，819，847，1015页。

③ 洪惟仁著《16世纪、17世纪之间律宋的漳州方言》，载《历史地理》2014年第2期，第232页。

④ （宋）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状》，载《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7页。

⑤ （宋）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状》，载《朱子全书》，第846—848页。

地方方言口语中，“批”字作为书信之义成为常用语，如写批、寄批、送批等。查《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各类权威辞典都收入“批”一词，虽罗列该词的很多义项，但没有表“书信”之义项。《闽南方言大词典》《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有收入表示“书信”的义项，^①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批”作为“书信”义的根据，更没有说明它从何而来，源于什么年代。因此，自宋代朱熹奏状出现“批”字，至明代吕宋胡轩写给石兄的书信出现“批”字，《西班牙-华语辞典》收入“批信”（*carta de buenas*，喜讯信，即“平安批”）、“批皮”“传批”等，说明“批”字指代书信，已经成为明代吕宋华人社会通行的常用词汇，弥足珍贵。证明宋代以来以“批”字指代书信虽不常用，但一直沿袭下来。

其三、出现了银信合一的“批信”。如孝仔写信回龙溪家乡，用布所包的番银“大小包共六包”。孝仔在信中告知母亲，前年从菲律宾只寄来番银“钱六爻”。这次从菲律宾寄番银“共捌两正，付母家中使用”。还分别寄番银给妹妹四娘、妹夫吴成，“共重九两捌”。“又内有一包钱四文，重一两伍钱正，付妹夫使用。又内钱一包，钱四文，手指一个，金珠子一粒，付妹四娘收。”还寄给小弟六仔，以及还四嫂所借的钱。还寄给四婶钱六爻，重五钱半。孝仔特别交代，“如是字到日，艮不到，可去白石陈宾田家取。”有固定可信赖的收发地址，这就说明这封海外批信是银信合一的“批”信。孝仔这封银信合一的批信是目前仅见最早的“海外批信”实物原件。

其四、菲律宾闽南华商已经出现银信金融机构，是银信投递的中介机构。当时菲律宾闽南华商这种金融中介机构，可以代办寄钱、资金流通，也有收费。这应是当时华商寄钱、寄货款回闽南的主要方式渠道。从收支账单看，如“代景台寄芦坑振员弟去钱式拾文。送风一爻。又代寄坂尾郑五哥去，钱叁拾文，送风二爻。有代寄大粒四叔去钱式十文。每船代寄我华钱十四文，月搭船去，送风钱半文。又自环船寄锦共去众人布钱式十七文，送风钱半文”。^②这张账单显示代办众人所寄款的番银数量不少。也有个人代寄款的，如代景台寄芦坑振员弟、代寄坂尾郑五哥、代寄大粒四叔等；还有众人所寄款的，“每船代寄我华钱”“自环船寄锦共去众人布钱”。“搭船”说明是托由往返闽南与吕宋的海船寄送。“送风”应是托海船投寄的中介费。根据所寄的钱数，“送风”收费不同。从“芦坑”“坂尾”等带有闽南村社地名特征可看出，所代寄银钱，是到“我华”闽南。既有寄货款给祖家供货者，也有寄钱回祖家亲属。如孝仔批信言，“我前年在吕宋时，生理不就，止寄来钱六爻。今年又寄白石沧前陈宾田”。说明孝仔是多次寄信寄钱回家，也说明至少在明代中期，闽南华商在海外建立的金融中介机构是畅通的，组织严密，有一套流转程序，有众人托寄的业务。

关于批信中出现的银钱“爻”“分”“双”字的推断，这批闽南华商的批信中，经常出现“爻”“分”“文”“双”等银圆币值计量单位。《东西洋考》载：“银钱：大者七钱五分，夷名黄币峙。次三钱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钱八分，名罗料厘。小者黄料厘。俱自佛朗机携来。”西班牙语“*peso*”即“比索”，也音译为“别素”，对音称为“币峙”或“本洋”。1比索等值1个八雷阿尔（*real*）币。金国平认为，汉语音译为“料里”“连”“镛”等。闽南语的“镛”字，应是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real*”的音译，也译音为“列里”。10雷阿尔相当于1两白银。^③

① 周长辑主编《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0-191页；姚荣松总编辑《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台北：教育主管部门国语推行委员会，2011年），网络版。

②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数簿类第六种，第351页。

③ 金国平著《“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第6-9页。

“𠄎 (bo)”字，是𠄎 (bo) 异体字。𠄎是𠄎的简写。𠄎，闽南话 (pat)，又作𠄎。“斤秤之法，每斤二十两，每两十六钱。每钱四姑邦。每邦该官秤二分一厘八毫七丝五忽，每钱该官秤八分七厘五毫。每两该官秤一两四钱。每斤该官秤二十八两。”^①这个词的各种汉语异体，在东南亚华人社群中广泛使用。𠄎、𠄎从邦字来，后来泛指钱，明末指西班牙银元。菲律宾指一元。相对应的是西班牙文“real”，即雷阿尔。其音译形式为“朶里”，意译作“𠄎”。^②

“𠄎”字，与金钱的“钱”同义同音，这里应是特指番银之钱，如“你欠我𠄎不还我，去见王拘你”“我有货卖你，𠄎不还我，天小打我”。^③有时两者同时出现，同义。如孝仔的批信同一段文字中，就同时出现“尔兄前年所为无银钱”“只寄來𠄎六包”。又如上文收支账单出现“去钱式拾文。送风一𠄎”“钱叁拾文，送风二𠄎”“去𠄎式十文。代寄我华𠄎十四文，送风𠄎半文”“众人布𠄎式十七文，送风𠄎半文”，也是“𠄎”字与“钱”字两者同时出现，同义。又如，在作为西班牙人学习闽南语之用《华语——西班牙语辞典》中，出现“只值几多钱 chi 尔要几多𠄎 chi”“有攢𠄎 chi 无攢𠄎 chi”的词条。^④“钱”“𠄎”的西班牙文对应字与拼写闽南读音都是读成“chi”。证明两者同音同义。在菲律宾唐人手稿资料中，“一𠄎”注音为“王馬氏”。“𠄎”也出现在马尼拉华人中药验方药贴中，表示重量。如“芎𠄎七”、“用清明茶七𠄎”。^⑤推测𠄎或是“錢”字的民间俗写，取其偏旁作为代称。

“双”字意思。“别素（化郎呼洋钱），列里（化郎呼八开头洋钱）。闽人呼洋钱为佛银，一元为一双（双柱银），若干元则呼若干双。”^⑥如孝仔所寄的番银中就有“内一包𠄎十三双”。“十三双”即十三元，共重九两捌。“化郎”为“番人”的谐音，指西班牙人。

总结来看，这种银信合一的“批”信具有完整的格式，包含信笺和信封，属于折合信。信封上清晰标注寄信的日期为“四月廿一日封匳”。这类信件涉及寄托人信用、金融中介机构，通常需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由于业务繁忙，有大量人选择委托寄送，其中包括寄回家的“汇款”、货款等。投递方式多样，有往返的海船托送，也有托同乡熟人的船只递送，送寄信函及钱物通常可在特定地点领取。这些特点与近代晚清、民国以来出现的“侨批”业务和类似民信局等专业中介机构相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明代出现了海外金融中介机构，但与近现代的侨批业务、民信局等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是否都是钱庄（银行）与信函合一，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术语“华侨”最早出现于晚清，而“侨批”一词则在其后逐渐正式引入。根据现存的侨批实物，这类“侨批”大量涌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并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相较之下，这封孝仔的批信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中叶，甚至早至明代中叶的万历初、中叶。因此，该信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①（明）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② 金国平著《“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第6-7页。

③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话簿类，第28页。

④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四：华语——西班牙语辞典》（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55，111页。

⑤ 李毓中，陈宗仁等主编《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话簿类第二种，第199页。

⑥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页。



安第斯山脉之珍：花生舶来

叶 农

【摘 要】花生入华问题研究，需要解决下列的问题，从考名来看，其中的“番豆”便说明了其海外来源。从世界传播途径来看，“地理大发现”后，花生首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传至欧洲。是葡萄牙人将花生从大西洋西岸，经印度洋，传至西太平洋，西班牙人则是直接从太平洋东岸，越洋传入西太平洋。从入华途径来看，有浙江、福建、广东、近教人士的宣传诸说。在花生入华时间问题上，葡萄牙人在双屿港活动时，就将花生引入了。花生还经历了从“贱食”到美食的过程。从日文的花生正名为“落花生”及俗称“唐人豆”“南京豆”、澳门俗称“马尼拉果”。花生传入某地的过程很复杂。在不同的时间，可通过不同的途径输入，甚至在同一线路上也可能产生反向的传播。

【关键词】花生；安第斯山脉；葡萄牙人；入华

花生（*Arachis hypogaea*）属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大量脂肪和蛋白质，具有很高营养价值，因此，是一种上乘油料作物和副食品。种子供榨油，炒食或加工成糖果和花生酱等。果壳还可以做工业原料。从晚明传入以来，花生在中国已有近 500 年的栽培史。如今中国是世界上花生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栽种面积仅次于印度占第二位。

研究某种美洲植物入华，学者最关注、最着力和成果最多的是入华的时间和途径以及携带者三个问题。^①追根溯源绕不过很多情况，若不弄清来龙去脉，很难得到正确和深入的认知。只有番薯和烟草等少数作物，在汉语资料中留下了少许携入者的姓名。考察花生入华也还需从上述三方面入手。

一、名考

在葡萄牙和巴西，通用“Amendoim”。“Amendoim”源于印第安图皮——瓜拉尼语

著者简介：叶农，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澳门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明清史（港澳史）、基督教传华史、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

① 中国方面主要代表作有：王宝卿，王思明著《花生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载《中国农史》2005 年第 1 期，第 35-44 页；陈明，王思明著《中国花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科学文化评论》第 15 卷第 2 期（2018 年），第 89-100 页。在西方各个时期文献中出现的情况，可见 Ray O. Hammons,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Peanut*, Harold E. Pattee and Clyde Thomas Young, *Peanut science and technolog*, Yoakum, Tex: American Peanu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ociety, 1982, pp. 1-11。尤其是第 2 页上的编年表极有参考价值。

“mādu’bi”，意思是“埋于地下的”。^①其他葡语国家，如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帝汶都有本地名称。^②

在西班牙语中，写作“mani”和“cacahuete”。^③前者源印第安塔伊诺语（taíno），意思是“平躺在地上”；后者来自纳瓦特语（Náhuatl），其原型是“tlalcacahuatl”。“tlalli”为“土地”之意；“cacahuatl”的含义是可可豆，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土里的可可豆”。

花生学名中的“hypogaea”便是“在地下的”语义。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如果是从西班牙传入葡萄牙，葡语名称应该源自西班牙语的称谓。可我们看到，葡语使用的是一个来自巴西印第安图皮——瓜拉尼语的名称，因此，足以证明了花生是从巴西传入葡萄牙、非洲和亚洲。

查阅中国史料，可以发现花生别名诸多，其中的“番豆”[客家话及粤西地区用此称谓，著者注]便说明了其海外来源。现在通用的俗称花生是“落花生”之简称，因其具有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特点。

诚然，明以前的汉籍中是有数则关于“落花生”和“花生”记载，如（西晋）嵇含撰《南方草木状》、（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和（元）贾铭撰《饮食须知》等。这属于一个十分典型的同名异物的情况。2014年4月国际学界对花生基因组完成了全测序，^④最终证明花生的确是个杂交起源种。其两个亲本，一个是现在园艺上经常用的蔓花生（*Arachis duranensis*），另一个叫花生野生种B（*Arachis ipaensis*），原产地均在巴西、^⑤玻利维亚、巴拉圭到阿根廷北部一带。大约4000年到6000年前，这两个种在阿根廷北部发生了自然杂交，便形成了今天栽培的花生的祖先。

二、传播途径

（一）世界传播

伊比利亚人是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因为他们生活的区域在世界地理上被称为伊比利亚半岛。所以，拉丁美洲也有伊比利亚美洲（Ibero-América）一名。

从世界传播途径来看，“地理大发现”后，花生首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传至欧洲。1500年后，随着葡萄牙人对巴西的发现，花生又被引种到南亚。还有一种说法是由秘鲁沿太平洋东岸传到墨西哥，然后经西班牙商船传入菲律宾群岛。是葡萄牙人直接从巴西直接将其传入非洲和亚洲。欧洲人不喜食花生，最早是在从西非到巴西的黑奴贸易中，作为非洲奴隶的食物。

葡萄牙人将花生从大西洋西岸，经印度洋，传至西太平洋，西班牙人则是直接从太平洋东岸，越洋传入西太平洋。引入的载体是航行于“泛太平洋航线”上，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到马尼

^① A. B. H. Ferreira, *Novo Dicionário da Língua Portuguesa*, Rio de Janeiro: Nova Fronteira, 1986, segunda edição, p. 104.

^② 世界各种文字中的写法，可见 Stanley J. Kays, *Cultivated vegetables of the world: a multilingual onomasticon*, Wageningen: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pp. 152 – 154.

^③ Hermilio Valdizán; Angel Maldonado, *La medicina popular peruana (Contribución al Folklore Médico del Perú)*, Lima: Imprenta Torres Aguirre, 1922, vol. II, p. 177.

^④ Bertoli, D.; Cannon, S.; Froenicke, L. et al., *The genome sequences of *Arachis duranensis* and *Arachis ipaensis*, the diploid ancestors of cultivated peanut*, in *Nature Genetics*, 48, 2016, pp. 438 – 446.

^⑤ Hermilio Valdizán, Angel Maldonado, *La medicina popular peruana (Contribución al Folklore Médico del Perú)*, Lima: Imprenta Torres Aguirre, 1922, vol. II, pp. 177 – 178.

拉的“中国大帆船”。^① 从菲律宾传入中国，首先是福建，因为菲律宾是闽人“过番”的传统生理地之一，但在此之前，闽人已同葡萄牙人为伍，因此不排除从葡人手中已经得到了花生并将其传入闽地沿海的可能。从时间上来看，闽人从1509年开始，便在马六甲与葡萄牙人有所接触，因此，无论是经葡萄牙人之手，还是通过闽人，花生传入的时间都比菲律宾线要早。

关于葡萄牙人在花生，从巴西传播到非洲和亚洲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国外学者多有论述。一位专门研究巴西和印度关系的巴西学者判断：“据信，花生是由葡萄牙人从巴西或非洲传入印度。”^② 对葡萄牙人在传播美洲作物过程中的作用素有研究的拉塞尔·伍德（Anthony John R. Russel - Wood）论述说：“众所周知，巴西是美洲植物的海外传播点。在欧洲传播的情况下，西班牙超过了巴西，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原产于巴西和一般美洲产于的植物在16和17世纪被葡萄牙人运往西非、中非和东非、印度和中国：它们包括玉米、木薯、红薯、花生、菠萝和南瓜。”^③ 他还指出：“巴西被认为是花生（*Arachis hypogaea*）的原产地。因其蛋白含量和含油丰富，是有价值的副食品。这种作物虽在玉米或木薯之下，但也从美洲引进了非洲和亚洲。15世纪60年代，塞内加尔——冈比亚（Senegambia）地区就有了这种植物。它可能被用来作为前往美洲的奴隶船上的补给品。可能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把它带到了印度洋，但对于它在印度被接受种植的情况，还有一些疑问。它曾出现在中国，但这最初是否要归功于葡萄牙人或跨太平洋的传播尚未得到解决。”^④ 一位墨西哥学者则肯定地说：“在1530年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种植另一种美洲植物——花生，而花生在中国的出现肯定要归功于葡萄牙人。花生的种植显示了美洲植物通过海路传播的可能性。”^⑤

从南美洲到非洲，然后再进入亚洲这一途径也留下某些语言学证据可循。直到1918年，孟买还称花生为“*castanha de Moçambique*”（莫桑比克栗子）^⑥ 此名最好地说明了印度的花生是来自印度洋西岸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这个语言学证据更加有力。

（二）入华问题

1. 传入途径

（1）浙江。从江苏和浙江的不少方志中所出现的记录“落花生”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花生首先传入这两个省份，且与葡萄牙人有关。^⑦ 我们认为，花生在浙、江二省的传播可能与浙江舟

① 金国平著《1584 - 1585：澳门——阿卡普尔科首航》，载金国平著《“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an”研究》，第17 - 25页。

② Philomena Sequeira Antony, *Relações intracoloniais: Goa - Bahia: 1675 - 1825*, Brasília: 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 2013, p. 137.

③ Anthony John R. Russell - Wood, *A Dinâmica da Presença Brasileira no Índico e no Oriente. Séculos XVI - XIX*, Topoi: Revista de Historia, 2001, n. o 3, p. 27.

④ A. J. R. Russell - Wood,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 - 1808: a world on the mo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8.

⑤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 - asiático*, Coimbr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19, vol. 1, p. 480; (墨西哥)阿图洛·瓦尔曼著；谷晓静译《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⑥ Andrew F. Smith, *Peanuts: the illustrious history of the goober pe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p. 8.

⑦ 关于这个问题，可见 Ho Ping - ti,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 (1955), p. 192; 何炳棣著《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载《世界农业》1979年第4期，第35页。据知，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劳费尔，参见 Berthold Laufer, *Not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ound - Nut into China*,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américanistes*, XV e session; tenue à Québec en 1906, *Compte Rendu*, Québec: vol. 1, 1907, pp. 269 - 272.

山六横島的双屿有关。在抵达日本之前，葡萄牙人要先至双屿，然后自普陀山东渡。此地乃浙江前往日本的传统放洋地。

关于葡萄牙人在该地的踪迹，^①明人项乔称：“在浙宁波海中有双屿山，去观海卫百余里。海贼通倭夷，在海劫人停泊大船者，巢穴是山之中，耕田筑屋已二十七年，海上往来受害者无可奈何。”^②项书刊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回溯27年，即1524年。这正是葡萄牙人进入双屿活动的年代。“耕田”一语说明了葡萄牙人在六横島也从事过“生存农业”的活动。由此看来，花生极有可能从1524年起，通过六横双屿，传播至浙、江二地。如果从这个史实为出发基点，则比较容易对花生传入的大致时间加以推断。1524年之后方志中出现的关于“落花生”的记载可能就是指今天的花生了。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花生的早期记载并不明确，这可能是因为在在中国有了种植和消费才开始的。尽管缺乏确切的时间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葡萄牙航海者在16世纪初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沿海，花生很可能作为船员或奴隶的食物，已经悄然传入中国。这种推测基于葡萄牙在全球范围内的航海活动和贸易网络，以及他们在全世界传播新作物的历史角色。

葡萄牙的航海探险不仅开辟了新的航线，也促进了物种的全球性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花生作为一种耐储存、营养丰富的食物，非常适合长途航行，因此很可能被葡萄牙人用作船上的食物补给。随着葡萄牙船只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活动，花生可能在不经意间被带入中国，最初可能并未引起当地人的广泛关注。因此，尽管缺乏具体的文献记载，但可以合理推断，花生在中国的传播可能比现有历史记录所显示的时间要早。这一过程不仅见证了葡萄牙航海活动的影响力，也体现了全球贸易网络在文化交流和物种传播中的关键作用。花生的引入和在中国的普及，是全球化早期阶段的一个缩影，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将世界各地的资源和知识相互连接。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引用了一条与浙南有关的资料。“《花镜》：落花生一名香芋，引藤蔓而生，叶桠，开小白花，花落于地，根即生实，连丝牵引土中，累累不断，冬尽掘取煮食，香甜可口，南浙多产之”。^③

（2）福建。清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落花生条中，所引资料多处涉及福建，如他引万历《仙居县志》：“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逢原》云：长生果产闽地，花落土中即生，从古无此，近始有之。味甘气香，能健脾胃，饮食难消运者宜之。”^④他还引用了一条与福建有关的资料。“《汇书》：近时有一种名落生花者，茎叶俱类豆，其花亦似豆花而色黄，枝上不结实，其花落地即结实于泥土中，亦奇物也。实亦似豆荚而稍坚硬，炒熟食之，作松子之味，此种皆自闽中来”。^⑤

各种资料均称花生来自福建，几乎是异口同声。看来此事确凿无疑。关键是何时传到福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入。

从马六甲东来的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顺序是广东、福建和浙江。但我们已经证明，花生可能在顺序最后的浙江双屿传入，因为那里有“耕田筑屋”，而福建则无这样的居留地。葡萄

① 关于双屿的中外文资料，可见金国平，贝武权主编《双屿港史料选编》（中文卷，葡西文卷，法英文卷及日文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

② （明）项乔撰《项乔集》卷六（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793页。

③ （清）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载周仲瑛，于文明主编《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3-284页。

④ （清）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载周仲瑛，于文明主编《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第284页。

⑤ （清）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载周仲瑛，于文明主编《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第283页。

牙人在路过福建时，也有可能将花生传入。1571年马尼拉开埠之前的方志记载，无疑要归功于葡萄牙人，但此年代之后的记载情况就复杂了，有可能是来自西班牙人。从花生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来讲，基本可以确定两条路线：1、经葡萄牙人之手，通过“东印度航线”，输入非洲和亚洲。2、经西班牙人之手，通过“泛太平洋航线”，传至菲律宾，然后再进入福建。总的来说，葡萄牙人要早于西班牙人。

(3) 广东。广东为葡萄牙人进入中国东南沿海的第一站，但从现存的中文资料来看，广东并不是最早出现有关花生记载的地方。这种情况说明，和福建一样，因为没有浙江的双屿这样较为固定的居留地，所以没有将花生传播开来。葡萄牙人船队中有不少奴隶，花生是他们的基本口粮之一，因此，花生一定是随船到了广东，但未能传给当地。这或许是为何广东方面要到清初才出现有关花生记载的原因。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曰：“落花生，草本蔓生，种者以沙压横枝，则蔓上开花，花吐成丝，然成丝而不能成荚。其荚乃别生根茎间，掘沙取之，壳长寸许皱纹，中有实三四，状蚕豆，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凡草木之实，皆成于花，此独花自花而荚自荚，花不生荚，荚不蒂花，亦异甚。予有赞曰‘爰有奇实，自沙中来。以花为媒，不以花为胎。花生于蔓，子结于荚。香如松子，一荚数枚。和中暖胃，乃豆之魁。’”^①稍后，《滇海虞衡志》称之为：“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以其资于民用者最广。宋元间，与棉花、蕃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呼棉花曰吉贝，呼红薯曰地瓜，落花生曰地豆，滇曰落地松。高、雷、廉、琼多种之。大牛车运之以上船，而货于中国。以充苞苴，则纸裹而加红签。以陪燕席，则豆堆而砌白。寻常杯杓，必资花生。故自朝市至夜市，粲然星陈。若乃海滨滋生，以榨油为上，故自闽及粤，无不食落花生油，且膏之为灯，供夜作。今已遍于海滨诸省，利至大。性宜沙地，且耐水淹，数日不死。长江、黄河沙地甚多，若遍种之，其生必大旺。”^②

《滇海虞衡志》接着说：“粤海之滨，以种落花生为生涯，彼各地豆，榨油皆供给于数省。其生最易，其利甚大，江西颇种之，而吾乡从来未有种者，由于不知其利也。滇、粤相连，滇竟遗之，近来颇有。”^③

(4) 近教人士的宣传。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葡萄牙人在花生入华中所起作用的史实。澳门是入华传教士的大本营，也是葡萄牙人的贸易重镇，因此一个可能的渠道是，中国士人通过天主教传教士获得了关于美洲作物的信息，甚至接触到了实物。与从澳门进入内地的天罗明坚和利玛窦等关系密切的徐渭写有《渔樵词》。词曰：“堆盘如菽不知名。咏物成林未著声。只有青藤词一语，茨蔬香芋落花生。”^④徐渭逝世于1593年，因此，至少可以判断，花生的传入应在1593年之前。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方以智广交西方传教士，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自然科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云：“番豆一名落花生、土露子。二三月种之，一畦不过数子。行枝如薤菜、虎耳藤，横枝取土压之，藤上开花，丝落土成实，冬后掘土取之。壳有纹豆，黄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孫恂曰：‘舜夔，番豆也。’郭林曰：‘生吃有油，亦致下泄。’”^⑤“番豆花透空入土，结豆，当通润藏府，是一类推法也，皆贯无关有之药。”^⑥

2、传入时间

在花生入华时间问题上，西方学者多从劳费尔和善富（L. Carrington Goodrich）的“1608年

①（清）屈大均著；李育中等注《广东新语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②（清）檀萃辑；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滇海虞衡志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3-254页。

③（清）檀萃辑；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滇海虞衡志校注》，第289页。

④ 谢国桢著《落花生》，载谢国桢著《谢国桢全集》第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⑤（清）方以智著《方以智全书》第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9年），第317-318页。

⑥（清）方以智著《方以智全书》第7册，第260页。

之前说”。善富说：“我们可以和劳费尔（Laufer）博士一样得出结论，花生肯定是在17世纪早期传入福建的。可能是在1608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到本世纪中叶，其种植在东南各省已很普遍。”^①可仔细阅读他们的有关论文，不难发现，他们所依据的中国史料并不全面，因为这个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有关于“落花生”的记载。现知最早的记载是1503年的《常熟县志》，但它所记载的“落花生”不太可能是从美洲传进的物种，因为1498年葡萄牙人才首次抵达古里，1509年葡萄牙人刚刚到达马六甲，所以花生绝无可能在此之前传入中国。再说，《常熟县志》刊于1503年，但从1496年开始编纂。^②稍后，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人，著者注〕约于1530年完成的《种芋法》提及：^③“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④可见，时人已经了解香芋与花生的区别。再说，1530年，往前推5年，就是1525年。这个年份仅距葡萄牙人入居双屿后一年。长江口的嘉定与舟山近在咫尺，花生的传入有很方便的条件，不无可能。稍后有1604年的《崇明县志》、1605年的《嘉定县志》、1608年的《仙居县志》及1609年的《钱塘县志》等。劳费尔和善富为何将1608年定为分界年不得而知。笔者比较倾向于，将1530年左右的《种芋法》当中所记载的“落花生”作为涉及今花生的标志年。这个看法与墨西哥学者阿图洛·瓦尔曼的看法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县志中提到的地区均位于江浙。根据这一地理线索，如果这些记载确实涉及花生，那么可以推断，葡萄牙人的船只在1524年至1548年之间，就已经将花生作为船上的食品带到了双屿。

双屿作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私人国际贸易港口，是葡萄牙人与中国和日本进行贸易的枢纽之一。在这个时期，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新的商品，还可能无意中引入了新的农作物。这种引入可能是由于船员或随船的奴隶需要携带足够的食物以维持长途航行所致，而花生作为一种耐储存且营养丰富的食物，非常适合这种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生可能在双屿及其周边地区开始传播和种植，逐渐融入当地农业体系。这一过程可能起初并不为人所注意，故方志中未有及时的记载。

花生的故事再次强调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和物种传播中的重要性。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不仅改变了全球的贸易格局，也为全球农业的多样性和人类饮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花生的传播历程，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生动例证，也是全球化早期阶段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3、从“贱食”到上品

欧洲人开始接触到花生时并不对它青睐，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贱物。1532年被卡洛斯五世（emperor Carlos V）皇帝任命为新发现的西印度群岛的第一位编年史家的奥维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在其名著《西印度群岛及太平洋岛屿及陆地自然通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islas y tierra-firme del mar océano*）中专辟一章讲述花生，其文字如下：“花生（mani），这是一种果实，也是印第安人在此埃斯帕尼奥拉岛〔引者注：意即“西班牙岛”〕和其他西印度群岛上的普通食物。在埃斯帕尼奥拉岛上，有一种印第安人的果实，他们称之为花生。他们加以播种和采摘。这是菜园和田地里很常见的植物，如同带壳的松子大小。他们认

① L. Carrington Goodrich, *Early notices of the peanut i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vol. 2, No. 2 (1937), p. 409.

② 赵传仁等主编《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年），第990页。

③ 洪光住著《中国食品科技史》（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406页；L. Carrington Goodrich, *On loan words*,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 (1966), pp. 159-160.

④（清）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71页。

为其营养丰富。除了一些卑微者、男孩、奴隶，或者不管什么口味都吃的人才吃它，基督徒则很少问津。其味道一般，没什么营养。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普通的蔬菜，且数量巨大。”^①

上述这段话，是西方文字中对花生的最早描写。首先，花生为一种常用食物；其次，已驯化，院子或田野中到处种植；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天主教徒不吃花生，因为认为花生的口味平淡无奇，只有下等人才吃。我们知道，西班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天主教是国教，因此几乎全部都是天主教徒的西班牙人不屑食之。

欧洲人对花生的轻视，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加以佐证，例如，最早对大部分美洲植物进行图说的1542年的德国人莱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的《物种图说》（*De historia stirpium commentarii insignes, maximis impensis et vigiliis elaborati, adiectis earundem vivis plusquam quingentis imaginibus, nunquam antea ad naturæ imitationem artificiosius es effectis & expressis*）根本未将花生收入。此外，1574年，西班牙医生尼古拉斯·莫纳德（Nicolas Monardes）出版的《关于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的对医学有用之物的药用历史之一、二及三》（*Primera y segunda y tercera partes de la historia medicinal de las cosas que se traen de nuestra7s Indias Occidentales que sirven en Medicina*）中，虽有对花生生长形态的描写，但连花生的名字都未出现。

根据花生原产地之一秘鲁学者的说法，“这种（花生）果实烤食，被广泛用于食品。此外，还用来催乳（galactóforos）”。^②

花生传入中国后，我们的老祖宗也是炒着吃，且还有专门的做法。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有“炒落花生法”：“生则泻人，焦则不堪，须用纸苴水浸，后入釜炒之，则内熟而不焦，其香如松子。”^③

花生经历了一个从“贱食”到美食的过程。如今在欧美世界，花生主要是在酒吧中作为下啤酒的小食。但并不适配所有的酒类，例如喝葡萄酒及烈酒时，一般不以花生下酒。买啤酒时，会同时赠送一小碟炒花生或油炸花生。现在花生最大的用途是做成花生酱，涂抹在面包吃。只是早餐这样吃，午餐和晚餐则没有这种吃法。面包是欧美人士的主食，光这个食法就使花生达到了很高的消费量。另外一大用途是榨油，做成花生油。欧美上层人士通常是使用橄榄油，中产阶级则橄榄油和花生油兼用，而下层人民只能用花生油。

到了清朝，花生虽已很普及，仍然不失为平民百姓的“奢侈品”。但在小酌时，必不可缺。有曰：“寻常杯杓，必资花生。”“杯杓”是指酒杯勺子合为一体的器皿，借指饮酒。

印第安人通常是炒食，中国人的吃法就多了，干炒，油炸，水煮，不一而足。

一般来说，基督徒、欧洲人对花生不屑一顾，但葡萄牙人却找到了一个大用处。“进入16世纪，花生从巴西传到西非，是由运送黑人奴隶的船当作奴隶粮食带去的。……15 [引者注：当为16世纪之误] 世纪末花生由葡萄牙人首先传到印度尼西亚。”^④

关于作为奴隶口粮问题，让我们来看更多的叙述。“根据阿尔马达（Alvares de Almada）的报告，到1564年，花生已经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冈比亚（Senegambia）扎根。法国医生和植物学家克鲁修（Charles de Lecluse (Clusius)）在1601年提到，随着马铃薯被引入欧洲，在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船上，花生被用作来自几内亚海岸奴隶的口粮。葡萄牙人引入非洲的花生很快得到接受。

①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José Amador de los Ríos Valdés,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islas y tierra firme del mar océano*,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851, vol. 1, p. 274.

② Hermilio Valdizán; Angel Maldonado, *La medicina popular peruana (Contribución al Folklore Médico del Perú)*, p. 178.

③ (清)方以智著《方以智全书》第7册，第308页。

④ (日)星川清亲著；段传德，丁法元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61页。

在美国奴隶贸易时期，许多非洲部落将其作为主要食物，并对其习以为常。到17世纪末，奴隶船的船舱里经常装满花生，作为跨大西洋航行的唯一口粮。”^①

中外共同发现了玉米的药用价值。“奇怪的是，Cristóvão de Lisboa 神父在描写巴西马拉尼昂地区时，并未提到花生被用来食用，而是被‘用来医治手臂或腿的骨折，将捣碎的嫩芽敷在患处，可很快治愈。’”^② 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却说：“又凡被马踢伤者，忌服花生，服之疮愈增痛。”^③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中外对玉米药用效果的观察竟完全相反！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坚称花生“和中暖胃，乃豆之魁”。^④

4、相互传入与反复输进

日文的花生正名为“落花生”，也有反映来源于中国或某地域的俗称，如“唐人豆”及“南京豆”。^⑤ 西班牙人在1571年正式占领菲律宾后，可能通过双方贸易将花生输入，但留在日语当中的词汇表明是来源于中国的名字，说明最早是由中国输入。赵学敏引用一福建方志说：“《福清县志》：出外国，昔年无之，蔓生园中，花谢时，其中心有丝垂入的结实，故名。一房可二三粒，炒食味甚香美。康熙初年，僧应元往扶桑觅种寄回，亦可压油。今闽省产者出兴化为第一，名黄土，味甜而粒满；出台湾，名白土，味涩而粒细，其油煎之不熟，食之令人泻，一名土豆。”^⑥ 关于“扶桑”，梁家勉认为：“又赵氏《拾遗》云：‘康熙初年僧应元往扶桑觅种寄回。’则其时或有新品种自海外引种。然所云‘扶桑’，未必即今‘日本’。据近人农书所记，日本落花生，系清嘉庆中始自中土移植耳。”^⑦

直到20世纪初，在澳门，除了用葡萄牙文通用的名字“amendoim”外，还使用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Fruta - Manila”（马尼拉果）。^⑧ 这表明，当时又有从马尼拉输入的货品，所以才产生了这个有明确地域标识的称谓。

从这些名称上可以看出，花生传入某地的过程很复杂。在不同的时间，可通过不同的途径输入，甚至在同一线路上也可能产生反向的传播。这个过程往往残留在语言中。有地理标志的名称是我们研究传播渠道的重要依据。

尾 语

花生，这一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食物，其全球传播的历程与葡萄牙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活动紧密相连。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花生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通过葡萄牙的航海网络，开始了它的跨洋之旅。这一旅程不仅见证了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也映射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农业革新。

在非洲，花生的引入标志着饮食结构的变革。它首先在甘塞内加尔——冈比亚扎根，随后迅速向东海岸扩散，成为非洲奴隶贸易中的重要食物来源。在亚洲，尤其是印度，花生的传播同样

① Frederic Rosengarten, *The book of edible nuts*, Mineola, N. Y. :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p. 147.

② José E. Mendes Ferrão 著；张永春，曹晋锋译《植物的旅程与葡国航海大发现》，第16页。

③（清）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载《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第285页。

④（清）屈大均著；李育中等注《广东新语注》，第623页。

⑤ “宝永三年（1706年）花生从中国传入日本，称做南京豆。但当时的栽培并不普及，直到明治初期输入的花生才成为现在栽培种的基础。”参见（日）星川清亲著；段传德，丁法元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第61页。

⑥（清）赵学敏撰《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载周仲瑛，于文明主编《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第283页。

⑦ 梁家勉著《梁家勉农史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

⑧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 - asiático*, Coimbr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1, p. 494.

得益于葡萄牙的航海活动。16 世纪初，花生从巴西传入印度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随后在东南亚地区扎根，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丰富了亚洲的饮食文化。

关于花生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但可以推测，随着葡萄牙船只在 16 世纪初频繁出现在中国沿海，花生很可能已经随着这些船只悄然进入中国。这一推测与葡萄牙在中国的航海活动相吻合，表明花生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可能比现有记载更为久远。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舟山六横岛的双屿，是最早引进花生的地方，而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也在同一时期与花生有所接触，随后成为最早的种植区。

葡萄牙人在花生的全球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的航海活动不仅促进了物种的交流，也加速了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花生的传播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探索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它从南美洲的山谷出发，跨越大洋，最终成为全球各地餐桌上的常客，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饮食，也促进了全球农业的多样化。

美洲作物的全球传播对世界农业种植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农业种植模式，也丰富了农业资源。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对植物资源的深入利用和对全球生态平衡的积极影响，展现了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创新与适应能力。



依托史料，拓展视野——以《海上丝路丛刊》 《海上丝绸之路丛刊》为例

宋玉宇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明清时期西方人的东来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秉承“追本溯源，经世致用；研究澳门，服务濠江”的宗旨，对曾经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外关系等领域的史料，展开收集、整理、翻译、编撰、出版与研究的工作，出版了《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学术著作与文献资料，以期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中外文化交流史；史料；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又称“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南海是这条海上商路的重要地区，其支点主要是广州。明清时期，澳门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朝中叶葡萄牙人通过海上探险与入居澳门，将其开辟的东来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为中外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地区被英国割占与租借，中外交流又有了新拓展。透过“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观察、了解明清以来中外交流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这些交流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这些史料，有些已经为学术界所熟知与研究，有些则有待学术界去发掘、整理，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自2017年揭牌以来，对曾经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外关系等领域的史料，展开收集、整理、翻译、编撰、出版与研究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此项使命，该研究院特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题，组织出版《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系列丛书，以向学术界展现相关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一个发掘研究史料、发布研究成果的平台。这两套丛书，自面世以来，学术影响虽然日益增加，所展现的相关成果仍有作进一步介绍的必要。

一、管中窥豹：两套丛书所收录成果一览

研究院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展开合作，成立了广东省首个产学研机构——港澳暨海外文献出版

传媒中心。该中心负责策划出版以港澳历史文化为中心的档案文献及相关著作，并策划相关学术交流交流活动，推动广东与港澳及海外学术机构的联系、交流与合作。目前的主要成果是策划、编辑、出版《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系列丛书。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中心又与澳门颇有影响力的文化出版综合体——文化公所合作。该机构位于澳门历史保护建筑——福荣里九号，是集出版社、书店、文化空间为一体的综合体，承担向澳门机构、社团和个人提供书籍“出版、发行和推广”的一站式支援服务，推动澳门出版业发展，搭建讲好澳门故事的平台。

目前，经过7年多时间的共同努力，研究院学术发布平台的功效逐步显现，所出版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加，开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出版的研究成果如下：

表1 《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成果一览表

系列	类别	著作名称	著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海上丝路丛刊	字典卷	通商字汇	金国平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化公所	2018
		广东土话字汇	叶农，金国平整理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2
	史料整理	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	叶农，金国平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化公所	2019
		鸦片战争后清宫粤海关税收报告	叶农，黄素芳整理、点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人过留痕——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耶稣会修士墓碑拓片	叶农，邵建整理、点校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澳门基金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20
	中外关系卷	美国驻澳门领事馆领事报告（1849-1869）	郝雨凡，林广志，叶农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	叶农，吴青整理、点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化公所	2020
	澳门学研究丛书 （第一辑）	澳门学著作书目（1500-1999）	叶农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化公所	2018
		澳门望厦村研究	林发钦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化公所	2018
		澳门学：探赜与汇知	金国平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澳门学研究丛书 （第二辑）	澳门学著作书目（2000-2019）	叶农，宋玉宇编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澳门基金会	2022
		“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	金国平著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澳门基金会	2022

(续上表)

系列	类别	著作名称	著编译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海上丝绸之路丛刊	对外贸易卷	开埠后香港对外贸易史(1840-1941)	张晓辉著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1
	翻译卷	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 自1651年鞑靼人完全占领至1669年间发生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重要事件	(法) 聂仲迁 (Adrien Greslon) 著; 张丹彤译; 张放审校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0
		已故中国皇帝道光传及清廷回忆录——含中华帝国近50年大事记	(德) 郭实猎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后改名 Charles Gutzlaff) 著; 叶农, 黄畅, 付磊译注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0
		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下卷	(西班牙) 胡安·希尔 (Juan Gil Fernández) 著; 安大力译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2
		中国现状与传教展望	(英) 麦都思 (W. H. Medhurst) 著; 叶农, 程婧璇译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3
	文献整理	耶稣会士熊三拔著述集	叶农点校, 整理; 金国平选编, 翻译; 雅保多 (Ubaldo Iaccarino); 罗弥格 (Miguel Rodrigues Lourenço) 转写	广州: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澳门: 文化公所	2023
		方济各·沙勿略与三洲澳文献萃辑	(西班牙) 沙勿略 (Francisco de Javier) 著; 叶农点校, 整理, 审校; 金国平选编, 翻译, 审校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2
	大湾区卷	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2019-2020)	陈进国, 张斌主编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1
		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2021-2022)	陈进国, 张斌主编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3
		《港澳台国家安全: 法律与制度的构建》	常乐等著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1
		《冷观——大湾区及中国城市发展》	严忠明著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1
	大众生活卷	《终生学习: 葡式美食攻略》(一)	梁黄远娜原创; 叶农主编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1
		《终生学习: 葡式美食攻略》(二)	梁黄远娜原创; 叶农主编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2
		《终生学习: 葡式美食攻略》(三)	梁黄远娜原创; 叶农主编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 文化公所	2023

二、匠心独运：《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的特色

《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系列丛书的出版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著名名家汇聚，多为该领域资深学者，他们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髓、论断周详、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保证了出版著作的质量。发掘、收集、整理、编撰的史料囊括多种语言、多种形式，可直接用于学术研究。研究内容领域广泛、紧跟时事热点、学术性强，具有系列化、原创性的特点，包括字典卷、大湾区卷、中外关系卷、对外贸易卷、翻译卷、大众生活卷、澳门学研究系列等。

（一）挖掘多种语言、多种形式新史料

傅斯年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包括“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①他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搜集处理史料，学问的进步是与材料的扩充成正比例的。李济在回顾历史语言所走过的历程时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②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中文文献为主体的东方历史文献，一类是外文的历史文献，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荷兰文等欧洲多种语言文献。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就两次，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明清基督教的传入。目前向前推进的关键仍在于材料的发现和整理。^③

明末清初时期中外交流过程留下的重要的文献之一，就是来华耶稣会士所撰写的大批中外文献。系统整理这些文献，能够从中国和欧洲两个角度来重新审视明末清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段历史。天主教传教士在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人数众多，影响巨大，曾起过重要的中介和先驱作用，不光在宗教领域，在科学、艺术、教育、出版、医疗、慈善等诸多方面也有非凡表现。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对他们的研究相对薄弱。

研究院与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公所，特此联合收集、整理、翻译、编撰、出版了《耶稣会士熊三拔著述集》《人过留痕——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耶稣会修士墓碑拓片》《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方济各·沙勿略与三洲澳文献萃辑》《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ino Ursis）是科学传教的先驱者之一，关于熊三拔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本次收录熊三拔中文著作4种，包括已刊的《泰西水法》六卷、《表度说》《简平仪说》各一卷，以及藏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的未刊稿《象数论》。另外，外文书信、著作13种，它们主要为信函与工作记录、工作报告等，涉及耶稣会在华传教事务，记录了大量不为人所知的事务，对研究耶稣会，乃至天主教修会在华传教事务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均采用外文转写与中文译本对照的形式，特别是其中许多信函等史料，系中文的首次译出。

① 刘大椿主编《人文大师奠基性研究与创新方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② 李济著；张光直主编《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李济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

③ 张西平著《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论：文献、视野、方法》，载《国际汉学》2012年第1期，第279页。

耶稣会的创始人方济各·沙勿略在其传教过程中，曾撰写过一批书信。在其逝世之后，亦有不少学者后人撰写过传记等各类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均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用不同的语言所撰写，在收集、整理上，势必存在着各种困难与问题。为了突显其在天主教传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澳门史上的贡献；更好地了解方济各·沙勿略的在华事迹，为天主教早期传华教史的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野，该文献集所收录的文献资料，集中于方济各·沙勿略在三洲澳所撰写的书信及之后其他学者后人所撰写的涉及到其在此岛上活动的各种传记、报告等文献资料。

插图版画由于具有视觉叙事性、艺术风格与书籍主题的高度契合性、情感传达、教育功能、互动性等特点，在油画、水彩画、版画等众多绘画种类中是开展传教工作的最佳选择。学术界在宗教画的西洋绘画中着墨较多，成果也主要是对绘画的研究，而对宗教画中传教士著作中的插图版画，特别是表现《圣经》故事的插画却研究不多，《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将明清时期刊印出版的《圣经》故事插图版画集结出版，是编者长期从事天主教传华史过程所做的一项基础工作，收录了《西字奇迹》《诵念珠规程》《天主降生言行纪像》《玫瑰十五经图像》等17部插图版画集，在每部著作前附有解题一篇。

《人过留痕——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耶稣会修士墓墓碑拓片》整理了巴黎法国耶稣会档案馆所藏晚清上海县南门耶稣会修士墓（圣墓堂）墓碑碑文拓片，档案号FCH382，计170种。这批拓片提供了一百多位传教士的简略行状，以此为基础，继续发掘并结合其他史料，可以继续推动相关研究。另外，可补充现有史籍的论述。在史料价值及其对澳门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收录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庞迪我所著中文与外文等其他语言的著作20余种，是研究庞迪我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基础性资料集。此文献集，曾经是“2018中国与西班牙文化年”活动的项目之一，出版后曾获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颁授“国民成就十字勋章”，主编者叶农教授还曾亲赴北京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接受颁勋。

（二）提供中外文化交流新视角

在人类文明繁衍赓续的进程中，翻译活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语言始终是中外交流的重要障碍。没有翻译和借鉴，民族文化就只能在狭窄的小路上爬行，整个人类的文化也会因缺乏横向联系而徘徊不前。^①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和主要途径，翻译事业发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着力点和出发点，也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途径、衡量标准和检验手段，中外文化交流建设离不开翻译事业的发展。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撰写了许多优秀的著作，其语言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荷兰文等欧洲多种语言文献。翻译这批著作对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特定时代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院特此翻译了一批著作，包括法国籍耶稣会士聂仲迁（Adrien Greslon）著《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自1651年鞑靼人完全占领至1669年间发生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重要事件）》、德国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后改名Charles Gutzlaff）著《已故中国皇帝道光传及清廷回忆录——含中华帝国近50年大事记》、英国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著《中国现状与传教展望》、（西班牙）学者胡安·希尔（Juan Gil Fernández）著《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下卷等。

《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自1651年鞑靼人完全占领至1669年间发生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重

^① 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43页。

要事件)》以与传教士有关的事件为主线,描述了1651年至1669年间在中国发生的所见和所闻。此书随后于1672年在巴黎单独出版了一个续编,内容主要取自聂仲迁神父摘录其同仁的几封信,补充叙述了1669-1670年间,教案被平反的曲折过程,以及他们向欧洲同仁发出邀请的呼吁。从整体来看,著作中所描述的事件经过和各位传教士的经历,除了小部分是著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之外,大部分应该是来源于著者与其他传教士之间的书信沟通,由于书中一共涉及到50多位传教士在华期间,特别是在1665年教难期间的经历,因此,也经常被后世所引用,在耶稣会士的历史记述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野。

郭实猎与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都有很深的关系,基本上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所以《已故中国皇帝道光传及清廷回忆录——含中华帝国近50年大事记》中他对道光皇帝即位后30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史的叙述有许多偏颇之处。尽管如此,为刚刚驾崩的中国皇帝作传,在西方学者中还是没有先例的,因此,该著作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西方人研究中国的著作。

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多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艾约瑟(Joseph Edkins)、郭实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作为被忽略的对象,麦都思是中国近代开始前后,在中国活动的一个知名英国传教士。他用他自己的经历、观点和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他那个时代所看到的中国和他所认为的中国。在华活动时,接触过不少的中国的基层民众以至地方官员,对中国状况、社会乃至民众有较深入的了解。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印象及其在华沿岸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在此基础上,在1838年撰写出版这部著作。麦都思认为1838年前后的中国是文明悠久与停滞排外的、偶像崇拜与封建迷信的。

胡安·希尔,从浩瀚史料中整理出来一个清晰华人在马尼拉发展的脉络,贡献巨大。希尔教授引用的大量文献来自于西班牙塞维利亚西印度总档案馆(General de las Indias),《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在填补了一些明清菲律宾华人华侨史空白的同时,也在召唤更多的中国学者前去开掘,补充18、19世纪的华人相关史料,寻找华商和福船是否曾跨国太平洋到达美洲的蛛丝马迹,了解马尼拉大帆船的货运总量和种类,深挖更多中国同菲律宾、美洲以及西班牙、欧洲交往的早期历史资料。

著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自1572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同菲律宾群岛之间持续不断的贸易往来,包括皇家税收、市政财税、贸易的商品与商贩、中国商贩开辟的新贸易路线,阐释了马尼拉的华人居民、华人社群的生存状态、体貌以及官员和执法人员,许多史料也是首次面世。著者亦将马尼拉与澳门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各自不同命运的缘由。1596年,定居在菲律宾首府的华人有2万名,西班牙居民仅千人。西班牙人是极其强硬和发号施令的统治者,也许是因为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美洲地区面对美洲土著居民所取得的压倒性的胜利,使得他们没有意识到华人是不同的群体,还是希望以其耶稣会来同化中国人,皈化中国人。然而,由于文化冲突、阶级差异、矛盾在累积,双方关系既共生也恶化。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和平和安宁之后,有过几次血腥的暴动记录(1603、1639、1662、1686),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驱逐行动(1686、1744、1775年),时至今日菲律宾也仍有排华行为。这些社会暴动周期性的发生,表明了天朝帝国勤劳的居民不断向马尼拉移民,造成了当地深刻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菲律宾群岛的存在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译者曾常驻西班牙和拉美,2001-2017年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首席代表,走遍了伊比利亚和美洲。对于一个如此宏大的历史题材,译者从2018年起翻译,到2022年中终稿,历时5年的漫长而有耐心的投入,令人心生敬佩。

（三）研究领域广泛、紧跟时事热点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澳门历史的特殊经验，决定了澳门学的开放性，生成了澳门学与西方交流的平台和语言，赋予了澳门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的沟通能力，决定了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也是澳门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香港自被英国割占之后，即成为“海外”的范畴，香港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基地，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远及欧美、南洋、印度、东北亚、澳洲等地区和国家，在东西方的贸易联系由以往中国、印度、英国为主的三角格局向多边贸易形态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湾区共同体”的视野，去整体地关照各种文化形态、各种宗教和信仰形态在湾区内的存在形式也具有独特价值。

该研究院广邀业内资深学者，出版了一批紧跟时事热点的学术著作，包括：金国平著《“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澳门学：探赜与汇知》，张晓辉著《开埠后香港对外贸易史（1840-1941）》，叶农编著《澳门学研究著作书目（1500-1999）》，叶农、宋玉宇编著《澳门学研究著作书目（2000-2019）》，陈进国、张斌主编《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常乐等著《港澳台国家安全：法律与制度的构建》，严忠明著《冷观——大湾区及中国城市发展》。

《“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澳门学：探赜与汇知》著者金国平，在澳门学领域耕耘三十载不懈，发掘中外史料最勤，其著作和论文大量引用第一手材料，除了中、葡两文之外还包括西班牙的文件、法、英等文的资料，在著作中娴熟的运用了历史学、词源学的方法，将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研究列入中西关系范畴，以此切入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史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中有8篇论文都围绕“Parián”这个主题，且使用了大量的西班牙文原始图文资料。其中《“Parián”：文征图证考“堧”源》堪称这一领域的巅峰之作，运用了多种收藏在西班牙西芒卡斯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内的地图资料，展示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的“Parián”。《澳门学：探赜与汇知》中收录的论文，内容囊括澳门传教史之“colégio”的定义、译名与沿革，琉球闽南华裔“Cheilata”之生平与事迹，考证西班牙藏《古今形胜之图》著者不是喻时，而是甘宫，葡萄牙语“Ilha de Macao”的涵义与指称，澳门与葡萄牙语世界“茶文化”的兴起等。其中《明末葡萄牙语文献所记载的“Queve”之汉名考——兼探李叶荣外文姓氏的来源》代表着澳门史研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它详细地探讨了明末葡萄牙语所记载的词汇“Queve”及其在另外一些欧洲语言中的异体的来源。其使用的历史要早于澳门，其传播程度之广令人叹为观止。首先从中文进入葡萄牙语，然后再从它进入荷兰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几乎包括了所有东来的欧洲贸易先驱的语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宗教团体的发展已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大湾区的宗教发展进行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多方面、多层次的跟踪和调研大湾区的宗教发展态势，让各界可以从一个“湾区共同体”的视野，去整体地关照各种宗教和信仰形态在湾区内的存在样态，并对比性地“共感”各自所面临的发展处境。蓝皮书从“广东篇”“香港篇”“澳门篇”三个维度进行对比调研分析，分析深圳、珠海、粤西民间信仰的历史源流、发展现状及治理实践，应坚持“文化尊重”和“文化自信，弘扬和传承优秀的民间信仰传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研究香港的宗教团体从时政热点着手，2019年香港宗教界动态报告从修例风波切入，而2020年从国家颁布《香港国安法》入手，分析香港宗教界的不同表现。研究澳门宗教同样紧跟现实，从2019年的“双庆”、2020年的抗疫、非

遗保护、澳门青少年佛教教育、天主教与澳门社会发展等角度展开调研分析。蓝皮书中调研分析角度许多乃国内首次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港澳台国家安全：法律与制度的构建》应时局而生，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关于国家安全领域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总览影响国家安全的传统及非传统问题，聚焦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外延与法律体系、分析香港与台湾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总结了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可借鉴的经验，深入论述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港澳台三地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实践与重大成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三、展望未来

《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系列丛书的出版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新的形式、新的视角。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的首要步骤是对史料进行鉴别和处理。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编撰、出版与研究工作的严谨且细致，要善于发掘史料，让史料说话，这意味着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等原始史料，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解读，还原真相，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注重多维视野考察，提出重大问题，中西文化交流史料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专业学术、社会发展现状、国家政治、网络技术等多方面因素，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历史文献所反映出的时代现象。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观点融合，拓展学术视野，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料的发掘与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和解释。注重史料的实证，避免似是而非，严格筛选史料，确保所使用的史料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避免在研究中出现误导性的信息，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载：“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研究院以刻书泽人为己任，不避繁复、不辞辛劳，广邀学术同仁，著书立说，以期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新视野、新思路、新拓展，经过努力，该学术平台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加，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成效，亦望学界，共承此旨，出版更多的著作和译作嘉惠士林。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投稿須知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為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與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合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2024年6月，是中外關係史、明清史（港澳史）、海外漢學、基督教傳華史、國際關係問題等研究領域的專業刊物。本刊以“立足專業、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相關領域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本刊歡迎國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投稿注意事項如下：

1. 來稿不限所使用的語言，中文也不限簡體與繁體，字數以2萬字為限；

2. 來稿文責自負，必須為原創且未經其他期刊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稿件一經採用，本刊可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或經本刊授權其他個人或單位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惟投稿3個月後仍未獲任何回覆，則可另投他處；

3. 本刊有權刪改來稿內容，如不同意，請在來稿中注明；

4. 為了統一規範論文的撰寫、編輯、印刷以及為了便於論文處理、儲存、檢索、利用、交流、傳播等，投稿之論文格式請參照本刊《體例要求》（請與編輯部聯繫）；

5. 來稿須同時以WORD檔及PDF檔格式電郵至：
journalmsr@126.com/journalmsr@hotmail.com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編輯部



ISSN 2958-9657



9 772958 965007 >